中东史专家 哈全安教授 全书审定

帝国的背影⊕

土耳其简史

Turkey: A Short History

[英] 诺曼·斯通_著
(Norman Stone)

刘昌鑫_译
哈全安_审校



中信出版集团

版权信息

书名:土耳其简史

作者:[英]诺曼·斯通

译者:刘昌鑫

ISBN:9787508674742

中信出版集团制作发行

推荐序

土耳其地处亚欧大陆的结合部，是一个极具魅力的神奇国度。东西交融的深厚历史积淀，在土耳其的土地上编织出色彩斑斓的绚丽画卷。早在近4 000年前，文明的曙光冉冉升起在安纳托利亚地区的内陆腹地，赫梯人建立的城邦开辟了安纳托利亚地区古代文明的先河。此后数百年间，希腊人的移民浪潮和罗马人的军事扩张，给安纳托利亚地区注入了地中海世界的文明元素。拜占庭帝国时代，君士坦丁堡犹如镶嵌在地中海世界的璀璨明珠，成为西方基督教文明的重要标志。蒙古西征期间，突厥人如同潮水般涌入安纳托利亚地区。大约700年前，奥斯曼帝国横空出世，成为继波斯帝国和阿拉伯帝国之后中东历史长河中最后的帝国。进入19世纪，奥斯曼帝国雄风不再，国势江河日下，往日的辉煌随之渐渐远去。土耳其共和国诞生于奥斯曼帝国的废墟之上，历经“一战”结束后风雨飘摇的动荡时代，踏过崎岖颠簸的艰难旅程，历史的车轮从伊斯坦布尔向安卡拉一路驶来，奥斯曼帝国的身影渐行渐远，安纳托利亚大地迎来了现代化的活力和生机。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土耳其简史》，出自英国学者诺曼·斯通之手。相比于目前所见的多种同类著作，作者尽管具有西方学术背景，却未局限于西方中心论的狭隘视野，而是极力摆脱西方学者对于土耳其的传统偏见，多处观点颇显公允，实属难能可贵。作者将土耳其历史置于世界历史的宏观背景之下，将土耳其历史的具体内容置于特定的时代背景之下，客观梳理诸多历史现象的来龙去脉，分析历史进程的前因后果，试图澄清历史谜团和还原历史真相。本书虽然名为“简史”，且篇幅有限，却贯通古今，特别是就土耳其历史中的若干重大问题予以了深入考察，思路独辟蹊径，令人耳目一新。

《土耳其简史》一书的译者刘昌鑫博士，先后攻读英语专业、国际关系专业和中东史专业，2016年在南开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土耳其简史》的中文译稿措辞准确，表述清晰，行文朴实，略带几分古香古色，赏心悦目，反映出译者具有良好的语言功底和学术素养。相信中文版《土耳其简史》，将会成为历史爱好者的上佳读物，亦可为专业研究者提供不可或缺的学术参考。

哈全安
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


Le siege du grant · turc auec · ij · de ses pncipaulx cõseillẽs
Le siege du capitaine gñal de la turquie



1453年奥斯曼军队围攻君士坦丁堡，来自Bertrandon de la Broquière，Le Voyage d’outremer，1455。现存于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

前言

拜占庭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拥有连接欧亚两洲最优良的天然港口，故而在世界贸易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正因如此，1453年，它成为继拜占庭帝国之后的奥斯曼帝国或曰土耳其帝国的首都，其重要地位至今仍丝毫不减当年。写作本书时，我曾俯瞰博斯普鲁斯海峡，每天都可见百舸争流的壮观场景，其中许多艘巨型油轮或者集装箱船来自中国，正在出入黑海。在伊斯坦布尔，从拜占庭帝国于6世纪兴建的气势恢宏的圣索菲亚大教堂，到土耳其苏丹修建的宏伟清真寺，帝国雄风的遗迹随处可见。

奥斯曼帝国是一个笼罩着现代世界的幽灵。尽管它在“一战”后就从地图上消失了，但是它之前控制的辽阔区域却接二连三地出现问题。从14世纪开始，它以今日土耳其西北部的布尔萨地区为基地，迅速扩张成一个世界帝国，囊括了从大西洋的摩洛哥海岸到俄罗斯的伏尔加河流域、从当今的奥地利—匈牙利边界到也门甚至埃塞俄比亚的广阔区域。18世纪，奥斯曼帝国在黑海和高加索地区的霸主地位被沙俄取代；19世纪，它在巴尔干半岛的领地分裂为一系列民族国家，其中以希腊最为著名；到了20世纪，它又失去了阿拉伯地区。自此之后，巴尔干半岛和中东地区便向世界呈现了一系列难题，以至有些人颇为缅怀奥斯曼帝国的昔日荣耀。

1916年，那位被称为“阿拉伯的劳伦斯”的英国人曾付出艰辛的努力，带领阿拉伯人反抗土耳其人——尽管当时的外国人都那样称呼奥斯曼人，但是他们自己只在后来才开始使用这个称呼。1919年英国控制伊拉克后，劳伦斯俯视这片古老的土地，并思忖为何英国在伊拉克的驻军多达10万人，并装备坦克、飞机以及毒气等武器，这个地区依

然会陷入持续不断的血腥冲突之中。相比之下，在土耳其控制的巴士拉、摩苏尔以及基尔库克这3个伊拉克省份，虽然只有1.4万名从当地招募的维稳人员，且每年仅处决90人，却依然能够维持这些地区的和平。这种疑惑同样存在于巴勒斯坦地区，英国曾经耗尽30年的时间，试图让犹太人和阿拉伯人达成协议，但是最终只得撒手不管，将其交由联合国处置。巴尔干半岛（或者高加索地区）则展现了这个谜题的另一种版本。奥斯曼帝国维持了和平，或者说其在某种程度上掩盖了各种问题，这与英属印度的情况颇具相似之处。尽管1904年英国驻印度总督曾认为英国能够“永远”保留这一殖民地，但英属印度仅仅维持了不到一个世纪。

英属印度以分裂告终，并导致了巴基斯坦的诞生。由于孟加拉国后来也寻求独立，巴基斯坦最终也惨遭分裂。根据阿富汗地区形势的发展，就算巴基斯坦再次解体，世人也不会过于吃惊。这便引发了一个关于现代土耳其的核心议题。在现代，伊斯兰教在国家政权建设中的记录并非没有瑕疵。我们没有必要追溯至年轻的土耳其中亚史学家哈桑·阿里·卡拉萨尔（Hasan Ali Karasar）所论述的那样遥远的时代，并抛出“伊斯兰教、政治、经济：择其两者”的议题，但是这个问题确实值得关注。要回答这一问题，必须对奥斯曼帝国以及在安纳托利亚地区继承其衣钵的土耳其共和国进行认真研究，奥斯曼人的成功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伊斯兰教？或者反过来说，奥斯曼人在不重视伊斯兰教的时候是不是更成功呢？

土耳其共和派分子坚决认为应该实施政教分离，并将伊斯兰教视为发展的巨大阻力。当共和派分子在1923年建立共和国之时，他们效仿的是法国。早在1905年，法国就已实现政教分离。当时，在刺刀的逼迫下，法国国内的修女被迫离开了女修道院。天主教会曾一致错误地赞同对所谓的犹太间谍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Alfred Dreyfus）进行迫害，并为此付出了代价。但是，法国拥有源远流长的反教权主义传统，坚定的共和派分子辩称天主教应该为法国地位的下降以及被英德

赶超负责。意大利人和西班牙人也持同样的观点。现在，土耳其试图加入欧盟，如果要寻找一位患难知己，则非西班牙莫属：西班牙曾经是拥有700年伊斯兰教历史的世界帝国，后来成为实行军事独裁的民族国家，而且这段历史距今并不久远。土耳其并没有像西班牙那样爆发惨烈的内战，但是它在“一战”中的悲惨遭遇则使其与西班牙同病相怜。

土耳其共和国的缔造者对于奥斯曼帝国的遗产充满敌意。1924年，数百名奥斯曼帝国王室成员被驱逐出境，每人仅获得2 000美元的补偿，这些人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被允许回国。法国著名作家马塞尔·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的作品中有一句话，暗指一些人将历史看作一只刚刚孵化出的小鸡，仅能看到它自己的些许蛋壳。但共和派毕竟赢得了土耳其独立战争的胜利，这是土耳其人历经千辛万苦，自17世纪以来取得的第一次真正胜利。奥斯曼帝国苏丹与英属印度的阿加汗（Aga Khan）一样，希望与西方强国，特别是英国达成妥协。土耳其共和派分子遂将奥斯曼帝国苏丹及其他旧帝国体制一并废除。圣索菲亚大教堂被改造成一座博物馆，伊斯兰主义者被无情地驱逐，而代替他们的则是从希特勒魔爪下逃出的众多难民——本书正是以此为开篇。

土耳其共和国取得了显著成就，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当时，土耳其发生了军事政变，堪比智利的皮诺切特军事政变。在我写作本书时，两个世界级的工程项目已经在土耳其破土动工。第一个工程是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底部修建隧道，运行由安卡拉驶往欧洲的快速列车。相比于这一工程，第二个工程甚至更加宏伟。除了个别区域，土耳其东部的大部分地区依然处于落后状态。现在，土耳其开始在古老的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上游修建大型水坝，这不仅便于灌溉和发电，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社会革命。这是因为安纳托利亚东部地区（主要为库尔德人居住区）所呈现的崭新的繁荣态势，使得该地区与其东部和南部的邻居卓然不同。但是，土耳其共和国遇到了困扰

所有启蒙运动的难题：得鱼忘筌。土耳其世俗主义者的重要地位逐渐被在宗教上更加保守的安纳托利亚人取代，土耳其人开始对自己的身份认同产生诸多疑问。

如果你是土耳其人，那么你需要探寻自己的归属到底是古老的当地突厥传统、波斯、拜占庭，还是伊斯兰或者某个伊斯兰教派，又或者是自觉的西化。土耳其共和国申请加入欧盟的艰辛历程，将这个问题推到了风口浪尖。而土耳其在此辩论进程中还完成了另一个重要的转变：土耳其的大部分地区已经相当繁荣（在经济层面，土耳其已超过欧盟的前共产主义成员国，而且又一次与西班牙的情况类似，已经在经济上实现了“腾飞”）。土耳其共和国的早期领袖是彻头彻尾的西化主义者，他们的意识形态深深根植于土耳其民族主义之中，决心消除宗教在公共生活中的影响，动辄以蒙昧主义的借口随心所欲地打击伊斯兰教。但是，问题绝非这么简单。土耳其各地区日益繁荣，安纳托利亚地区沉睡的城镇也在逐渐苏醒。这些地区的政治取向是宗教性的，而目前治理土耳其共和国的政府经常以欧洲的基督教民主为榜样，这引起了民众的普遍憎恶。如今的土耳其民众极其珍视其充满荣耀的历史，即使是出租车司机也知之甚多。

这并非是一位旁观者的评论，而且我也一直在极力避免这种状况，但是我仍想说现代土耳其正在拙劣地效仿类似于19世纪晚期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Abdülhamit II，1876—1909年在位）所进行的变革。当然，我并不知道结果将会如何。如今，人们正在重新审视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这位历史人物。在哈米德二世时代，奥斯曼帝国与西方进行了广泛的合作，但是它仍以宗教立国（至少在理论上）。奥斯曼帝国在教育领域也进行了变革，在缔造土耳其共和国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专业知识分子阶层也从此崛起。但是，专业知识分子阶层和军队却反过来推翻了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的统治，有关于此的争论至今仍在延续。

我希望在上文中列举的6种归属已经融入今日土耳其的形成过程之中。对于即使像我这样长期居住在土耳其的外国人来说，它们也是不尽相同的，我的诸位土耳其好友，不管有意还是无意，使我了解到很多这方面的知识。我在此不能一一列举以致谢意，但他们会理解的。我只能说自己非常喜欢在比尔肯大学任教，特别是在本科生部，而且多年来，我依然与一些已毕业的学生保持着往来。我的土耳其语也有所长进，虽然许多出租车司机听到我带着苏格兰口音的土耳其语时，常常会困惑地大摇其头。我依然记得每周在海峡大学举办欧洲历史讲座的经历，并对此怀有特殊的情感。很荣幸，我以前在海峡大学的两名学生——目前在比尔肯大学任教的哈桑·阿里·卡拉萨尔以及在剑桥大学彼得学院任教的穆拉特·希维劳古鲁（Murat Siviloğlu），他们与资深土耳其历史专家安德鲁·曼戈（Andrew Mango）一起批阅了我的手稿。在比尔肯大学任教的法赫里·迪克卡亚（Fahri Dikkaya）是考古学方面的专家，他在奥斯曼帝国早期历史方面给我提出了很多有益的建议，使我避免得出一些武断的结论。如果文中出现了纰漏之处，也可能是因为“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最后，我还要感谢Thames & Hudson出版社极其高效的出版团队，以及我的出版代理卡洛琳·米歇尔（Caroline Michel），她负责组织了本书的出版工作，我从中受益良多。

对本书中术语的说明

我坚决认为在历史作品中应该使用历史术语——当然我无意冒犯任何人——因此“君士坦丁堡”和“士麦那”会一直使用到奥斯曼帝国末期，这就如同“阿勒颇”和“萨洛尼卡”是标准的称谓一样。我忽略了它们在奥斯曼抄本中的区别，因为这种差别只有在阅读原本时才有意义。

序曲

弗里茨·诺伊马克（Fritz Neumark）用德语创作了一部名著，即一本名为“博斯普鲁斯避难记”（*Zuflucht am Bosporus*）的土耳其回忆录。尽管他不是一位浪漫主义者，却详细描绘了自己在1933年夏末乘船到达伊斯坦布尔时的美好场景。时值夏末秋初，伊斯坦布尔林木茂盛，处处郁郁葱葱。客船依次穿过蓝色清真寺、圣索菲亚大教堂以及托普卡帕宫，在穿过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入口金角湾之后，便到达了加拉塔大桥，桥上有一座高耸入云的中世纪时期的意大利式灯塔，这种建筑样式在文艺复兴时期的画作中极为普遍。库尔德搬运工背负着诺伊马克的行李走上街道漫长的台阶，将他送到公园旅馆歇脚。这个旅馆紧挨着原来的德国大使馆，是一座装饰成婚礼蛋糕样式的建筑。在到达博斯普鲁斯后不久，诺伊马克参加了由外交部部长举办的接风宴——如果需要一件晚礼服，一位希腊裁缝在三天内就能赶制出来。作为一名从希特勒的魔爪下逃出的难民，诺伊马克在新伊斯坦布尔大学获得了讲授金融学原理的教师职位。在此期间，大约有1 000名德国难民来到土耳其，甚至有一段时期，爱因斯坦差点成为他们的领袖。当时，爱因斯坦已经接受了理论物理的教学职位，但由于土耳其政府希望他讲课而他又不愿意，因而最终没有就任，而是选择了普林斯顿大学。尽管如此，其他到达土耳其的德国难民也非常优秀，以至新伊斯坦布尔大学在近10年的时间里名列世界大学前茅。

威廉·勒普克（Wilhelm Röpke）在新伊斯坦布尔大学讲授经济学，他后来成为德国战后经济奇迹的总设计师；汉斯·赖兴巴赫（Hans Reichenbach）讲授数学哲学，并组织了土耳其的滑雪队。这些难民中的佼佼者非赫尔穆特·里特尔（Hellmut Ritter）莫属，他是一位性情古怪、吝啬、脾气有些拧的人，曾在“一战”期间服役于德国情报部门。

他精通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堪称玄妙的伊斯兰诗歌方面的专家。由于同性恋问题（考虑到当时的时间以及地点，这应该是相当前卫的），他被迫从汉堡东方研究所离开，来到土耳其。最初，他在安卡拉火车站的一个弦乐四重奏乐团演奏大提琴，勉强维持生计。随后，他成为伊斯坦布尔大学的图书馆员，负责重新编排书目。在此之前，该图书馆的书目由一个蓄着胡须的小老头负责，他把图书条目潦草地写在纸片上，然后将它们存放在抽屉里。

那些德国难民中的配角也同样素质超群，其中包括卡尔·埃伯特（Carl Ebert）。他是格林德本歌剧院的首席艺术指导师，在1936年创立了安卡拉音乐学院中的歌剧和戏剧学院。作曲家保罗·亨德密特（Paul Hindemith）则帮助重组了土耳其的音乐教育。在这些难民中，最有名的莫过于恩斯特·罗伊特（Ernst Reuter），他于1948年成为西柏林市的市长。那段时间苏东阵营正在对西柏林进行封锁，还发生了著名的柏林空投行动。罗伊特被英国贵格会教徒从集中营中救出，并在1935年到达安卡拉，讲授城市规划课程。他精通土耳其古语，因而肩负起土耳其语言改革的使命，这项任务主要是用适当的土耳其古语词汇取代阿拉伯和波斯语词汇。罗伊特曾在1917年作为战俘被关押在中亚地区，因而被认为拥有深厚的土耳其古语功底。很可能是罗伊特推进了土耳其语的改革。另一方面，他在安卡拉很受爱戴，他个子很高，经常戴着贝雷帽，骑着一辆旧式自行车四处走动，而关于他的风流韵事广为流传。作为土耳其共和国的新首都，安卡拉主要是在中欧人的帮助下建立起来的：赫尔曼·扬森（Hermann Jansen）教授负责设计（充满智慧），克莱门斯·霍尔茨迈斯特（Clemens Holzmeister）教授负责执行（也充满智慧，但偏离了正常轨道）。

土耳其需要这些德国难民，正因如此，它才能够开启激进的文化、经济和军事现代化进程。今日的土耳其，也就是在1923年建立起的土耳其共和国，疆域基本未变，一直位于原奥斯曼帝国的核心地带。奥斯曼帝国在最强盛的时期，领土曾延伸到三个大洲。从17世纪

末期开始，帝国日益衰落，并在“一战”结束后解体。随着土耳其民族抵抗运动的发展，土耳其共和国应运而生，其领导人决定扭转土耳其继续衰落的趋势，开始推进现代化进程。在这些改革举措中，最重要的莫过于1928年的语言改革。当时，土耳其语主要用阿拉伯字母拼写，包含大量阿拉伯语词汇，涉及情感或者食物时还包含大量波斯语词汇。但是，阿拉伯语是一种喉音式语言，仅有3个元音，而土耳其语有8个元音。在辅音方面，旧土耳其语也存在诸多问题，仅阿拉伯语字母“z”就有4个版本。对于土耳其人来说，如果要提高普通民众的文化水平，拉丁字母甚至是西里尔字母会更实用。正如土耳其历史上经常发生的，军队在语言改革进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在“一战”期间，如果土耳其军方要发送一份加密电报，首先需要将源语言翻译成法语，然后再进行编码并经莫尔斯电码发送，接收方则需要将其解码后再翻译成土耳其语。当时，已经有军官呼吁将整个过程简化，于是在战争结束10年后便发生了如下一幕：在一个月的时间内，土耳其字母全都实现了拉丁化。

最终，土耳其民众的文化水平确实有所提高，现在土耳其每年能够引进1.1万册外版书籍，而中东地区每年引进的外版图书只有300册。土耳其作家很早就已在世界文坛占有一席之地，《哈利卡纳苏斯的渔民》（*The Fisherman of Halicarnassus*）在20世纪40年代就已在英国成为畅销书，正如今日的奥尔汗·帕穆克（Orhan Pamuk）的作品一样。但语言改革同时也伴随着巨大的退步：许多文学传统遗失；在旧帝国应用科学学院——这所大学的官方名称——学者们反对进行语言改革，而且故意拖延。1932年，这所大学被关闭，因而才需要大量引进外国人来填补空缺。希特勒将大批优秀的德国人驱逐出境，这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土耳其的红利，但是这些难民仅仅是众多来到土耳其的外国人中的后来者。20世纪著名的土耳其诗人纳齐姆·希克马特（Nazim Hikmet）就是一位被驱逐的波兰人的外孙，他曾创作了一句流传已久的土耳其名言，将土耳其在安纳托利亚地区的占领举动描述为：“冲出亚洲，像一匹母马的头一样延伸到地中海地区。”

第一章
起源



来自穆罕默德·赛义赫·卡拉姆，突厥游牧部落的帐篷，中亚，14世纪。纸上用的是不透明颜料及油墨，大小为19厘米×36.4厘米。现存于伊斯坦布尔托普卡帕宫博物馆，H. 2153，fol.8b。

托普卡帕宫是奥斯曼帝国的重要建筑，它位于弗里茨·诺伊马克乘船前往金角湾港口的码头时必经的狭小半岛上。这座宫殿与其他宫殿不同，虽然占地面积庞大，却不高。它以庭院的样式铺展开来，点缀着许多被称为“*köşk*”[英语中“kiosk”（凉亭）一词的来源]的楼阁，其中一些错落有致，这反映出统治者对于自身起源的认知。这座宫殿设计精巧，堪称游牧部落酋长所居帐篷的独特版本。奥斯曼帝国的标志是马尾，帐篷外边的马尾标志越多，就暗示着帐篷主人的级别越高。在军队行进过程中，帐篷经常会成为精彩绝伦的艺术作品。当奥斯曼帝

国军队在1683年包围了维也纳并占据了克拉科夫之后，曾在那里举行了盛大的帐篷艺术表演。

早期的突厥人起源于中亚的阿尔泰地区——该地区位于今日蒙古高原的西部边缘，甚至可能与西伯利亚对岸的阿拉斯加有着古老的联系[爱斯基摩语中代表熊的单词就是土耳其语中的“*ayı*”]。早在公元前2世纪，汉语词汇“突厥”便被用来指代这一来自北方的部落，这个词汇出现在很多地方，并在6世纪的中国典籍中得到正式记载。它意指善战的游牧部落，经常劫掠较发达的文明世界：“Turk”一词是居主导地位的部落的名称，意为“强壮之人”。这些游牧民族与蒙古人或者匈奴人有着密切关系，散布在中亚广袤的高原地区，屡次袭扰中华大地，甚至建立了延续数代的草原帝国，但很快便被当地定居民族同化。中国历史上的很长一段时间都与这个漫长空旷的前线地区的战争相关，长城的存在即是例证。建立于约8世纪初的回鹘政权堪称真正的草原帝国，它学习了中国的文字以及其他知识。在历史上，很多王朝都拥有显赫的突厥祖先，包括传说中的忽必烈可汗（忽必烈已成为非常普通的土耳其名字）。忽必烈在1272年建立了汗八里城，意为“大汗之居处”，也就是今北京。

一些土耳其语中的隐意可能纯属推测。“Kirghiz”（吉尔吉斯）在土耳其语中是指“42个（部落）”，还是有其他含义，比如“游牧民”？12—13世纪，马可·波罗将中国的新疆地区称为“大突厥”，此外很多地区的名称都带有突厥语的影子：俄罗斯叶尼塞河（Yenisei）的名称即来自“*yeni çay*”，意为“新河流”；而斯大林格勒的早期名称“Tsaritsyn”（察里津）与“Tsar”（沙皇）没有任何关联，而是来自“*sarı su*”，意为“黄色的河流”。当然，现在还存在一些奇怪的单词：“tundra”（苔原）在古土耳其语中是“*dondurma*”，但后者现在的意思是冰激凌。尽管安纳托利亚地区的土耳其人声称吉尔吉斯语非常简单，然而两地相距千里，因此古突厥语的派生语有时候会在相距甚远的地区各自演化。土耳其语语法很有规律，但是不同于英语，介词、

时态等都添加在主干词之后，元音则随着主干词的显性元音而变动。“pastrami”（熏牛肉）一词最好地体现了这种规律，它仅是与古突厥语有关的众多词汇中的一个。“pastrami”是原始词汇“*pastırma*”的意大利语版本，现指广泛出售的非常薄的风干牛肉片，保存在主要由孜然组成的香料中。“*pas*”是一个意为“press”（压）的动词的主干，“*tır*”（没有标点的“*ı*”与法语中的“eu”发音相似，在用于“a”之后时会改变元音）暗示着因果关系，而“*ma*”（也是一个元音变体，它本应该是“*me*”）则将该词变成了动名词。这种食物可以保存在马鞍下，使得游牧民族的弓骑兵可以在中亚高原上长途跋涉数百英里[注]。

以突厥语（使用如尼字母）创作的最早作品可以追溯至8世纪，地点大约在贝加尔湖附近，内容涉及“*dokuz oğuz*”[注]（9个部落）。之后不久，参照汉字竖写格式的回鹘体蒙古文开始盛行，并被伟大的蒙古征服者成吉思汗（1162—1227）用作外交辞令。

除此之外，这些早期的突厥人并没有留下文字痕迹，因而需要借助外部资源来学习——汉语、波斯语、阿拉伯语以及希腊语。突厥人迁移到亚洲的西部以及西南部，接近位于中亚边缘的伟大文明地区。正如我们将在下文看到的，他们如潮水般迁徙而至，并掀起了两次风浪。在13世纪早期，成吉思汗领导了一个由蒙古和突厥（或者鞑靼）部落组成的联盟。100年之后，成吉思汗的继承者帖木儿（Tamerlane，1336—1405）则是一位世界版图的破坏者。他们及其继承者占领了中国、俄罗斯大部以及印度。“Mughal”（莫卧儿）是“Mongol”（蒙古）的变形，反映出莫卧儿王朝统治者的身份。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在突厥语中，“Taj Mahal”（泰姬陵）意为“1/4的皇冠”；“Urdu”（乌尔都语）是“*ordu*”一词的变形，意为“军队”。法国学者勒内·格鲁塞（René Grousset）的巨著《草原帝国》（*L’empire des stepps*）专门论述了这些问题，指出包括阿富汗在内的整个中亚草原地区都拥有密切的突厥语联系，如果你使用突厥语很容易被理解；但是对于安纳托利亚地区的突厥人来说，他们所说的语言与波斯语的

联系最为密切。在历史上，波斯文明无疑是中东地区最伟大的文明，但至于突厥人与它的关系则存在广泛争议——这些争议不仅涉及文化传承，而且涉及伊斯兰教自身。

早在8世纪，突厥雇佣兵就已出现在波斯地区。在阿拔斯王朝后期的首都巴格达，哈里发统治着整个伊斯兰世界。此外，一些突厥雇佣兵也到达了叙利亚或者埃及地区。但是，突厥人迁移史上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件发生在10世纪末期。当时一支乌古斯（西突厥）部落来到波斯外围地区，这支部落的首领是一位塞尔柱人（selçuk）。“selçuk”在阿拉伯语中意为“小规模的洪水”，在突厥语中或许还有其他含义。这些突厥人随身携带了一些来自西伯利亚地区萨满教的宗教肖像艺术品。萨满教拥有自己的祭司，标志为游隼和雄鹰——“*tuğrul*”以及“*çağrı*”，这两个词如今依然被用作名字。1055年，他们进入了巴格达，并渗透到整个帝国：他们的首领图格里勒（Tuğrul）贝伊注在晚年时，以突厥风俗迎娶了哈里发的女儿。让–保罗·鲁（Jean-Paul Roux）是一位著名的法国历史学家，他宣称这无异于非洲酋长在手鼓声中迎娶了一位哈布斯堡公主。

随后，这些突厥人侵占了整个波斯王国。至今，各国学校的教科书仍在描述与古代战争或厄运有关的故事。很少有希腊人或者伊朗人知道，他们的祖先曾穿着优雅的白色衣服探讨诗歌中的虚拟语气，尊贵的主妇被活蹦乱跳的绵羊逗笑，黄头发的佣人在搅拌锅中的食物，天气晴爽怡人。然而，一群身材矮胖、毛发散乱的野蛮人突然到来，烧杀劫掠，扰乱了一切。这些野蛮人就是突厥人，他们的野蛮行为持续了数个世纪。另一方面，很少有土耳其人知道当地那些日趋衰落的文明以及宦官体制等，是随着他们祖先的到来而获得了某种程度的生机与活力。20世纪30年代，土耳其人被迫接受了欧式名字，意为战争的“Cenk”“Tusa”（尽管这可能是个巴尔干词汇）以及“Savas”颇受欢迎，而表示胜利的“Zafer”“Galip”“Mansur”以及“Kazan”则更受喜爱。在土耳其语中，关于战斗的词汇不胜枚举。

突厥人的主要策略是首先作为雇佣军出现，进而作为军事精英控制古老的王朝。他们适应力超群，并从他们侵略的民族身上学习。他们中的一些人还接受了当地的宗教。蒙古人接受了萨满教或者某种形式的基督教，而在其他地区，比如印度和波斯，则主要盛行伊斯兰教。在1100年前后，伊斯兰教是当时最先进的宗教（撒马尔罕的建筑最能体现这一点）。世界上最伟大文明之一的波斯文明，由突厥贵族统治。直至今日，西亚地区的人们仍疑惑为什么突厥人能够首先建立大帝国，然后又建立了一个运行良好的现代国家，而他们却没有（土耳其共和国接纳了来自那个地区的100万难民）。

最令人感兴趣的混合体是俄罗斯。拿破仑曾有一句名言："解剖俄罗斯，却发现了鞑靼。"俄罗斯于13世纪被蒙古人或者鞑靼人（Tatars，正如"Turk"一样，最初仅是居主导地位的部落的名称）征服并统治了两个世纪。俄罗斯接近1/3的旧贵族都拥有鞑靼名字：尤苏波夫（Yusupov，来自Yusuf）或者穆拉维约夫（Muravyev，来自Murat），而"恐怖的伊凡"（Ivan the Terrible)甚至就是成吉思汗的后人。鞑靼人知道如何去建立一个国家——这可以通过俄语中的"手铐"以及"国库"这两个词反映出来。俄罗斯的王子们最终复制了鞑靼人的统治模式，其中以莫斯科公国最为成功。1552年，"恐怖的伊凡"征服了鞑靼人位于伏尔加河河畔的首都喀山。19世纪，鞑靼的重骑兵在俄罗斯发动了某种形式的十字军战争。在此过程中，愤怒的农民从"鞑靼人的铁蹄下"（这个称谓仅仅在1571年才首次使用）获得了解放。当时，东正教会试图抵制"恐怖的伊凡"，因为他利用鞑靼人建立了一个不容忍东正教存在的国家。在此之前，他们的关系更加复杂，包括通婚。

波斯的突厥人被称为"大塞尔柱人"，但是他们的远亲——其他的突厥游牧部落，则迁往安纳托利亚地区。在首领阿尔普·阿尔斯兰（Alp Arslan）的率领下，这些部落（horde，这个词也来自*ordu*）进入了富庶的叙利亚地区。沿着这条通道，阿尔斯兰的部落直插拜占庭帝

国的东部边界前沿，并击败了拜占庭帝国的附属国。这些附属国主要是位于南高加索地区的基督教国家，守护着君士坦丁堡的门户。拜占庭帝国皇帝罗曼努斯·戴奥吉尼斯（Romanus Diogenes）做出了一个愚蠢的决定，亲率一支军队前往东方抗击突厥人。1071年，在曼齐喀特，也就是现在被称为马拉兹吉尔特的、位于凡湖北面高原的一块不起眼的地区，爆发了一场影响深远的战争。结果，拜占庭帝国的军队遭遇惨败，他们对于安纳托利亚中东部地区的控制被严重削弱。在之后的200年中，塞尔柱突厥人几乎占领了整个安纳托利亚地区；拜占庭帝国则退缩至君士坦丁堡、巴尔干半岛部分地区以及少数沿海地区。

塞尔柱人没有理会安纳托利亚的基督徒。在距安卡拉东部4小时车程的卡帕多西亚地区，基督徒安静地生活在这里的山谷中，并建造了拥有精美壁画的岩石教堂，成为当今世界上著名的旅游景点之一。这些壁画主要是在10世纪至11世纪早期拜占庭帝国的复兴时代绘制的，品质精良，而且其中一幅名为“我们弗拉基米尔的夫人”的作品被带至新生的基督教俄国。在塞尔柱征服之后，虽然这些壁画开始失修，它们却成为突厥人宽容及守法的文明见证。塞尔柱人对于压迫异教徒不感兴趣，毕竟他们人数太少，基督徒则遍布各地。相反，突厥人与基督徒之间的通婚和贸易现象却非常普遍。一位颇有文化品位的拜占庭公主安娜·科穆宁娜（Anna Komnene）在12世纪曾经说过，安纳托利亚地区的居民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希腊人，一类是野蛮人，还有一类是“混合野蛮人”——与基督徒通婚的突厥人。

塞尔柱王朝的首都科尼亚，在古罗马时被称为伊康，而另一座主要城市开塞利，在卡帕多西亚王朝时曾被称为凯撒利亚。这两座城市拥有一些精美绝伦的建筑，这些建筑与中亚著名的撒马尔罕以及布哈拉地区的建筑风格类似。[注]统治者在这些城市中修建了宏伟的清真寺，而且随着教育的普及，有时候还会附带修建学校和医院。但是，早期突厥人并不善于进行宗教统治，他们更倾向于设立小型的礼拜室而不是宏伟的清真寺。这种礼拜室更适合他们所接受的伊斯兰教，女

性在里边礼拜时也不用佩戴面纱，塞尔柱突厥人还会在礼拜室内饮酒、跳舞。这都反映在14世纪的阿拉伯旅行家伊本·白图泰（Ibn Battuta）的游记里。

最终，拜占庭帝国分崩离析，但是它是自西向东而不是自东向西崩溃的。罗马与君士坦丁堡之间存在激烈的竞争，并且愈演愈烈，因为罗马教皇宣称其是基督教世界的领袖，而拜占庭帝国却发展出了具有自身特色的基督教：东正教。西方——“拉丁”——十字军，主要由诺曼人和威尼斯人组成，于1204年攻占了君士坦丁堡，并大肆劫掠。这对拜占庭帝国来说是致命一击。此前，拜占庭帝国在科技方面领先于西方，西欧人到达君士坦丁堡就如同乡巴佬进城。拜占庭人拥有令人生畏的武器“希腊火”——将易燃的油类混合在一起倾倒在海面上，点燃后就可以烧毁敌方战船。正是依靠这种武器，拜占庭人抵挡住了入侵者的多次进攻。1204年，作为所谓的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的参与者，威尼斯人研制出用化学品处理皮革的方法，可以专门用来对付火攻，因而他们的战船和攻城塔所向披靡。他们跨过了由狄奥多西（Theodosius）皇帝在5世纪建造的高大坚固的城墙，并洗劫了君士坦丁堡。在现已成为泽伊雷克清真寺的全能者基督修道院中，曾经埋葬着众多科穆宁王朝的皇帝，然而他们都被从坟墓中刨了出来。今天，唯一能够证明他们存在过的标记是残留在高墙上的一块薄金片，它由于位置太高而免于被搜刮。在之后的两个世纪中，拜占庭帝国处于拉丁人的控制之下。后来，尽管拜占庭人得以复国，但那时的拜占庭帝国已残破不堪。拜占庭帝国实际上由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统治，而他们之间却围绕黑海贸易展开了激烈争夺（土耳其海岸依然残存着他们的堡垒遗迹，而且俯瞰着整个伊斯坦布尔港口的加拉塔灯塔也曾是热那亚人城堡的一部分）。后来，贸易争夺战的参与者增至4个：拜占庭人、威尼斯人、热那亚人以及突厥人。

随着蒙古人的西征，塞尔柱王朝的黄金时代在13世纪早期终结。从某种程度上说，蒙古人也是突厥人，而成吉思汗则是一位征战天

才。没有人可以击败蒙古人的弓骑兵，而且蒙古人善于利用拥有特殊技能的外国人，具有很强的学习军事技巧的能力，从而能够连续攻城陷阵。如果敌人投降，蒙古人会或多或少地放任他们自由生活；如若遭遇抵抗，则必定血流成河。须知，标志蒙古人统治的旗帜上就画着由头颅堆积而成的金字塔。至今，在塞尔维亚的尼什尚且保存着一面这种类型的奥斯曼帝国版本的旗帜。俄罗斯、波斯以及塞尔柱突厥人先后臣服于蒙古。尽管莫卧儿王朝后来才建立，但是通过借道阿富汗，蒙古人在当时已经降服了印度北部地区。蒙古人最后止步于叙利亚和德意志，并非因为这些地区的军队善战，而仅仅是因为显而易见的原因：这些地区没有战马需要的足够草场，而草原帝国却严重依赖它。经过一两代人的时间之后，文明程度更高的原住民开始负责经营他们的王朝，而蒙古人或者突厥人则主要充当统治贵族。纵使在环境方面略有差异，这种情况同样发生在埃及：统治着这片土地的马穆鲁克人，就是来自高加索地区的突厥人的后代，而“马穆鲁克”本身的意思就是“奴隶”。

蒙古人在13世纪蹂躏了波斯地区，继续向西推进并重创了安纳托利亚地区的塞尔柱王朝。塞尔柱王朝灭亡，分裂成众多大大小小的埃米尔国。在安纳托利亚地区西北部靠近拜占庭帝国边境的地区，分布着一个小埃米尔国，其首都位于一个名为瑟于特的不起眼的地区。像其他的埃米尔国一样，这个埃米尔国的起源也是充满争议的。据称，这个埃米尔国在1300年成立，但它的早期历史主要由传说组成，缺乏明确的佐证。这个奥斯曼埃米尔国的建立者名为奥斯曼一世（Osman Ⅰ，1258—1324）。根据记载，他的父亲埃尔图鲁尔（Ertuğrul）来自东方，但是历史记载并非统治者可以用来交易的商品：他们是游牧民，而且早期（对于坟墓以及垃圾场的）考古已经予以证明。

20世纪，人们宣称早期奥斯曼人（“Ottomans”是“Osmanlı”的西化版本）是为安拉事业奋斗的热血士兵，而这个称谓本身就是对基督教

必胜主义者的回应。这些人称奥斯曼人是高贵的野蛮人，需要从拜占庭学习一切文明，但是无论如何这种说法的证据都不充足。建造于14世纪的清真寺房顶上的铭文，并没有标明早期的奥斯曼统治者将自己视为圣战者。但他们到底是不是圣战者呢？可以肯定的是，他们是游牧民或者半游牧民，其中许多人被称为土库曼人（Turcoman，最近从中亚游牧地区迁移而来，而不是来自城镇地区）而不是突厥人；他们操着特有的突厥语，而不是当时已经得到广泛使用的通用语言。但是，伊斯兰教是一个新近崛起而且扩张缓慢的宗教，虔诚的教徒按照各自的习俗进行礼拜。奥斯曼的三个主要盟友都是基督徒；他的儿子奥尔汗一世（OrhanⅠ，1324—1362年在位）迎娶了一位拜占庭公主；在一个世纪之后，奥斯曼王朝的宫廷仍使用希腊语；而且当时并没有推行一夫多妻制。

一种理论认为奥斯曼人是典型的边疆居民，对相对富裕的西部邻居发动了野蛮的征战，这种观点充满争议，却不无道理。奥斯曼人是天生的优秀士兵，却需要从其他地方学习治国经验。著名的希腊历史学家斯特凡诺斯·莱奥尼斯（Stefanos Vryonis）声称，以土地测量、税收、法律，甚至以参战交换土地的某种契约角度出发，比较拜占庭帝国晚期与奥斯曼王朝早期的历史会很有趣。圣战思想是在很久以后才流行起来的，但是学校教科书依然这样论述。

1326年，在经历了堪称史诗般的战争之后，奥尔汗一世占领了重要的城镇布尔萨。但是，此次事件的意义并不显著。拜占庭帝国的统治者放弃了此城，抱怨称自己的国家正在解体并倒向伊斯兰教。大多数肩负重税的当地民众都愿意接受奥斯曼土耳其人的统治。许多饱受剥削的民众是亚美尼亚人，他们由于信奉独特的基督教而受到信奉东正教的拜占庭帝国的打压，因而对于同异军突起的奥斯曼土耳其人结盟充满热情。在征服拜占庭帝国之后，作为对于亚美尼亚人支持自身事业的回报，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者特意准许亚美尼亚人将其宗教中心

迁往君士坦丁堡，并在很长时期内将他们称为“*millet-i sadıka*”，意思是“忠心耿耿的族群”。

奥斯曼王朝逐渐在14世纪崛起，这段历史可以被视为编年史，但是其中的历史谜团难以完全解开。黑死病曾对欧洲造成重创。这个舞台上的角色众多，并上演了合纵连横的大戏——在希腊地区有加泰隆人，在保加利亚有匈牙利人，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在黑海争斗，拜占庭帝国则经历了近20年的内战。最终，年老且失明的约翰五世（John V）结束了与约翰六世（John VI）的共治，继承了拜占庭帝国的王位。正如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指出的，“君士坦丁堡的希腊人仅仅通过宗教精神加以维系，而这种精神只能产生憎恶和矛盾”。恰在此时，奥斯曼人横空出世，他们拥有良好的军事组织和强大的军事实力，于是成为各方急于拉拢的重要对象。奥斯曼人的首领奥尔汗一世在这些派系之间巧妙周旋。在热那亚船队的帮助下，奥斯曼人于1352年首次跨越博斯普鲁斯海峡，到达欧洲地区——巴尔干半岛——以帮助其中一方。

在意大利人的帮助下，奥尔汗一世击败并占领了安纳托利亚西北部地区的一个敌对的埃米尔国，但穆斯林编年史学家并没有记录这段插曲，这无疑透露出他们对于圣战者违背自身使命的行为感到难堪。此外，穆斯林编年史学家还在其他方面遗漏了相关内容，即奥斯曼王朝还从另一个埃米尔国手中夺取了安卡拉：那里的阿拉丁清真寺就是见证，其中的一段铭文称奥尔汗一世为“苏丹”，苏丹是一个意为“所有人的君主”的伟大（而且最初是阿拉伯语）称号。可以说，这是突厥人首次使用这个称号。当奥尔汗一世在1362年去世之后，奥斯曼王朝最显著的特征是开始大规模地侵占巴尔干半岛，而且很快就占领了重要的古老城市亚得里亚堡（现名为埃迪尔内），并将此定为首都。他的儿子穆拉特一世（Murat I，1362—1389年在位）继续参加了拜占庭帝国的另一场内战，攻占了重要的港口城市萨洛尼卡，将北希腊的大部分地区与拜占庭帝国隔离，保加利亚地区的情况也大致如此。1389

年，塞尔维亚的拉扎尔（Lazar）率军在科索沃地区与奥斯曼土耳其人展开激战，结果惨败。为了复仇，一位塞尔维亚人设法接近并暗杀了穆拉特一世。自此，塞尔维亚人开始与奥斯曼人产生千丝万缕的联系。

穆拉特一世的儿子巴耶济德一世（BayezitⅠ，1389—1402年在位）继承了奥斯曼王朝的王位，他的妻子是一位塞尔维亚公主。巴耶济德一世是一位奋发有为的君主，又名“雷霆”。他横扫了巴尔干半岛，并从威尼斯人手中夺取了大片土地，但他的主要功绩是在安纳托利亚地区。当时，安纳托利亚地区还有很多埃米尔国，虽然它们最初的实力明显强于奥斯曼王朝，但都被巴耶济德一世兼并。然后，巴耶济德一世又挥师东进，最终控制了一条重要且利润丰厚的贸易路线。这条贸易路线从黑海一直延伸到安塔利亚港口，之前由强大的卡拉曼王朝控制。像其前辈一样，巴耶济德一世再次获得了成功。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奥斯曼王朝稳固的巴尔干半岛后方，因为塞尔维亚人和拜占庭人都与他并肩作战。尽管这些基督徒有时会寻求西方的帮助来对抗奥斯曼人，但是也很容易接受招募，为奥斯曼王朝东征西战。拜占庭帝国皇帝曼努埃尔二世·巴列奥略（Manuel II Palaiologos，1391—1425年在位）在穿过黑海沿岸的卡斯塔莫努地区时，曾经创作了一首著名的挽歌。这首挽歌的名字是科穆宁兵营（Castra Comneni）的土耳其语变体。科穆宁兵营曾经是昔日强大的拜占庭帝国的一处营房，曼努埃尔二世指出：“古罗马人曾经命名过我们现在身处的这一小块平原，这里有很多城市，但是它们现在已经缺失了宏伟城市所应具有的最重要因素，即民众。现在，大多数城市已经荒废了。”而事实的确如此：奥斯曼土耳其人仍是游牧民族。

奥斯曼王朝的统治获得了大部分民众的拥戴，这是真实且可以预料的：奥斯曼王朝的税收更低，而拉丁政府却征收苛捐杂税，同时实行农奴制。这些地区曾经盛行一种可称之为基督教异端的神学理论，特别是在波斯尼亚地区。这个基督教异端在很大程度上来自阿里乌教

派(注)。阿里乌教派否认耶稣是上帝的儿子，坚持认为他仅是一位伟大的先知，这与《古兰经》中的内容大同小异。但是，这些缘由并非奥斯曼王朝获得拥戴的充足理由或者决定性因素。在巴尔干半岛出现了大批基督徒转宗现象，而且他们普遍接受奥斯曼王朝的统治。

随着突厥人的推进，基督教世界警报四起。早在1291年的穆斯林反击中，十字军就已经被迫从侵占的圣地领土上撤退，但是它们依然控制着海洋，并在堡垒森严的海岛上避难，比如罗德岛和塞浦路斯岛（这些岛屿的统治者仍自封“耶路撒冷之王”，并最终将头衔传给位于德文的考特尼家族，令人惊奇的是，巴列奥略王朝的最后一位君主就在17世纪埋葬于德文地区）。奥斯曼王朝的真正敌人是控制着东地中海贸易的威尼斯人：财力雄厚、运营良好、寡廉鲜耻、实力强大。如果用一个准确的词来描述威尼斯人对于奥斯曼王朝的抵抗，那么一定是组织严密。绝望的曼努埃尔二世向西方寻求援助（曾亲自前往伦敦），并获得了响应。

基督教世界竭力将匈牙利拉进对抗奥斯曼人的阵营。令人惊奇的是，匈牙利人最初也来自中亚，是突厥人的近亲。匈牙利语采用平行写法，许多单词都与土耳其语相同（比如大麦都是“*arpa*”，游泳分别是“*yüzmek*”以及“*uszik*”，马鞍则分别是“*eyer*”以及“*nyereg*”，在这些相近的单词中，尤以帐篷一词最为显著，它在匈牙利语和土耳其语中分别是“*çadır*”以及“*csádor*”，发音都是“chador”）。拜占庭人甚至称匈牙利国王（拜占庭人授予其弯曲的十字架皇冠）为“*Tourkias archon*”，意思是“突厥人的王子”。此后，匈牙利人便在土耳其历史上占有了一席之地，从在1729年经营奥斯曼帝国第一家出版社的易卜拉欣·穆特法利卡（Ibrahim Müteferrika），到在土耳其共和国时期组织小提琴教学的利科·阿马尔（Licco Amar），甚至连阿塔图尔克（Atatürk）的园丁都是匈牙利人。

在这些人中，就有阿米纽斯·万贝里（Arminius Vámbéry），他堪称19世纪伊斯坦布尔的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注]。万贝里出生在一个犹太人家庭，本名为赫曼·班贝格（Hermann Bamberger），除他之外的家人全部因流行病死亡。最终，在被当地的一个绅士家庭收养之后，他的名字被改为万贝里。在1848年匈牙利人反对奥地利帝国的起义中，万贝里成为一名匈牙利民族主义者，起义失败后被迫迁往伊斯坦布尔。在伊斯坦布尔，他很快就掌握了土耳其语，并肩负着秘密任务到达了波斯。到达波斯之后，他马上意识到自己已经非常靠近匈牙利的起源地。他穿越沙漠，展开了进一步的探索。这带来了重大发现，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沙土之下，埋藏着伟大的文明：中国、印度以及希腊文明。这项发现使万贝里能够在温莎城堡与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共度周末，并在1902年获得了维多利亚女王勋章。

在1396年，匈牙利曾一度是基督教世界的堡垒。一支欧洲军队在保加利亚袭击了巴耶济德一世，却在尼科堡战役中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惨败。其实，二者军事实力的差异早已预示着基督徒失败的到来。奥斯曼土耳其人拥有一支现代军队，而基督教军队还在使用冷兵器。由于各个将领一直在激烈地争论应该由谁担任总指挥，即便是披坚执锐的基督教重骑兵也无法抵抗奥斯曼土耳其人的军队。当时，由于遭到来自东方的入侵，拜占庭帝国暂时得以幸存——这是突厥历史上不断重复的主题之一。奥斯曼土耳其人来自东方，蒙古人也是如此。现在，这些征服者中最后一个同时也是最恐怖的一个——帖木儿出现了。

与成吉思汗一样，帖木儿自己就是突厥部落卡格塔伊分支的一员。在24年的时间里，他重建了成吉思汗时期的大帝国，并大肆破坏和屠杀。帖木儿大军所到之处，头颅堆积如山，甚至连位于俄罗斯的金帐汗国也没能幸免。这个“怪兽”在1405年去世之前，已经集结了一支规模庞大的军队，并准备征服中国。在此之前，帖木儿击败了巴耶济德一世，重创了势力不断膨胀的奥斯曼王朝。1402年，在安卡拉地

区（今埃森博阿机场的位置）爆发了一场激战，结果奥斯曼王朝惨败，巴耶济德一世被俘。那些在安纳托利亚地区曾遭巴耶济德一世驱逐的埃米尔都在帖木儿处寻求庇护，而那些被奥斯曼王朝征召的前埃米尔国的士兵则临阵脱逃。在一片森林中，帖木儿埋伏了大批战象。当时，这片森林（现已消失）将安纳托利亚高原分割开来，奥斯曼军队也被分割成几段。此战之后，巴耶济德一世的王朝又重新陷入割据状态，之前的埃米尔国都重新恢复。拜占庭帝国得以保存，甚至收复了萨洛尼卡地区，因为巴耶济德一世的一个儿子需要得到拜占庭帝国的帮助以对抗另一位兄弟。

1402—1412年是奥斯曼王朝的大空位期，这一时期充满争议，原因与奥斯曼王朝的建立问题一样。奥斯曼王朝之所以能够强盛，是因为它是伊斯兰国家，还是因为它隐秘地倒向欧洲？巴耶济德一世的其中一个儿子苏莱曼（Süleyman）曾与拜占庭帝国、威尼斯以及十字军最后的代表圣约翰骑士团进行合作。当时，基督教世界刚刚出现文艺复兴，或者说是大家津津乐道的资本主义复兴。难道那不是奥斯曼王朝的未来？但是，奥斯曼王朝的历史首先是安纳托利亚地区的胜利，随后就被抛弃在历史的尘埃中。在海峡对岸的安纳托利亚地区，巴耶济德一世的另一位儿子最终胜出。曾经是苏莱曼盟友的拜占庭帝国现在已经行将就木。穆罕默德一世（Mehmet I，1413—1421年在位）重建了父亲的帝国，他的儿子穆拉特二世（Murat II，1421—1451年在位）则发动起奥斯曼王朝的战争机器，发起了针对欧洲的大规模战争。

奥斯曼王朝为什么要建立这个强大的战争机器呢？其中的一个答案点出了问题的关键：它是一个军事王朝。奥斯曼王朝没有贵族阶层：如果获得苏丹的提拔，你就会升职；如果你许诺提供骑兵，就会获得土地，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你的后代可以继承。在非军事层面，情况也是如此，一位拥有天分的行政人员可能会获得官职和财富，但是一旦死亡（或是因为苏丹一时兴起而被处以死刑），便会失去一切。

在奥斯曼王朝早期，存在着某种形式的寡头政治，奥斯曼人仅是领袖而已。当时，在奥斯曼王朝存在很多显赫的家族，比如势力强大的坎达尔里斯家族，曾一度垄断了大维齐尔[注]的职务，并建立了自己的清真寺。在旧都布尔萨，这个家族建立的清真寺甚至比奥斯曼帝国的任何清真寺都要宏伟，而且享有同等的重要性（此外，这个家族还在布尔萨建立了跨越博斯普鲁斯海峡到达拜占庭帝国的独立贸易网络）。同时，在奥斯曼王朝中还有大量已皈依伊斯兰教的拜占庭贵族，他们也建立了自己的世袭家族，比如曾为奥斯曼帝国征服了希腊的埃夫雷诺斯（Evrenos）贝伊。

当代作家对于穆罕默德二世（Mehmet II, 1451—1481年在位）打破相对平等的制度充满怨言。穆罕默德二世将归属的埃米尔国首领视为属下，迫使他们顺从于自己的权威，这是因为他建立了一支隶属于自己的军队，这些军人从小就接受了严格训练。当然，当你进一步挖掘这段历史时，会发现它存在着鲜明的基督教因素——奥斯曼帝国就如同已经建立了良好运行体制的拜占庭帝国（毕竟，奥斯曼帝国3/4的臣民都是基督徒）。在穆拉特一世时期，奥斯曼国家机器的关键部分已经出现：耶尼切里军团。14世纪晚期，随着奥斯曼人侵占了希腊的大部分地区，他们突然想到建立一种军事体制，征召年幼的儿童，让他们接受严格的教育，皈依伊斯兰教，并学习土耳其语。穆拉特二世进一步发展了这个体系（它被称为“*devşirme*”或者“lifting”）：这些男孩在宫殿内享有特权，同时接受必要的知识和技能培训。一些男孩毕业后成为苏丹的书吏，并担负起管理国家的职责，其他人则组成了新军队的核心。这支军队拥有其他军队所难以媲美的团结精神，被称为“新军”，即耶尼切里军团。耶尼切里军团是一支勇猛威武之师，他们的勇气和意志足以让敌人闻风丧胆，但也令敌人艳羡。耶尼切里军团拥有自己的军乐和独具特色的礼仪性行军方式（前进两步，后退一步，头转向旁边），具有很强的团队精神，而且拥有独立的训练场、营房或者学校。

当时的奥斯曼王朝苏丹无疑是英明的君主，非常乐意参加接待活动，埃迪尔内的宫廷中弥漫着一种自由欢快的气息，来自全国各地的人士进出宫廷拜谒苏丹，苏丹则会用希腊语、土耳其语或者塞尔维亚语与他们交谈。同时，一种新型火炮的出现为奥斯曼王朝增添了新的色彩。君士坦丁堡的狄奥多西城墙将难以阻挡这种新型火炮的攻击。

到15世纪中叶，拜占庭帝国仅存君士坦丁堡及其腹地，并没有人关心。现在，各方势力最主要的兴趣是君士坦丁堡在黑海和地中海商路中的重要地位，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为此展开激烈争夺，而奥斯曼帝国则需要这条商路带来的收益。拜占庭帝国真正的末代皇帝约翰八世（John VIII，1425—1448年在位）持续向西方寻求帮助，甚至亲自前往意大利求援，但收效甚微。罗马教皇声称会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但是拜占庭人需要承认他在基督教世界中的领袖地位，而且必须放弃自身的正统信仰。拜占庭帝国的精英阶层可能乐于接受教皇的建议，普通民众却非如此——他们憎恨拉丁人，其程度丝毫不亚于谢尔盖·爱森斯坦（Sergei Eisenstein）导演的电影《亚历山大·涅夫斯基》（*Alexander Nevsky*）中俄罗斯人对于残暴且劫掠成性的条顿骑士的仇恨。拜占庭帝国的神职人员也不愿苟同，因为他们担心俄国会乘机攫取东正教的领导权。约翰的继承者君士坦丁十一世（Constantine XI，1449—1453年在位）决定采取大胆的行动。他寄希望于西方的支援，并向拒绝支付贡金的奥斯曼土耳其人发起了挑战。

穆拉特二世死后，他年轻的儿子穆罕默德二世决定终结不遵守协议的拜占庭帝国。1452年年底至1453年年初，他集结了一支规模庞大的军队，并组建了一支舰队。在土耳其海峡亚洲一侧的博斯普鲁斯地区，奥斯曼人已经修建了一座宏伟的城堡，穆罕默德二世在海峡的欧洲一侧又修建了另一座城堡。鲁梅利堡垒位于土耳其海峡的最窄处，大部分遗迹依然保存良好。这座堡垒上的火炮能够击沉任何途经的船舶，因此阻断了君士坦丁堡与黑海的联系。君士坦丁堡的城墙曾经在数个世纪中成功地将进攻者拒之城外，无数入侵者止步于城墙脚下。

这些城墙从罗马时代就已开始修建，一些地区的城墙甚至拥有三层墙体。这些墙体敦厚且扼据险要之处，守城者可以获得良好的防护，并利于突然出击。敌军的舰队难以突破金角湾，因为一条巨型的可以悬浮的铁链锁断了前进的道路，而铁链的另一端则固定在加拉塔。当时，加拉塔地区掌握在保持中立的热那亚人手中。此外，拜占庭帝国还拥有终极防御武器：希腊火。然而，到1453年时，君士坦丁堡用以阻止敌人攻击的诸多障碍都被穆罕默德二世清除了。

虽然火药早在14世纪就由中国传入，但是火炮极难铸造，因为当浇灌铁水时，炮管可能会产生极小的裂痕。在使用火炮时，一旦这些裂痕在热力膨胀的情况下发生爆炸，就可能对使用者造成致命伤害。1460年，苏格兰的詹姆斯二世（James II）因火炮发生爆炸而当场身亡。今天，克里姆林宫还珍藏着另一件超级武器——沙皇炮（1586），但它从未被使用过。然而，奥斯曼土耳其人却设法建造了可以投入使用的巨型火炮。一位名为乌尔班（Urban）的普通匈牙利人带着火炮样品前来拜见君士坦丁，君士坦丁由于没有资金而不予支持。穆罕默德二世拥有铸造火炮的足够资金，因此乌尔班为奥斯曼王朝铸造了两门巨型火炮。在一个由60匹马和300人组成的队伍花费了三个月的时间之后，奥斯曼土耳其人终于将这两门巨型火炮从埃迪尔内运送到君士坦丁堡城墙的最薄弱处：此处的城墙边上有一条河流，城墙不得不依河而建，因而这段城墙相对薄弱且存在防守盲区。穆罕默德二世的性格在此过程中充分体现出来：他密切监督着这些巨型火炮的铸造，掌握了乌尔班使用的技术，消除了在炮管制造中可能产生的任何微小裂痕。完工之后，这些巨型火炮就能发射重约450千克的炮弹（那时，法国人只能造出发射约113千克炮弹的中型火炮，而且这种火炮发射出的炮弹会从墙上弹开）。这两门巨炮是奥斯曼土耳其人手中最重型的武器，此外他们还有近百门中小型火炮。

这段伟大的城墙得以苟延残喘，尽管守城者在竭力抢修城墙，但他们却面临着更棘手的问题：抗击进攻者的军队太少，而穆罕默德二

世却拥有一支庞大的军队，人数多达20万人，其中很多人是基督徒。君士坦丁堡的城墙上仅有9 000人驻守（其中很多守军是穆斯林，他们是一位奥斯曼王朝王位觊觎者的支持者）。此时，君士坦丁堡的人口已大规模缩减，仅剩5万人，而且城内很多地区都已荒废（甚至出现教士靠出卖教堂中颇有历史的大理石以维持生计的状况）。城中的一些古老建筑已年久失修，甚至君士坦丁十一世自己也只能生活在布雷契耐宫中。与昔日宏伟的宫殿相比，布雷契耐宫无疑要寒酸很多，而且外形败破，并因维修费用过高而难以修复。生活在加拉塔地区的热那亚人拥有强大的防御能力，依然保持中立，且不急于废除与奥斯曼王朝达成的利益丰厚的贸易协议。相应地，穆罕默德二世没有坚持让热那亚人释放铁链的另一端。相反，通过使用圆木，奥斯曼军队将其舰队从博斯普鲁斯的巴斯卡塔斯运送到金角湾的卡斯姆帕萨。在那里，奥斯曼人已经消灭了拜占庭的舰队，否则奥斯曼帝国的军队可能会遭受一定的损失。现在，奥斯曼帝国军队通过进攻君士坦丁堡的另一段城墙，进一步分散守城的兵力。在火炮的密集轰击下，君士坦丁堡的一段城墙出现垮塌，拜占庭帝国走向终结：1453年5月29日，君士坦丁堡被奥斯曼土耳其人占领，君士坦丁十一世在混战中被杀。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对于50年前几近解体的奥斯曼王朝来说是一个伟大的成就，并且震撼了整个欧洲。

---

1. 1英里≈1.609 3千米。——编者注

2. 字母“ğ”并不发音，它只是强化前边的元音。如果对这些突厥语进行音译——正如“ı”一样——在20世纪20年代需要经历一番周折。当时，奥斯曼土耳其人部分借鉴了匈牙利人的做法，因为匈牙利人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匈牙利语中的“*gy*”与英语中的“dj”发音类似，却带有一个嗒嗒音，相当于土耳其语中的“*c*”。

3. 贝伊，土耳其语中对地位高的人的尊称。——编者注

4. 大多数建筑上都有双头鹰图案。双头鹰成为俄罗斯和奥地利的标志，人们可能很自然地认为它起源于拜占庭并反映了罗马帝国的分裂，即罗马帝国的国徽由原先的单头鹰变成双头鹰，意味着分别将罗马和君士坦丁堡作为首都。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实际上，它起源于宏伟的安卡拉安纳托利亚文明博物馆中摆放的一枚原始的泥章，上面标示着“赫梯（Hittite），公元前2000年”。

5. 阿里乌教派，又被称为亚流主义学派、阿里乌主义或者亚流主义，是由曾任亚历山大主教的阿里乌（250—336）领导的基督教派别，认为耶稣次于天父，并反对教会占有大量财富，在基督教历史中被视为异端派别。——译者注

6. 以赛亚·伯林（1909—1997），英国著名的哲学家、观念史学家以及政治理论家，堪称20世纪最著名的自由知识分子之一。——译者注

7. 大维齐尔，伊斯兰国家历史上对宫廷大臣或宰相的称谓。——编者注

第二章
世界帝国



1453年，征服者穆罕默德二世骑着白马进入君士坦丁堡。现存于德国某学校，16世纪。

在攻占君士坦丁堡之后，年仅21岁的征服者穆罕默德二世骑着他的白色战马，进入了这座宏伟的城市。这位年轻的征服者与年轻的拿破仑有诸多相似之处——能够迅速集结军队，非常了解下属，并善于激发他们的斗志。他无疑是一位伟大的军事统帅，但是像拿破仑一样，穆罕默德二世也擅长构建帝国体制，包括法律。这位征服者入主君士坦丁堡后的第一个举动便是摧毁了查士丁尼（Justinian）皇帝的巨型雕像，这座雕像曾经占据了圣索菲亚大教堂前广场的巨大空间。然而，穆罕默德二世接管了查士丁尼于6世纪管理的东罗马帝国的旧有属

地。城市的修建资金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向基督徒征收的人头税，交税的基督徒可免于服兵役，而且穆罕默德二世也尽力避免疏远他们：这毕竟是一个基督徒占主体的帝国，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仅是“拜占庭帝国”重新复活而已。这样的结局让人无比扫兴。

东正教会与新统治者展开合作。当奥斯曼帝国军队开始攻城时，东正教徒曾与拉丁基督徒共同在圣索菲亚大教堂内举行了隆重的祈祷仪式。但是，东正教徒实际上对此极为憎恶，他们的首席牧首曾说过一句名言：“比起红衣主教的帽子，我更喜欢苏丹的头巾。”在奥斯曼军队攻城期间，这座伟大的教堂一直关闭，以防东正教徒和天主教徒趁乱动武，教堂大门仅在城破之时才被开启。穆罕默德二世召见了一位著名的东正教异见分子，学者型僧侣金纳迪奥斯（Gennadios）。他们用希腊语交谈，并签署了一份协议，穆罕默德二世赐予金纳迪奥斯“大牧首”的称号。金纳迪奥斯的级别和身份相当于奥斯曼帝国的将军，享有大量财富，并成为奥斯曼帝国最大的地主，他遵循拜占庭帝国统治者的习俗，将自己打扮成一位“伟大的贵族”（此时的奥斯曼土耳其人，与他们处在远东的日本“堂兄”不同，在发特定的字母或者字母组合音时面临诸多困难。卡帕多西亚地区的主要城镇Prokopi在土耳其语中被念成Ürgüp，Sandraka被念成Zonguldak，Palaeokastron被念成Balıkesir，*Authentes*按照土耳其语的发音变成了*efendi*，成为中东地区自此至今的一个敬语）。新统治者与基督徒之间的合作亲密无间，以至苏丹如果想听音乐，只要动下手指头，就可以请来东正教唱诗班。圣索菲亚大教堂被改造成了清真寺，但是东正教徒几乎保留了剩余的所有教堂。

大多数拜占庭人在这里繁衍生息：君士坦丁的侄子们晋升迅速，其中一位成为鲁米利亚的总督，这个地区是奥斯曼帝国在巴尔干半岛南部地区的一块领地。改宗伊斯兰教的拜占庭贵族也建立了清真寺——位于城墙西侧的阿克萨赖地区的哈斯·穆拉特（Has Murat）帕夏注清真寺，以及位于博斯普鲁斯海峡亚洲一侧的旧称斯库塔里的于斯

屈达尔地区的鲁姆·穆罕默德（Rum Mehmet）帕夏清真寺。这两座清真寺显然都是按照拜占庭风格修建的，使用薄平的砖块进行巧妙的搭配，足以抵抗地震。在16世纪早期，一位名为康塔屈泽纳（Cantacuzene，他自称Spandugnino）的拜占庭贵族写了一本书，描述了威尼斯上层与土耳其权贵之间依然存在的密切血缘关系。

当时，奥斯曼土耳其人将其新首都称为康斯坦丁尼亚（Konstantiniye，后来广泛使用的名称——伊斯坦布尔——在这位作者看来，仅仅是由一个土耳其语发音导致的偏差，就如同“Ürgüp”一样）。这座新首都需要重建：征服者充分意识到自己继承了罗马遗产，并自诩罗马皇帝。今日的大巴扎就设在旧时的市中心，并拥有附属设施“hans”——一块专门设置的卫生区，商人可以在此安置他们满载货物的牲畜，并可以安全地储存他们的货物。君士坦丁堡的人口增长了一倍，到1580年时已经成为一座拥有75万人口的大都市，是当时欧洲规模最大的城市，西欧的绘画和雕刻作品无不展现出当地人对于君士坦丁堡的艳羡。

穆罕默德二世允许希腊人返回君士坦丁堡，这令一些穆斯林颇有怨言。同时，穆罕默德二世还吸引犹太人和亚美尼亚人前来，要知道这些群体在拜占庭帝国时期是不受欢迎的。在热那亚人控制的金角湾对岸的加拉塔地区，外国人（又称“Franks”，而土耳其语中的梅毒一词为“*frengi*”）也被允许居住在此，而且不会受到侵扰。随着秩序的恢复，君士坦丁堡的贸易发展迅速，威尼斯人的地位变得更加重要。行会对自身进行了严密的监督，严格控制商品价格，并保持着产品的优良品质。

穆罕默德二世遗弃了拜占庭帝国皇帝的宫殿，建立了自己的王宫——在入城主门金门附近，修建了另一座宏伟的七层塔城堡，同时在今日伊斯坦布尔大学所在的地区迅速修建了一座新的宫殿。这座宫殿位于拜占庭帝国之前的边界线附近，不久穆罕默德二世就对其产生了

厌倦。他还建立了自己的清真寺——法提赫清真寺，同时还建有附属医院和学校。这座清真寺所在的地区先前建有一座教堂，曾埋葬着拜占庭帝国早期的皇帝。随后，奥斯曼帝国又开始修建另一座新的宫殿，这座宫殿后来成为整个奥斯曼帝国的中枢，它就是今日的托普卡帕宫（意为“火炮门”，源于其在旧城墙上的位置）。托普卡帕宫拥有世界上所有宫殿中最优美的环境，位于俯瞰金角湾的狭小半岛上，扼守博斯普鲁斯海峡和马尔马拉海的衔接处。这座宫殿依照非常人性化的比例修建，拥有一直延伸到海边的大型花园。

在这些又高又厚的城墙之后，穆罕默德二世将自己神秘化，开始远离民众的视线，并由一支对当地人来说非常陌生的耶尼切里军团保护。这些耶尼切里军团士兵穿着独特的军服，演奏着自身特有的军乐。从穆罕默德二世开始，奥斯曼帝国的苏丹开始深居王宫之内。现在，一个庞大的帝国宫廷初具规模：共有30 000名雇员，其中60人负责制作蛋糕，还有数十人专门负责服侍苏丹，照顾苏丹的起居或者服侍苏丹的出行。在奥斯曼帝国的宫廷中，专门设有一个品尝师团体，由首席品尝师率领。苏丹就寝后，考虑到存在夜间行刺的风险，宫廷中还有专门的男侍卫负责警戒。所有的宫廷人员都完全依赖苏丹，因为他们在宫廷之外难以生存：在他们还是基督教男童时，便从家中被带走。这些基督教男童皈依了伊斯兰教，在经历宫廷侍从学校的严格培训之前，一直寄宿在奥斯曼土耳其人的家庭中。他们之中最优秀的人可以入选宫廷，而且可能在奥斯曼帝国身居要职，担任大维齐尔或者行省总督。虽然这项制度饱受批评，但它实际上仅影响了巴尔干半岛的一小部分人口，而且显然没有亨利六世治下的英格兰所实行的制度那么残暴（当时，英格兰在伊顿成立了一座公共学校，专门负责培训学习成绩较好的男孩，从而为皇家服务）。实际上，当时很多穆斯林家庭贿赂自己的基督教邻居，将自己的儿子过继给他们，以获得进入宫廷服侍的机会。

与继任者相比，穆罕默德二世可以说非常温和，但是奥斯曼帝国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帝国却可以追溯到他在位的时期。1481年，几乎是在当年君士坦丁被杀的地方，穆罕默德二世也同样被杀，历史竟是如此的相似（这个地区被称为盖布泽，位于马尔马拉海的亚洲一侧，距离伊斯坦布尔东部约30英里，汉尼拔当年也是在此处自杀。如今，这个地区已呈现出一片工业化景观，偶尔还会激起过客对于往昔的追忆）。穆罕默德二世逝世后，罗马教皇举行了持续三天的祝祷仪式，为其鸣钟，红衣主教也为其祷告。他的逝世不逢其时，因为苏丹的胜利才刚刚开始：在两代人的时间里，这个帝国将会急速扩张，将囊括大西洋海岸的摩洛哥，叩击维也纳的大门，深入波斯的腹地，甚至远达印度尼西亚。

穆罕默德二世并没有预料到帝国会如此强盛，在15世纪末期，他及其继承者依然面临着强大的反对势力。在奥斯曼帝国的北部地区，匈牙利经常干预巴尔干半岛南部的事务；在西部地区，奥斯曼帝国面临着实力强大、组织严密的威尼斯的威胁。当时，威尼斯人仍然管辖着希腊的大部分地区，并且控制着爱琴海的大部分岛屿，他们的舰队可以从这些地方出发并袭击奥斯曼帝国的船只。在亚得里亚海东海岸的达尔马提亚地区坐落着一系列港口城镇，它们构成了威尼斯防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使得威尼斯人能够随意干预巴尔干半岛内陆的事务。在群山起伏的阿尔巴尼亚地区，奥斯曼土耳其人与当地的英雄斯坎德培（Scanderbeg）领导的反抗势力之间爆发了长期战争。尽管这些战争打着宗教的旗号，实际上却是自然资源及贸易之争。

在波斯尼亚—塞尔维亚边界，坐落着一系列银矿。斯雷布雷尼察（Srebrenica），这座小镇的名字来自斯拉夫语中表示银的单词。20世纪90年代，这座城镇曾经在南斯拉夫战争中见证了种族屠杀。穆罕默德二世非常需要这座银矿来支撑帝国的货币体系，否则奥斯曼帝国的货币就只能使用铜废料进行铸造，然而征服需要付出巨大代价。奥斯曼帝国与威尼斯的战争蔓延至黑海地区，因为该地区是与俄国进行皮

毛和奴隶贸易的关键通道：今日土耳其语中的妓女一词为“*orospu*”，它源于中世纪的波斯语，而这个词的中间部分便来源于“Russian”（俄国人）中的“Rus”。热那亚人在克里米亚半岛及其周边地区的据点具有极高的价值，位于黑海南海岸的特拉比松（Trebizond，现在称为特拉布宗）深水港的地位也非常重要，它在当时仍处于拜占庭科穆宁王朝的控制之下。

在黑海的西北部，也存在一些重要的贸易路线以及自然资源，这一地区在历史上被称为“多瑙河公国”，其统治者有时候与匈牙利人勾结在一起，不断制造麻烦。该公国最著名的一位君主是“穿刺王”弗拉德（Vlad the Impaler，1431—1476年在位），他是吸血鬼德拉库拉（Dracula）的原型，因其异常残暴的穿刺刑罚而出名。穿刺刑罚是用一根非常尖锐、削长的木桩插入受刑者的直肠，然后小心翼翼并缓慢地往上推，避免刺穿任何重要的器官，最后从受刑者的脖子穿刺而出。如果施刑者操作不慎，导致受刑者很快死亡，那么他也将被施以同样的刑罚。据载，瓦拉几亚的统治者曾经用这种酷刑一次处决了上千人。

虽然奥斯曼帝国最终获胜，却耗时长久，穆罕默德二世及其儿子巴耶济德二世（Bayezit II，1481—1512年在位）都需要从事大量的清理工作。奥斯曼帝国军队拖着火炮穿过沼泽地，在经过特拉比松地区时需要穿越本都地区的崇山峻岭，这都耗费了大量时间。但是，当穆罕默德二世逝世时，奥斯曼帝国的成就如下：1459年占领了塞尔维亚，1460年占领了雅典和摩里亚（至今西班牙国王的头衔中仍有“雅典公爵”的称号），1463年占领了波斯尼亚，1476年占领了多瑙河公国的瓦拉几亚，1478年占领了阿尔巴尼亚，1482年占领了黑塞哥维那。为了控制意大利在克里米亚半岛及亚速海的贸易港口，在黑海地区，穆罕默德二世最优秀的将军盖迪克·艾哈迈德（Gedik Ahmet）帕夏与派系繁杂的鞑靼人结成联盟，进行了一场艰苦卓绝却又气势恢宏的战争。当巴耶济德二世接手时，黑海已成为奥斯曼帝国的内湖，基本上

禁止了西方船只的出入。这些商贸活动增加了奥斯曼帝国的财政收入，在一定程度上支撑了其耗资巨大的军事征服行动。

奥斯曼帝国的扩张持续推进，而且规模越来越大。但是，当穆罕默德二世逝世之后，帝国的征服运动暂时告一段落，这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这个迅速崛起的帝国在体制方面的固有缺陷。奥斯曼帝国的老苏丹逝世之后，谁来继承王位呢？奥斯曼王朝在早期曾借鉴了罗马帝国的做法，实行长子继承制，而其他的王子一般都会在各个省区任长官。但是，这种体制却无法阻止其他较年轻的野心勃勃的王子积聚势力并发动夺嫡之战。15世纪早期，巴耶济德一世突然逝世所导致的内讧就是一例明证，奥斯曼王朝曾一度陷入四分五裂的状态。此外，在中亚还存在着一个根深蒂固的、更加通行的合法继承传统：让统治家族中最有经验的男性成员继承王位——一般是先王的兄弟，有时候也会是他的表亲。这就是成吉思汗采取的继承方式，因为没有部落愿意接受一位毫无经验的君王的统治。经验不足的君王需要依赖摄政王或者其他显贵来稳固统治，但是这些人可能会乘机中饱私囊。穆罕默德二世曾深入思考过这个问题，在花费大量时间研习了各种法典后，最终认可了“谋杀兄弟”的惯例——继承王位后杀掉自己的其他兄弟，他自己就曾这样做过，现在巴耶济德二世再次面临同样的问题。

在这种情形下实施这项举措，托孤之臣需要尽可能长时间地掩盖老苏丹的死讯，这样他们支持的继承者才可能捷足先登。巴耶济德二世是他们最支持的候选人，他在君士坦丁堡继承了苏丹之位，并通过贿赂获得了耶尼切里军团的支持。巴耶济德二世的哥哥杰姆在安纳托利亚地区拥有深厚的根基，并获得了众多反对势力的支持，于是内讧的戏码再次上演。杰姆率众向君士坦丁堡进军，但是失败了。巴耶济德二世率军长驱直入安纳托利亚地区，然而杰姆成功逃脱，并在马穆鲁克王朝统治下的埃及或者信奉基督教的欧洲国家度过了近20年的流亡生涯。杰姆实际上是一位“镀金犯人”，并成为任何担心奥斯曼帝国扩张的统治者关心的焦点人物。

那是一个悲伤且极其感人的故事。杰姆在距离安纳托利亚海岸不远处的罗德岛上避难，依附于圣约翰骑士团。圣约翰骑士团在那时依然存在，并主要从事医疗慈善事业。在十字军东征期间，他们主要是由僧侣士兵组成的。东征结束后，他们建立了固若金汤的城堡（位于小亚细亚半岛南部的博德鲁姆城堡存留至今，它在修建时参考了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摩索拉斯王陵墓遗迹）。圣约翰骑士团的主要据点就是罗德岛，该岛面积较大，物产丰富，足以维持一支规模庞大的舰队。这些战船经常从事劫掠活动，骑士团从中受益颇多。1480年，穆罕默德二世曾经试图歼灭该骑士团，但是没有成功。圣约翰骑士团围绕杰姆大做文章，并对其进行严密控制。

1482年，巴耶济德二世自己感到羞愧难安，遂每年向骑士团支付大量资金，让其照顾好自己的哥哥。双方在希腊举行了谈判（奥斯曼帝国的一位代表曾是拜占庭帝国的贵族），谈判在体面融洽的氛围中举行，杰姆甚至和他的兄弟互赠诗歌和礼物，但这仅是表象而已。此后，骑士团又将杰姆带到法国（即使是风平浪静，从罗德岛到尼斯也要花费大约45天的时间）。杰姆的后半生一直颠沛流离，最后被教皇接纳。杰姆最终因病，也或许是对于长期流亡生活的绝望，在那不勒斯逝世。巴耶济德二世将杰姆的尸体赎回，保存在一个铅制棺材中，葬在奥斯曼帝国早期的首都布尔萨的穆拉迪耶王陵中，并为他举行了葬礼。然后，他便大肆屠杀杰姆的子嗣。（1522年，当罗德岛最终被奥斯曼帝国攻陷之后，杰姆的一位子嗣跟随骑士团逃脱。他皈依了基督教，并从教皇那里获得了一个头衔，他的后代现定居于澳大利亚。）

当手中握有杰姆这张牌之后，于1484年当选的教皇英诺森八世（Innocent VIII）便希望在奥斯曼帝国侵占更多的欧洲基督教土地之前，发动一场新的十字军战争来阻止其行动。罗马再次集结了一支新的神圣联盟军队，支持匈牙利和威尼斯与奥斯曼帝国的战争。当时，教皇本人就是重要的军事资产，因为他的意大利属地出产明矾。明矾

是一种非常珍贵的矿藏，不仅拥有医疗功效，而且还是生产一种毛织品染料的必要材料。从这种矿藏中获得的收入，再加上从兜售赎罪券中获得的大量资金，使得教皇能够组建一支小规模的舰队，并聘用了大量瑞士雇佣军。虽然如此，但问题仍然存在：教皇英诺森八世并不适合领导这场圣战。他有两位私生子，并密谋让其中一位儿子迎娶佛罗伦萨的洛伦佐·德·梅迪奇（Lorenzo de’ Medici）家族的女儿。梅迪奇接受了这个建议，但交换条件是他13岁的儿子必须担任红衣主教。

然而，圣战的口号并没有将基督教欧洲联合起来。威尼斯人需要考虑自身在东地中海的贸易利益，因此虽在公开场合怂恿基督教徒参战，却暗中向巴耶济德二世告密。匈牙利人并未得到基督徒的信任，他们经常为了向其他人炫耀而不惜花费大量金钱——匈牙利派往法国的外交使团规模庞大，穿戴统一的华丽服饰，并携带着精心准备的礼物。狂热的西班牙人对圣战颇感兴趣，却因陷入北非地区的征战而自顾不暇。各地的统治者就如同冷战时期的各方一样，都在进行着自身版本的圣战，而法国则几乎没有参战。1490年，教皇英诺森八世在罗马举行了一场大型会议，但是再一次像冷战时期一样，吸引了一批投机取巧者、探险者以及好大喜功者——可怜的杰姆、一些妄图复辟拜占庭帝国的遗老遗少、几位冒牌的格鲁吉亚王子、一些希望借此筹措资金来印刷无人阅读的宣传手册的教徒、夸夸其谈的葡萄牙人、捉襟见肘的匈牙利人以及假正经的英国人。最终，各方确实建立了一个圣战联盟，却在教皇的率领下于1508年袭击了威尼斯。不过，教皇很快调转矛头，与威尼斯结盟攻击其他势力。在各方势力的纷争中，原本可以发动的十字军战争烟消云散。

此次帮助欧洲渡过难关的并非十字军，而是奥斯曼帝国长期存在的另一个重要问题——这个问题最终摧毁了奥斯曼帝国：东方问题。如果说在基督教世界发动圣战存在诸多问题，那么在伊斯兰世界就会更加严重。1500年，东地中海地区最伟大的城市依然是开罗，而且处于马穆鲁克王朝统治下的埃及是一个海上强国。当时，埃及国力强

盛，主要得益于来自印度洋的很多贸易（比如香料、糖料以及咖啡）需要借道红海地区，而且很多穆斯林需要前往麦加和麦地那进行朝觐以履行部分宗教义务，他们为了保证自身安全也会支付大量保护金。一些人曾说，随着十字军的烟消云散，只有从埃及手中才能夺取巴勒斯坦。当时，不仅巴勒斯坦地区，叙利亚甚至安纳托利亚东南部地区都处于马穆鲁克王朝的统治之下。在巴耶济德二世时期，马穆鲁克王朝在安纳托利亚中部地区依然部署着强大的军队：巴耶济德二世与他们进行了惨烈的战争，未获胜利。与此同时，马穆鲁克王朝支持杰姆担任奥斯曼帝国苏丹，而圣约翰骑士团则在两者间朝秦暮楚。

奥斯曼土耳其人还面临着更严重的问题。至少奥斯曼帝国与埃及马穆鲁克王朝之间的战争没有涉及国家和宗教的性质等核心问题，而奥斯曼帝国与波斯的萨法维王朝之间的战争直接涉及国家与宗教问题，而且持续不断。奥斯曼帝国与萨法维王朝之间的角逐可以与奥斯曼帝国和中欧之间的争战相提并论，并一直延续到18世纪晚期。18世纪晚期，奥斯曼帝国和萨法维王朝在与俄国的斗争中日益处于下风，从而使得它们两者之间持续数世纪的争斗暂时告一段落。波斯文明无疑是一个伟大的文明，波斯帝国曾经可以与罗马帝国一决雌雄。然而，造化弄人：波斯人先是被阿拉伯人征服，皈依了阿拉伯人的宗教，尽管曾经实现中兴，但是后来又被波斯突厥人征服，被称为“大塞尔柱人”的波斯突厥人是曾经占领安纳托利亚地区的塞尔柱人更加优秀的远亲。后来，蒙古人横扫了安纳托利亚和波斯地区。1400年前后，帖木儿又占领了波斯地区，并对该地区造成巨大的冲击与破坏。在此次浩劫中，由于安纳托利亚的统治者所处的地区相对偏远和贫穷，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得以幸免，这也成为奥斯曼土耳其人迅速兴起的原因之一。当然，奥斯曼土耳其人也被帖木儿击溃，但是帖木儿很快就离开了，因此奥斯曼王朝得以迅速复苏，并向东方扩张。奥斯曼土耳其人的东进举动无疑会波及波斯地区，当时波斯地区也包括阿塞拜疆和巴格达。在穆罕默德二世时期，奥斯曼王朝与波斯黑羊王朝进行了一场战争并获得了胜利，遂占领了当时属于黑羊王朝的大片地区。黑羊

王朝是一个部落封建王朝，主要占据了安纳托利亚东南部地区。需要指出的是，帖木儿统治之下的整个波斯地区支离破碎，不堪一击。之后，奥斯曼王朝又从其竞争对手白羊王朝手中夺取了东北部的大片地区，进而控制了大部分波斯地区。虽然帖木儿王朝疆域辽阔，势力远达阿富汗地区，但只是徒具表象，很快便解体了。

在这种形势下，一个新波斯应运而生。白羊王朝灭亡后，在今土耳其边境东北部的偏远山区，白羊王朝的残部依然得以存留。15世纪末期，波斯的萨法维王朝即诞生于此。自此之后的两个多世纪的时间里，萨法维王朝成为阻遏奥斯曼帝国东扩的重要屏障。萨法维王朝兴起于1500年左右，它的建立者伊斯玛仪沙（Shah Ismail）宣扬一种反奥斯曼帝国的宗教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的差异主要在于对先知继承人的异议，但对于外围者来说几乎没有意义。它被称为什叶派，在阿拉伯语中意为“追随者”（主要是追随阿里，阿里被什叶派教徒认为是哈里发的唯一继承者，死后葬在伊拉克）。什叶派作为一个颇具感召力的伊斯兰教派别产生，与逊尼派差异显著。逊尼派统治者经常实施宗教迫害，有时甚至实施极端统治，它的主要代言人是奥斯曼土耳其苏丹及其帝国中的高级长官。当然，并非仅有奥斯曼帝国信奉逊尼派，西方国家甚至欧洲国家的大部分穆斯林都是逊尼派。在欧洲，许多基督教徒成为虔诚的穆斯林士兵，帮助奥斯曼帝国从其强劲的穆斯林对手中攻城略地。

刚建立时，萨法维王朝就占据了阿塞拜疆地区，但是，什叶派也扩展至东安纳托利亚地区——这个地区有很多游牧部落，游荡在被穆罕默德二世击溃的众多埃米尔国的废墟之上。此外，在安纳托利亚的中部和西部，众多部落和前埃米尔国残部对迅速崛起的奥斯曼帝国充满敌意，并最终演变成公开的叛乱。14世纪中叶，当奥尔汗一世和穆拉特一世向安纳托利亚东部扩展势力时，他们曾残酷地对待当地的手工业行会。这些行会中最重要的是阿里兄弟会，它在安纳托利亚地区的势力尤为强大。在奥斯曼帝国的空位期，安纳托利亚西部地区曾发

生过大规模的骚乱。在一位族长付出巨大牺牲后，此次骚乱才被镇压下去，但这位族长的追随者却被流放到安纳托利亚东部地区。对于这些追随者来说，什叶派便成为他们的旗帜。

但是，安纳托利亚地区的什叶派并没有公认的权威教条，因而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当地的传统（土耳其地区的一些什叶派习俗甚至与基督徒相差无异）。然而，15世纪晚期，一个新的运动开始在安纳托利亚东部地区兴起，运动中的精英以“红帽军”（*Kızılbaş*）著称。这些红帽军戴着拥有12道褶皱的红色高挑头巾，以此表明他们所承认的正统哈里发的数目。对于他们来说，马赫迪（“mahdi”，在土耳其语中为“*mehdi*”，意为“救世主”）无处不在，并且最终会复临人间。这些红帽军没有把奥斯曼帝国放在眼里，并在1502年被禁止进入君士坦丁堡。但是，他们的赞助者和激励者伊斯玛仪沙却势力日盛：他宣称自己是马赫迪，获得了追随者的坚定支持。伊斯玛仪沙于1508年占领了巴格达，并希望与威尼斯结盟以共同对抗奥斯曼帝国。1510年，伊斯玛仪沙率军袭击了特拉比松。当时，这块地区由巴耶济德二世的儿子塞利姆一世（SelimⅠ）驻守。但是，塞利姆一世却接到父亲不允许抵抗的命令，因为这位老苏丹已日益疲惫和昏聩，仅仅祈求和平。1509年，君士坦丁堡发生了一场强烈的地震，巴耶济德二世不得不到旧都埃迪尔内避难。塞利姆一世是一位拥有独特身份的王子，曾经迎娶了克里米亚汗国格来（Giray）王室的一位女儿，因而选择到自己的儿子苏莱曼一世（SüleymanⅠ）管理着的克里米亚半岛避难。此时，塞利姆一世已不再是一位与众不同的王子，而将成为奥斯曼帝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苏丹。

1511年，安纳托利亚西南部地区的一个省份爆发骚乱。阿舒拉节是纪念侯赛因遇难的节日。在什叶派教徒看来，侯赛因是一位正直的先知继承者。在这个伟大的日子里，红帽军举行了起义。此次起义由一位名为沙赫库鲁（Sahkulu）的人率领，他被拥护者尊称为喀喇波耶克勒奥卢（Karabıyıklıoğlu，意为“黑胡须人的儿子”）·哈桑哈里发。他

富有激情，充满鼓动性，自诩马赫迪。这次起义并不仅仅是一次农民起义。由于为苏丹效力的基督徒战绩卓越，一些穆斯林士兵赖以生存的土地被侵占，遂引起了他们的不满。于是，这些穆斯林士兵也加入了叛乱。一些游牧部落极其憎恶势力不断膨胀的奥斯曼帝国，也全力支持此次起义。塞利姆一世的兄弟在此地担任行政长官，不得不退回到位于黑海南海岸的安塔利亚城堡之中。起义军在各地游荡，大肆进行破坏，焚烧清真寺。他们俘获了另外一位行政长官，对其施以刺刑，并用文火慢慢烧烤，手段极其残忍。后来，叛军向东部进军，试图与伊斯玛仪沙结成同盟。在锡瓦斯附近，叛军与奥斯曼帝国军队发生激战，叛军首领和奥斯曼帝国的指挥官双双战死，此次叛乱才被最终平息。显然，巴耶济德二世已经失去了对帝国的控制，而且诸位王子开始为继承苏丹之位展开激烈角逐。至此，作为奥斯曼帝国精锐的耶尼切里军团便成为至关重要的因素。耶尼切里军团在1512年选择了塞利姆一世，塞利姆一世（1512—1520年在位）随之将父亲驱逐。不久，巴耶济德二世便去世了，是否被害不得而知。最后，塞利姆一世又将可能威胁自身统治的几十位兄弟和侄子杀害。

塞利姆一世获得了“冷酷之君”的名号。用“强硬”来形容塞利姆一世或许更加恰当，而且在俄国还有一个与之相似的人物——与塞利姆一世处于同时代的、被称为“恐怖的伊凡”的伊凡四世，这个称谓是“威胁”一词的一种变形。在一次醉酒后的暴怒中，伊凡四世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儿子。他缔造了俄国高度集权的沙皇体制，实际上削弱了地方贵族以及教会的权势。伊凡四世非常残暴，并借助鞑靼人来进行清洗。塞利姆一世实施统治的方式与伊凡四世类似。在几年的时间内（直到他于1520年逝世），塞利姆一世使奥斯曼帝国空前强盛，并让基督教世界感到惊恐。正如麦考利（Macaulay）对腓特烈大帝的父亲的评价一样，塞利姆一世堪称摩洛神和恶鬼的合体。他常常处死维齐尔，以致人人惶恐。据载，一位维齐尔曾询问能否提前知晓自己被处决的日期，以便预先料理自己的后事。塞利姆一世回答说可以，但要找到下一个处决的人才能够确定日期。像腓特烈大帝的父亲一样，不管用什

么方式，付出什么代价，塞利姆一世都极力充盈国库。这位强硬人物在1514年召集了8万大军，着手解决波斯问题。

与18世纪的普鲁士相似，奥斯曼帝国可以说是“从炮弹中孵化而出”，因为其军事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炮兵部队的英勇善战。穆罕默德二世于1481年逝世，在此后的一个世纪中，奥斯曼帝国所向披靡。在占领君士坦丁堡之后，奥斯曼帝国的疆域不断扩大。当时，奥斯曼帝国的军队装备着数量更多、品质更加优良的火炮，帝国骑兵也令敌人闻风丧胆。此外，奥斯曼帝国苏丹还建立了一支常备军，然而其他王朝却仅有雇佣军或落后的军队。当苏丹们发现良机之时，他们一般都会果断把握。16世纪早期，西班牙的犹太人被当时的统治者驱逐出境，于是辗转到奥斯曼帝国避难，特别是在重要的港口城市萨洛尼卡和士麦那（今伊兹密尔）。奥斯曼帝国境内的数百万非穆斯林需要缴纳可以帮助其免服兵役的人丁税，这在很大程度上支撑了庞大的帝国体制。奥斯曼帝国是一个军事帝国，组织严密，行政机构有条不紊地管理着贸易和土地，供养着一支战斗力远超对手的强大高效的军队。这些都需要明确的导向，而塞利姆一世在其统治时期就实现了这些。

当时，红帽军主要集中在奥斯曼帝国的中北部地区，他们主要是被奥斯曼帝国欺骗至此。随后，近4万红帽军遭到屠杀，剩余民众被迫逃往山区，其中一些人来到偏远乃至几乎不可到达的通杰利地区，并学会了“扎扎”（Zaza，一个波斯词汇，意为“结巴”）式的库尔德语。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红帽军成为现代土耳其共和国中所谓的阿拉维人，我们之后将会对其进行叙述。然后，塞利姆一世率领军队向东进军，粉碎了叛乱，穿越崇山峻岭，经受炎热酷暑，最终与伊斯玛仪沙展开决战。伊斯玛仪沙建立了萨法维王朝，却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特别是在东方，始终受到乌兹别克人的威胁，而且他的军队也难以与奥斯曼帝国的耶尼切里军团和重炮部队抗衡。1514年8月，在靠近凡湖的查尔德兰地区，伊斯玛仪沙的弓骑兵被击溃，四处逃散。塞利姆一世在今伊拉克地区立足，开辟了一条新的前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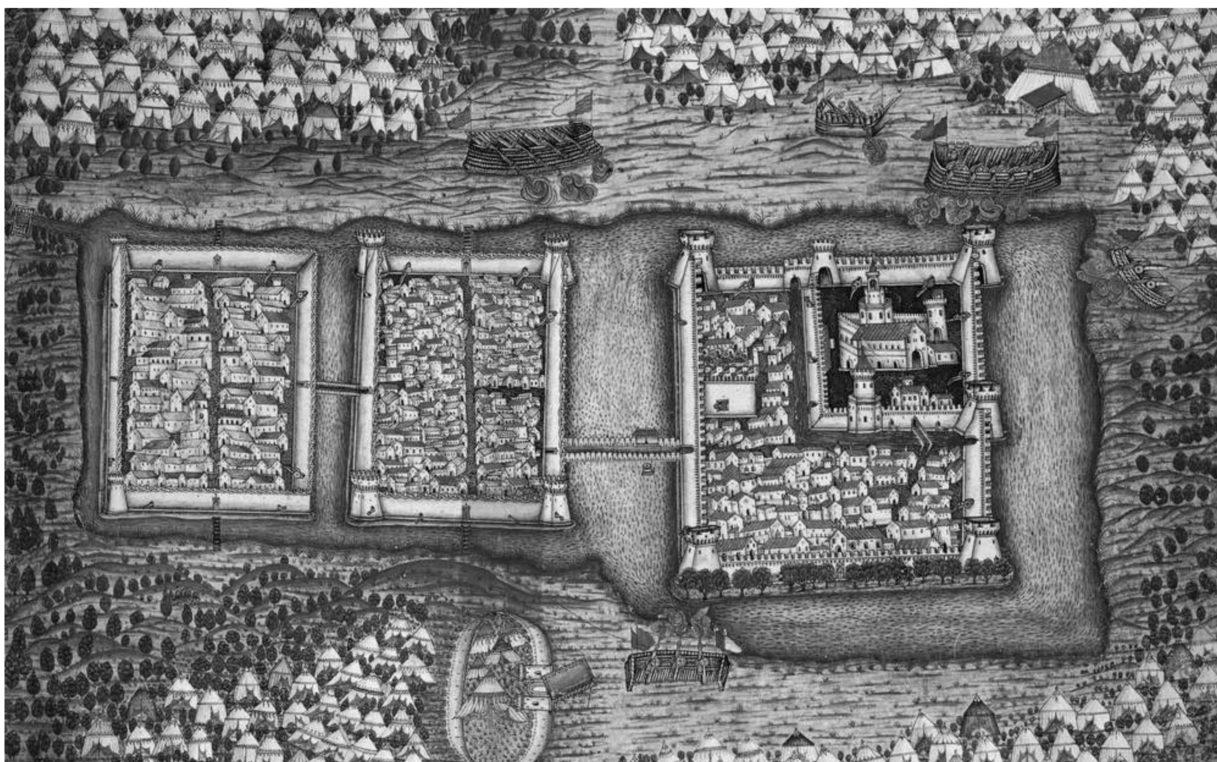
塞利姆一世的下一个目标是埃及，那里对于帝国的命运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马穆鲁克王朝一直袭扰君士坦丁堡，而他们从贸易中所获得的丰厚利润也成为塞利姆一世觊觎的目标。塞利姆一世率领火炮部队和耶尼切里军团，与马穆鲁克展开决战。相比于奥斯曼帝国的军队，马穆鲁克依然采取旧式的骑兵冲锋战术。塞利姆一世相继占领了阿勒颇和大马士革，并最终于1517年占领了开罗。由此，塞利姆一世成为阿拉伯世界的主人，奥斯曼帝国控制了埃及地区，并一直扩展到北非的马格里布。马格里布一词源于阿拉伯语，意为“西方”。奥斯曼帝国还将势力扩展到伊斯兰教圣地麦加和麦地那地区，同时征服也门，控制了红海的咽喉。奥斯曼帝国甚至一度控制了埃塞俄比亚，时间长达一个世纪。

哈里发以前曾坐镇巴格达，但在阿拔斯王朝灭亡后一度处于空位状态。马穆鲁克人在开罗重新扶植了一位哈里发，并声称他是先知的继承者。现在，塞利姆一世不仅褫夺了哈里发的称号，而且夺取了一系列战利品和圣物——先知（也或许是阿里）的宝剑、一块带有先知脚印的岩石，以及其他现存于托普卡帕博物馆的一个特殊展厅中的圣物。整个伊斯兰世界的哈里发是一个伟大的称谓，但是它在很长时间内并没有实际意义，或许可以说是没有任何意义。但是，奥斯曼帝国夺取埃及和巴格达之后，帝国的重心确实从属于基督教世界的巴尔干半岛转向阿拉伯世界，性质也发生转变。到塞利姆一世逝世时，他已居功至伟，拥有众多耀眼的光环：两个大陆的国王、两洋的统治者、两支大军的统帅（两支大军指欧洲和波斯军队）、两圣地的守护者（两圣地指麦加和麦地那）。他的儿子又为他添加了以下称谓：地平线的边境领主、横跨大陆的磐石、安拉在大地的影子。附属国克里米亚汗国的统治者则在布告中称呼塞利姆一世为“永垂不朽的可汗”。这种现象看似荒诞离奇，但在某段时期内这也是事实。

---

1. 帕夏，指奥斯曼帝国行政系统中的高级官员。——编者注

第三章
巅峰



奥斯曼帝国军队围攻西盖特瓦尔，1566年，来自艾哈迈德·费里敦帕夏的*Nuzhet el-Esrar el-Ahbar der Sefer-i Sigetvar*，转录于1568—1569年。现存于伊斯坦布尔托普卡帕宫博物馆，H.1339，fols32b—33a。

塞利姆一世的儿子苏莱曼一世顺利继承了王位，帝国境内并未发生严重的内乱。苏莱曼一世在位近半个世纪（1520—1566年），奥斯曼帝国的势力也在他统治期间达到顶峰。奥斯曼帝国的火炮专家远赴印度尼西亚，舰队在法国的土伦港过冬，军队则在匈牙利、伏尔加河流域以及底格里斯河下游征战。君士坦丁堡是一座极其富庶的城市，人口多达75万，几乎是当时西欧大都市巴黎的3倍。这段时期是奥斯曼帝国的黄金时期，它引领着中东乃至欧洲法律体系和诗歌方面的潮

流。奥斯曼帝国众多宏伟的清真寺享誉世界，特别是苏丹为自己建造的苏莱曼一世清真寺。苏莱曼一世继承了其曾祖父的天赋，在一系列纷繁复杂的事务中，能够集中精力迅速处理，就如同下一盘战略性的三维国际象棋。对于土耳其人来说，他是卡努尼（*Kanunî*，意为立法者）；对于德意志人来说，他是土耳其大帝（*der grosse Tuerke*）。意大利著名画家提香（Titian）曾经专门为苏莱曼一世绘制了一幅惟妙惟肖的肖像，现保存在维也纳。像拿破仑一样，苏莱曼一世曾经进行了12次伟大的征战。在他的率领下，20万奥斯曼帝国军队拖曳着数百门火炮，以超乎寻常的意志高效行军。哈布斯堡王朝的大使曾说："在我们所在半球的三个大洲上，每一个大洲上的国家都加速了我们的衰亡。像一道闪电一样，苏莱曼一世袭击、粉碎和破坏了挡在他前进道路上的一切。"

1520年是个好年头。当时，世界正在发生知识革新，印刷术出现并广泛扩散，知识获得传播，地图绘制技术以及新天文学正在成熟，如同联邦德国文化部长所说的那样，你可以将其称为"早期资产阶级革命"。此后，欧洲各个帝国开始逐渐成形，并与苏莱曼一世发生激烈冲突。由于当时盛行浮夸之风，帝国间的争雄不可避免。13世纪时，哈布斯堡王朝也是一个小国，后来经过数代人的经营，势力逐渐扩张，首先控制了德意志帝国，后来又取得了西班牙王位的继承权。哈布斯堡王朝的帝王在向民众颁布命令时，也带有一系列头衔，利用君权神授为自身增色——以奥地利公爵为例，他拥有51个称谓，包括错综复杂的神秘主义称谓，比如蓬塔穆松（Pont-à-Mousson）以及盖福斯塔特·格拉夫沙夫特·高尔兹（*gefürstete Grafschaft Görz*）。而在西班牙，至少按照含义来说，它的国王拥有更多头衔。当然，这也在意料之中，因为马德里的政权控制了拉丁美洲，并获得了教皇的认可与授权。

1492年，卡斯蒂利亚王国的伊莎贝拉（Isabella）女王及其夫君阿拉贡王国的斐迪南（Ferdinand）国王攻占了伊比利亚半岛上的最后一

个来自格拉纳达的穆斯林王国，同年又资助了哥伦布寻找新大陆的远洋航行。后来，西班牙又与北非的穆斯林展开争战，而奥斯曼帝国也从地中海东岸卷入这场纷争。这一次是基督教世界与伊斯兰世界的战争，争战双方以西班牙查里五世（Charles V）及其儿子菲利普二世（Philip II）为一方，以苏莱曼一世及其儿子塞利姆二世（Selim II，1566—1574年在位）为另一方。人们可能认为到16世纪时，西班牙与奥斯曼帝国之间的争战已经接近尾声，这是因为尽管双方的衰落历程延续了很长时间，但是它们并没有真正实现中兴。组建一支拥有300艘大木船的舰队需要消耗大量的木材，会对森林资源造成巨大损害——这在任何情况下都是难以为继的。此外，战争和基地的花销也削弱了政府在其他事务中的组织能力。

西班牙和土耳其有诸多可比之处。西班牙曾被伊斯兰世界统治了长达7个世纪，科尔多瓦哈里发时期的西班牙甚至能够与开罗分庭抗礼。在11世纪所谓的西班牙解放战争中涌现出的英雄熙德（El Cid），实际上拥有的是阿拉伯名字。熙德是赛义德（Said）的一种变形，意为“领主”。到17世纪时，奥斯曼帝国和西班牙帝国已明显落后于西方强国，这在军事对垒中可以体现出来。双方都与欧洲保持着疏远又紧张的关系。西班牙的少数群体加泰隆人逐渐融入了西班牙社会，土耳其的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也是如此；其他少数群体，比如富有攻击性的巴斯克人和库尔德人，则维持了自身特色（在当代，巴斯克祖国和自由组织与库尔德工人党展开了合作）。到了19世纪，两个帝国的军队都进入了政界，在西班牙尤其如此，而且宗教在这两个帝国中都扮演着重要角色。马德里和安卡拉都是人为建造的帝国首都，经济发展落后于政治发展：只有巴塞罗那才可以与伊斯坦布尔媲美。此外，马德里和安卡拉都位于没有树木的高原之上，气候极端恶劣。这些地区的树木之所以无法存活，很可能是因为1650年前后发生的气候变迁，更有可能是因为当地的土地所有制崩溃后，农民可以在此地随意放养绵羊和山羊，从而严重损害了植被的根茎。

此外，这两个国家还有一个奇怪的可比之处——铁路。19世纪，西班牙试图通过修建铁路来改变自身的落后状况，后来奥斯曼帝国也采取了类似举措。但是，在伊比利亚半岛的土地和气候条件下，修建铁路是非常困难的：由于铁在夏天膨胀，在冬天收缩，因而铁轨会发生扭曲。那里的铁路运行缓慢且事故频发，造成了巨大损失。西班牙铁路负债累累，难以筹措必要的资金进行现代化改造，政府不得不使用陈旧过时的备用零件。即使是在20世纪60年代，从马德里到巴塞罗那也要花费约12小时，而它们之间的距离只有大约300英里。虽然土耳其的状况没有西班牙那样糟糕，但即使是现在，从安卡拉到伊斯坦布尔的夜车（而且是欧洲最老式的卧铺车）也需要花费约9个小时。须知，这两座城市之间的距离与马德里和巴塞罗那之间的距离差不多。当然，土耳其的铁路状况注定要获得改善。只有在公路技术获得较大发展并使出行变得更加便利之后，西班牙才逐渐解决了铁路问题：西班牙公路利润的盈余被用于铁路的现代化改造之中，这才使得铁路状况发生了巨大改观。20世纪80年代，土耳其也采取了类似的举措。由于两国铁路发展历程存在相似性，土耳其引进了西班牙的工程师和机车，用以改进安纳托利亚地区的铁路建设。现在，从安卡拉到伊斯坦布尔的铁路旅行只需要花费三四个小时，就如同从马德里到巴塞罗那一样。

时至16世纪，西班牙帝国和奥斯曼帝国之间逐渐爆发冲突，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奥斯曼帝国对埃及的控制。由于开罗地处要塞，连接着从印度尼西亚直至北非的广大地区，遂成为重要的商路必经之地，仅埃及一地的税收就占奥斯曼帝国财政预算的近2/3。双方冲突的焦点也涉及哈里发问题。马穆鲁克并不清楚该如何处理哈里发问题，有时候甚至会因与哈里发结盟而不知所措。由奥斯曼帝国苏丹指定哈里发人选或许会开启北非的归顺之路——这种状况也确实发生了。位于北非狭长海岸乃至阿尔及利亚西部的一系列部落，相继归顺了奥斯曼帝国，接纳了耶尼切里军团，并宣誓效忠于奥斯曼帝国苏丹，必要时会采取实际行动配合苏丹的举措。摩洛哥则另当别论，因为这是一个位

于大西洋海岸的强大和富裕的国家，其统治者蔑视奥斯曼土耳其人。尽管摩洛哥曾在两个世纪中承认奥斯曼帝国的宗主地位，却经常不愿意接受奥斯曼帝国的宗教管辖。正如我们透过埃及所看到的，奥斯曼帝国的触角伸展到阿拉伯的大部分地区和也门，甚至远达红海另一边的埃塞俄比亚。

奥斯曼帝国再次面临伊比利亚问题，不过这一次事关葡萄牙而非西班牙。15世纪中期，葡萄牙即将与奥斯曼帝国爆发冲突的前奏已经显现。当时，葡萄牙船队开始探索大西洋和亚速尔群岛，然后沿着非洲西海岸缓慢南下，设立了一系列商业据点。在一次探险活动中，葡萄牙船队幸运地在一股洋流的推动下穿越了好望角，从而进入了印度洋。1498年，瓦斯科·达伽马到达了印度，并遇到了阿拉伯商人。阿拉伯商人对此忐忑不安，因为他们已隐约知道来者的身份及意图。欧洲需要来自东方的香料，但是直到新航路开辟前，不管是经由海路到达苏伊士，还是经由陆路到达阿勒颇，这项贸易都主要由阿拉伯人和威尼斯人控制。现在，通过直接取道海洋，葡萄牙人能够显著降低香料的价格，而且他们很快就占领了香料的主要产地印度尼西亚。香料等贸易的商路中心曾在埃及，但是葡萄牙人的介入使得奥斯曼帝国遭受重大损失，经由红海或者波斯湾的贸易路线开始衰落。奥斯曼帝国甚至担心葡萄牙人会影响穆斯林到麦加朝觐。尽管葡萄牙驻印总督阿尔布开克（Albuquerque）指挥的本国军队从未超过5 000人，但是葡萄牙舰队的船速更快，武器更加优良，因而实力似乎更加强大。葡萄牙人甚至侵占了巴林，阻断了经由巴士拉的商路，而当时这条商路主要由奥斯曼帝国经营。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奥斯曼帝国占领了也门和埃塞俄比亚，从而扼守住了进入红海的道路。奥斯曼帝国与葡萄牙之间的争战甚至远达桑给巴尔（Zanzibar，在旧土耳其语中为“*Zencibahr*”，意为“黑人的海洋”）。印度尼西亚的一位统治者经常抱怨自己处于葡萄牙的威胁之下，苏莱曼一世直接向他赠送了大量火炮。与此同时，苏莱曼一世也派遣自己的幕僚前往印度寻求合作。早在1513年，一位曾经是海盗的、名为皮里·赖斯（Piri Reis）的奥斯曼帝国制图师，就已

经绘制了一张世界地图，包括南美洲。令人惊奇的是，这张地图中标注的南美洲的位置还很准确。但是，尽管这些事件有时会被视作世界帝国主义的开端，但相比于位于地中海地区的主要战场，它们都只是些小插曲而已。

在穆罕默德二世时期，土耳其舰队曾经劫掠了意大利南部的奥特朗托。奥斯曼土耳其人在马格里布地区站稳脚跟之后，便放手利用被称为“巴尔巴里海岸”的海盗从事劫掠，其中一些海盗甚至兵至罗马，令教皇落荒而逃。他们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成就，部分原因在于基督教世界并非铁板一块。当时，德意志地区爆发了宗教改革运动，并迅速蔓延至尼德兰地区，结果导致了长期的宗教战争。在1574年天主教徒围攻莱顿期间，新教徒守军宣称“即使是土耳其人也比天主教徒好”（life turk den paus，翻译成英语就是“better Turk than Papist”）。法国人的做法则更不寻常。尽管弗朗西斯一世（Francis I）本身就是天主教徒，但是为了打击自己的主要敌人哈布斯堡王朝，他情愿与奥斯曼帝国结盟。当时，哈布斯堡王朝在西班牙和尼德兰地区的统治者查理五世，也是苏莱曼一世的主要对手。奥斯曼帝国的舰队获准在土伦港越冬，地中海地区的基督教徒因此遭殃。早在1522年，罗德岛的圣约翰骑士团就在奥斯曼帝国长时间的围攻下被迫撤离。1571年，处于威尼斯控制下的塞浦路斯亦被奥斯曼帝国攻占。最初，奥斯曼帝国的进军非常顺利，因为比起奉行封建制、农奴制以及宗教迫害政策的威尼斯人以及天主教徒，希腊东正教徒更喜欢奥斯曼土耳其人。不过，在攻占塞浦路斯的最后一战，即法马古斯塔战役中，发生了另一场类似于罗德岛战役的史诗般的战争。

到了16世纪中期，奥斯曼帝国在摩洛哥与葡萄牙人激战，在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与西班牙争夺，并在各个地区与威尼斯人较量，爆发了一系列大型的海战。海战消耗巨大，而且使用的主要是老式战船。在海战中，舰船主要由人力操纵，作战模式包括登船和撞击，这都依赖海洋环境，但是地中海气候不仅变化莫测，而且每个地区也差异显

著。由于一艘舰船上的奴隶有时会多达数百人，因而很容易受到流行病的袭扰，冬天时需要将这些奴隶限制在他们的营区中。战船需要停泊在海岸的视线范围内，并严重依赖设在陆地上的基地提供修理和补给。葡萄牙舰队对的黎波里或突尼斯进行了大规模的征战，但是它们的命运却受到突然而至的风暴的摆布。这些风暴不仅摧毁了葡萄牙的舰队，而且拖垮了葡萄牙帝国，使其被西班牙兼并。1600年前后，随着高大且装备着所向披靡的火炮的荷兰战舰的出现，混乱的海战才暂时告一段落。但是，到了16世纪晚期，伊斯兰与基督徒之间的战争似乎要永远持续下去。

1565年，穆斯林与基督徒之间的战争似乎达到高潮。马耳他岛扼守着突尼斯和西西里岛之间的咽喉，战略位置极其重要。那里拥有狭长的深水港，很适合维护和供给舰队，并在圣约翰骑士团的经营下防守严密。苏莱曼一世派遣了首席海军上将率领舰队夺取此岛，与守军爆发了残酷的战争。战争主要围绕圣埃尔莫要塞展开，这个要塞守护着该岛主要的港口，港口本身也已被围困数月，看起来，只有奇迹发生，马耳他岛才会幸免于难。马耳他岛守军的顽强抵抗直接促成了西班牙与骑士团的联合行动。来自救援舰队的威胁以及缺乏足够的淡水供应，迫使奥斯曼帝国舰队不得不仓皇撤军——这是苏莱曼一世第一次真正遭遇惨败。

除此之外，奥斯曼帝国取得了一系列胜利。奥斯曼土耳其人已经占领了巴尔干半岛南部地区。罗马尼亚的王子们归顺了奥斯曼帝国，承诺向其支付贡金。奥斯曼帝国北部地区与匈牙利相邻，匈牙利曾经在15世纪上半叶与奥斯曼帝国展开激战，而且获得了几次胜利。贝尔格莱德——被匈牙利人称为“Nándorfehérvár”——是一个非常坚固的军事要塞，位于萨瓦河和多瑙河的交汇处，具有一道天然屏障，而且拥有坚固的城墙。它在对抗奥斯曼帝国的战争中独当一面，甚至连穆罕默德二世在1456年时也未能将其攻克。但是，到1520年时，匈牙利的势力已大为削弱，因为匈牙利的王位归属虽由选举决定，但实际权力

落入了一个欺压农奴的贵族阶层手中。1526年，苏莱曼一世率领大军再次入侵匈牙利。在当年8月的莫哈奇战役中，匈牙利军队再次上演了十字军在1444年瓦尔纳战役中的惨剧。在奥斯曼帝国的耶尼切里军团和火炮面前，匈牙利军队的骑兵不堪一击，结果遭到惨败。很快，半个匈牙利都落入奥斯曼土耳其人之手，而且核心区域特兰西瓦尼亚公国也接受了奥斯曼帝国的宗主国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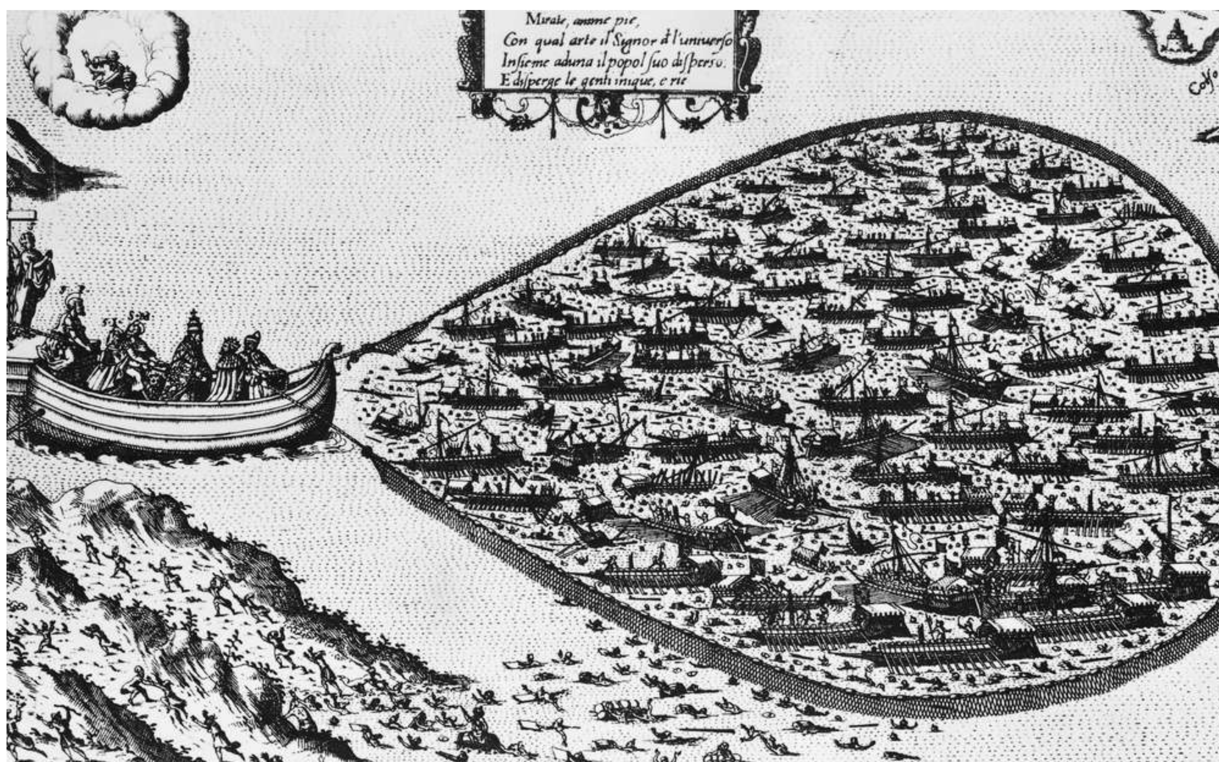
匈牙利一战对参战双方来说都有好处。奥斯曼土耳其人获得了一些重要的、拥有较先进文明的盟友（比如在1453年君士坦丁堡之战中设计并铸造了巨型火炮的乌尔班）。这些盟友的教育水平比较高，早在1600年时的识字率就已非常高（新教教派中一位论派的识字率几乎高达100%，这无疑是因为在那块极富智慧的穷乡僻壤之上，生活着大量德国移民，他们都是由匈牙利国王于3世纪前精心挑选的）。而另一方面，由于新教徒占多数的特兰西瓦尼亚公国依附于奥斯曼帝国，从而免于遭受反对宗教改革者的迫害。总体而言，特兰西瓦尼亚公国之后成为奥斯曼帝国的得力附属国。匈牙利中部地区虽然落入奥斯曼土耳其人之手，但是在其西部和北部却存在着一个不同的匈牙利群体。由于哈布斯堡王朝继承了匈牙利王国的王位，因而那些地区依然处于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之下。苏莱曼一世在布达建立了新都，并设置了相应的政府机构，由土耳其官员进行统治。然而，边界地区依然处于纷争之下，战争仍在持续。1529年，苏莱曼一世迅速突破哈布斯堡王朝的防线并包围了维也纳。但是，由于冬季很快就要到来，秉承现实主义理念的苏莱曼一世并没有意气用事，而是选择了撤军。

奥斯曼帝国在哈布斯堡王朝边界地区进行的漫长战争可谓艰苦卓绝。在匈牙利地区集结军队需要庞大的后勤保障，依赖数量巨大的驼队来运送给养甚至是弹药，而且要在无穷无尽的泥潭中艰难行军。当奥斯曼帝国的军队停歇时，他们的帐篷会绵延数里，而且在苏丹及其随从的宿营地上还会铺设华丽的地毯（至今，这种风格的小型地毯在中亚地区依然可见）。奥斯曼帝国不仅需要与哈布斯堡王朝交战，在

其他战线甚至是不同的大陆上，奥斯曼帝国左支右绌，无法同时应对诸多挑战。由于哈布斯堡王朝也同时在多条战线作战，因此在很长时间内与奥斯曼帝国都处于停战状态。然而，中欧地区的纷争一直在延续，维也纳、特兰西瓦尼亚以及罗马尼亚的统治者之间也充满了尔虞我诈。

随着苏莱曼一世日渐衰老，他越来越独断专行，同时在宗教上也更加虔诚。他对基督徒的包容心日益狭小，并越来越严肃地将自己视为伊斯兰教的圣战者。在最后的岁月里，苏莱曼一世成为自己设计出的精妙绝伦的“发条装置”中最为关键的部分。当他的妻子罗克塞拉娜（Roxelana）[也就是许蕾姆（Hürrem）苏丹]去世之后，他开始奉行禁欲主义，而且更加固执：宫廷开始使用陶器进膳，而此前一般使用进口自中国的精美瓷器，其中一些瓷器还镶嵌有一条非常细长的银线，这条银线与砒霜接触时会变黄。苏莱曼一世的故事与路易十四（Louis XIV）极为相似。路易十四因奢华的凡尔赛宫而闻名，他的情妇曼特农夫人每夜都会到访，与他密谈两个小时的宗教，然后再劝其与残忍、愚蠢的皇后同床共枕（路易十四和这位皇后酝酿了法国历史上最严重的错误——驱逐新教徒）。在统治后期，苏莱曼一世与自己的儿子们关系紧张（作为王子们继母的罗克塞拉娜对此负有一定的责任）。苏莱曼一世甚至因为儿子造反将其中一位杀害，被杀王子的哥哥、苏莱曼一世最喜欢的儿子吉汉吉尔（Cihangir）也受到株连，最终被密害致死。像奥斯曼历史上经常发生的一样，苏莱曼一世的基因也传给了他的女儿米赫里马赫（Mihrimah），她在于斯屈达尔修建了一座宏伟壮观的清真寺（米赫里马赫在伊斯坦布尔埃迪尔内门附近的城墙边上还建有另一座清真寺）。尽管如此，这位老苏丹依然知道该如何处理一件事：战争。1566年，他集结了一支庞大的军队，越境北上，穿过贝尔格莱德，进入了匈牙利，开始围攻锡盖特堡。不久，72岁高龄的苏莱曼一世便与世长辞。

第四章
阴影



1571年勒班陀战役，雕于1572年。现存于威尼斯海洋历史博物馆。

苏莱曼一世逝世后，宫廷秘不发丧，隐瞒了长达48天。像以前一样，宫廷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权贵阶层希望将权力平稳过渡到他们所支持的候选人手中。但是，长期任职的大维齐尔也非常担心，一旦耶尼切里军团知晓将产生新的苏丹，他们可能会要求获得传统的、价值高昂的“礼物”。大维齐尔的担心最终变为现实。一位苏丹的替身坐在马车上，不停地翻阅书籍，同时诵读着《古兰经》。他知道自己参与的是一场死亡游戏，而真正苏丹的尸体早已被偷偷运回君士坦丁堡。

到当前为止，这个帝国正在令人难以置信地独自运行。在一位能力卓著的维齐尔——索科卢·穆罕默德（Sokollu Mehmet）帕夏的精心安排下，塞利姆二世顺利继承了王位。塞利姆二世在历史上以“酒鬼塞利姆”著称，但是由于苏莱曼曾经在选择大维齐尔方面十分谨慎多疑并令这个精英阶层心有余悸，因此他们并不在乎新苏丹的习惯如何。1536年，希腊人易卜拉欣帕夏由于权势过于强大而被苏莱曼处决；曾经服侍过三位苏丹的位高权重的波斯尼亚人索科卢·穆罕默德帕夏，则在床上逝世，流言称其遭阴险狡诈的萨菲耶（Safiye，穆拉特三世的妻子）苏丹设计毒害。这些人之所以被处决，是因为他们懂得如何操纵政局，却没有将像萨菲耶苏丹这样狡诈的帝国皇太后放在眼里。

在塞利姆二世统治期间，奥斯曼帝国于1571年攻占了塞浦路斯。但是，在同年的勒班陀海战中，战局却发生了逆转。西班牙和威尼斯的舰队已经开始使用三桅帆装军舰，可以装备射程更远的大型火炮。它们摧毁了一支奥斯曼帝国舰队，这成为文明冲突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奥地利人唐·约翰（Don John）也在此战中一举成名。然而，这种景象具有误导性：相比于西班牙和英格兰以及奥斯曼帝国和萨法维王朝，西班牙和奥斯曼帝国拥有更多的相同点。奥斯曼帝国舰队很快就恢复过来，在当年便恢复行动。直到1600年，奥斯曼帝国才开始出现真正的衰败迹象，而且这种状况同时出现在西班牙帝国身上。

地中海地区曾经是文明的中心之一，但是在1600年时，它的地位已被严重动摇。到17世纪时，文明的中心已从地中海转移到了大西洋。这种论述可以通过荷兰反抗西班牙的战争来说明，双方共进行了长达80年的战争，最终于1648年结束（当时，双方都已筋疲力尽，因而派出代表在威斯特伐利亚商讨和平事宜。由于它们当时仍然彼此仇视，因而双方代表分别在不同的城镇明斯特和奥斯纳布吕克通过第三方举行了会谈）。正是荷兰人创造了使现代世界得以运作的一系列新兴事物和规则：国民银行、理性有序的军事策略、设计精巧的船舶、海运保险、证券交易所、望远镜，以及能够防止周期性饥荒的农业发

展。由于荷兰国土面积过于狭小，因此在入侵者面前十分脆弱。1688年，荷兰人继承了英国的王位，也带来了荷兰的本质特征。大西洋重要性的凸显，也使得野蛮和偏僻的苏格兰获得了发展，因为格拉斯哥意外地成为美洲烟草最重要的进口港，正是从烟草贸易中赚取的利润使得这个以前与贸易活动完全无关的地方发展了起来。

土耳其、威尼斯以及西班牙的历史学家曾经分别研究了17世纪的历史，并思忖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以致他们的祖先陷入了衰落的境地。尽管你可以使用很多事例来反驳这种观点，但是这种衰落无疑是普遍性的。到1700年时，西班牙及其帝国之所以能够维持，仅仅是因为潜在的后继者不愿意分裂帝国。威尼斯的风光仅存于卡纳莱托的风景画之中，那不勒斯因内讧而实力大减，西西里岛则成为朱塞佩·托马西·迪·兰佩杜萨（Giuseppe Tomasi di Lampedusa）笔下的"豹"。《豹》（*The Leopard*，1958）是一部以没落的巴洛克风格创作的文学作品。奥斯曼帝国的势力依然强大，但没落的前景已经注定。在此进程中，俄国逐渐崛起，它在某种意义上成为最后一个伟大的中亚帝国。

目前，对于奥斯曼帝国衰落的原因，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解释。曾经非常流行的一个解释认为这是由西方帝国主义导致的：葡萄牙人和荷兰人相继夺取了香料贸易的主导权。列宁主义还给出了另外一种解释，指出资本主义正在转化成帝国主义，因而造成了第三世界的贫困。但是，5 000名葡萄牙水手和80艘荷兰商船历经的长达一年的长途跋涉，并不足以颠覆整个世界体系。奥斯曼帝国确实失去了对于香料贸易的控制，但是位于开罗和阿勒颇的货物集散地依然繁荣，而且来自也门的咖啡贸易更加有利可图。不可否认，一个在很大程度上服务于西方利益的帝国主义世界贸易体系出现于19世纪，而不是在17世纪。此外，奥斯曼帝国的衰落也可能是因为气候变化或者长期海战消耗了大片森林，从而导致土壤遭到侵蚀，这在安卡拉高原体现得尤为显著。另一方面，其实明智的政府知道如何保护森林：主要的策略是禁止放养山羊。或许气候变化意味着新疾病的产生，但拥有先见之明

的政府知道如何控制瘟疫、疟疾以及天花，何况其他国家接种疫苗的预防措施就学自奥斯曼帝国。但是，当阿姆斯特丹以及伦敦知道如何隔离和控制瘟疫时，那不勒斯以及君士坦丁堡却因瘟疫的侵袭而荒废，这也是事实。

地中海地区的衰落也为宗教批评者提供了切入点，不管是针对反对宗教改革的天主教还是伊斯兰教——天主教和伊斯兰教在为教士举办葬礼时总会铺张浪费。教皇并没有得到所有基督徒的敬仰，在伊斯兰教界也是如此。奥斯曼帝国拥有强大的海军，而且拥有优良的地图绘制技术。海军的发展显然需要研究星象，奥斯曼帝国在君士坦丁堡的贝西克塔斯地区的一个观测点上兴建了一座天文台（奥斯曼帝国苏丹也居住在这个地区，他对占星术非常感兴趣）。1583年，奥斯曼帝国境内发生了地震，宗教权威解释称这是安拉对于人们窥探其秘密的惩罚，这显然表明了他们对于天文学的憎恶。最后，天文台被拆毁，奥斯曼帝国的海军优势也随之丧失。与此类似，在18世纪早期，奥斯曼帝国在宗教界的压力下被迫关闭了数学及机械学校，并限制了印刷业的发展。印刷企业家易卜拉欣·穆特范瑞卡（Ibrahim Müteferrika）在开展业务之初即遭到书吏的阻挠，因为他们希望维持自身对于抄写的垄断权，并借用宗教借口为自身的行动正名（当然，也有人提出，对于当时囊中羞涩的读者来说，印刷品过于昂贵）。无疑，在此次交锋中，书吏可能会借助任何借口和手段来限制印刷业的发展。尽管一些明智的神职人员不同意封杀印刷品，但难以扭转整体局势。直到18世纪晚期，欧洲基督教世界对于奥斯曼帝国仍是非常钦佩的，就如同真心诚意地屈尊欣赏莫扎特的《后宫诱逃》（*Entführung aus dem Serail*，1782）[注]一样。

在塞利姆二世于1574年逝世之后，他的两位继任者穆拉特三世（Murat III, 1574—1595年在位）以及穆罕默德三世（Mehmet III，1595—1603年在位）继续推进先辈的事业，奥斯曼帝国的机制运转良好，军事征服行动依然向前推进：甚至连摩洛哥也在16世纪70年代臣

服于奥斯曼帝国，尽管持续时间较短。在奥斯曼帝国的东方，由于萨法维王朝在北方和东方面临一系列内部问题，阿塞拜疆以及格鲁吉亚的大部分地区也曾一度处于奥斯曼帝国的控制之下。当时，克里米亚鞑靼可汗的势力依然非常强大（他在1571年占领并烧毁了莫斯科），与奥斯曼帝国结成同盟。奥斯曼帝国曾一度计划开挖连接顿河和伏尔加河的运河，尽管这项工程耗资巨大而且鞑靼人也靠不住，但已初具规模，这使得来自亚速海的一支奥斯曼帝国军队能够联合盟友攻占阿斯特拉罕。穆罕默德二世已经攻占了扼守凡湖的规模宏伟的岩石要塞，在进军伊拉克的进程中，他还占领了比特利斯，这两个地区都混杂着大量的库尔德人和亚美尼亚人。奥斯曼帝国在巴格达地区设有代表，当地的行政长官（此人拥有热那亚血统）试图在逊尼派以及什叶派穆斯林之间维持和平。然而，在安纳托利亚—伊拉克边境的高山地区，奥斯曼帝国却难以维持有效统治。最终，奥斯曼帝国在此地区遭遇惨败。1580年之后，萨法维王朝的势力得到恢复，并从奥斯曼帝国手中夺取了巴格达地区。

到1580年时，奥斯曼帝国与西班牙和威尼斯在地中海地区达成某种停战协议，在印度洋地区也开始大规模收缩势力范围，但是在北部前线地区，战火依旧绵延。当地的反抗斗争持续不断，土匪和强盗不断发动袭扰，奥斯曼帝国的诸多藩属则多次与坐镇维也纳的哈布斯堡王朝暗通款曲。1593—1606年，奥斯曼帝国与哈布斯堡王朝之间甚至爆发了“持久战争”，主要是围攻战，直到双方签署了《吉托瓦托洛克协议》（Treaty of Zsitvatorok），同意搁置争议。由于双方在其他地区也存在许多问题，匈牙利西部和北部战线的战况在很大程度上得以维持。但是，苏莱曼一世建立的帝国体系开始在各个方面运转不畅。首要问题是帝国疆域太大。当时，某种形式的埃及—奥斯曼伙伴关系已经开始形成，而且奥斯曼帝国急需埃及的财政支持。但是，埃及卷入了无休止的战争之中，比如埃塞俄比亚以及地中海一带的战争，控制也门的战争也尤为艰苦，因为也门不仅地形复杂，而且气候恶劣。在巴尔干半岛，不管是否公开宣战，奥斯曼帝国与哈布斯堡王朝之间的

争战不断。奥斯曼帝国东部地区并不存在自然的边界，逊尼派与什叶派之间的差异，不仅造成奥斯曼帝国与萨法维王朝之间的争斗，而且导致帝国内部不断发生骚乱。苏莱曼一世知晓该如何处理这些问题，在他的统治下，奥斯曼帝国成为一个综合体：法律与组织体系借鉴自罗马帝国，伊斯兰教成为统治思想，中亚地区负责提供组成军队的士兵。至今，我们依然难以对这个由各种复杂要素组成的综合体进行解释，但大部分专家都认为奥斯曼帝国的运行体制是波斯样式的。苏莱曼一世的继承者难以与他媲美，尽管这个帝国综合体在苏莱曼一世挑选出的维齐尔的辅佐下依然得以维系，但帝国的弊端已暴露无遗。

奥斯曼帝国的财政来源相对固定，部分依赖征服——特别是对埃及的征服——部分依赖税收。奥斯曼帝国的财政体系不断出现问题，穆罕默德二世在位期间不得不减少主要硬币中白银的含量，但是他在1453年对君士坦丁堡的成功征服以及随之而现的繁荣，都对此做了补偿。16世纪末，奥斯曼帝国出现了奇怪的通货膨胀，扰乱了帝国的统治秩序。实际上，这种状况的出现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地中海地区的人口数量增长了接近50%（其中奥斯曼帝国人口增至2 000万），这可能与气候变化有关。该地区并不能生产出足够的谷物来养活这些人口，因而不得不从波罗的海地区进口。奥斯曼帝国出现通货膨胀还有另外一个原因：西班牙在南美洲的波托西偶然发现了大型银矿（在其他地区，比如在匈牙利北部地区，人们也发现了大型银矿）。每年，西班牙舰队都会从南美洲运回大量白银。通货膨胀随之而至，甚至西班牙王室也在1575年破产，因为它难以清偿债务。这次通货膨胀给奥斯曼帝国带来了显著影响。后来，威尼斯铸造了一种硬币，由于含银量保持不变，这种硬币被各方用作标准货币。

16世纪末，奥斯曼帝国的硬币中再次出现品质不纯的状况，而那时帝国新的财政来源也已日益枯竭。那些为帝国服役的军人，特别是耶尼切里军团士兵，清楚地知道自己遭到了欺骗。以威尼斯硬币为参照，奥斯曼帝国的硬币贬值了一半。耶尼切里军团是主要的帝国卫

队，该军团的标志是一口巨大的饭锅，意思是苏丹负责供养他们。耶尼切里军团的营房位于阿克萨赖的肉食市场，靠近泽扎德清真寺，距离托普卡帕宫不远。耶尼切里军团负责守卫宫廷，如果他们举行兵变，胜算很大：他们可以向宫殿进军，占领内廷，直接绑架苏丹。从短期来看，奥斯曼帝国苏丹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途径是为耶尼切里军团士兵提供适当的经济补偿。早在1589年，奥斯曼帝国就曾发生一起耶尼切里军团兵变，苏丹不得不依靠收买手段将其平息。耶尼切里军团的问题得以解决，却是以损害骑兵的利益为代价的。后来，各个省区相继爆发了骑兵部队的反叛运动（在17世纪初的杰拉里叛乱[注]中，这些骑兵扮演着重要角色）。

奥斯曼帝国通过招募更多的耶尼切里军团士兵镇压了反叛运动。最初，耶尼切里军团仅有7 000名士兵，是由原来的基督教男孩组成的名副其实的精英集团。他们彼此信任，并效忠于苏丹。在长年累月的战争中，奥斯曼帝国招募了更多的耶尼切里军团士兵。由于耶尼切里军团士兵享有很多特权，特别是高额佣金，因此众多穆斯林都渴望加入。穆罕默德二世首开允许穆斯林加入耶尼切里军团的先河，军团士兵人数飙升至4万人并不断增长，士兵素质却大为下降。这些人不仅负责维护首都地区的内部秩序，而且肩负着消防职责，这两项职责都使其可以乘机欺诈店主。最终，帝国卫队变成了勒索保护费的武装团体。

一位睿智的苏丹能够意识到帝国问题的严重性，因而会主持编制无数文件（这些文件多达数百万份，都保存在档案馆中）的机构，选拔一位能够应对所有问题的大维齐尔，最后直面生命中最大的挑战——他的母亲。西方君主会与一些适合的女性繁育后代，直到这位母亲生育了一到两位王位继承者之后，他们之间的关系才会理顺。在奥斯曼帝国早期，这种类型的关系成为规范：丈夫与妻子、父亲与儿子、父亲与女儿之间维持着表面平和、内里复杂的关系。16世纪晚期，这种规范却出现了问题。

在这段时期内，一个土耳其语词汇“*harem*”（本意为闺房，后指后宫）开始进入世界字典。如果按照现在的理解，这个词汇显然遭到误用。穆斯林的住房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可以接待客人的公共区域，即“*selamlik*”（接客区域）；另一部分是私密空间，即“*harem*”，是家庭中的女性独自居住的地方。即使是在最宏伟的建筑中，包括托普卡帕宫，都拥有同样的布局。“*harem*”后来被用于指称某种大型妓院，但这绝非该词的本身含义。年轻貌美的女性可能被征召入宫，接受各种各样的训练，比如学习演奏音乐或编织刺绣，或者学习如何与男性交谈。当然，野心勃勃的女孩会设法嫁给宫廷中的男人，令他们拜倒在自己的石榴裙下。但是，到了16世纪晚期，习俗开始发生转变：一位博得苏丹欢心的女子可以为他生儿育女，如果生下的是男孩，那么这位女子便母凭子贵。一旦这位女子的儿子继位，作为其他孩子的邪恶继母，她便会策划处死新苏丹的同父异母兄弟，甚至连婴儿也不放过。花园总管一般会使用丝绳将尚在襁褓中的王子勒死，这也是他的主要工作。用绳子勒死，死者的血液不会流出，按照土耳其古老的迷信说法，死者的灵魂将不会到达天堂。穆拉特三世以及穆罕默德三世几乎难以接受这样的事实，从未真正地从阴影中走出。穆罕默德三世的19位同父异母兄弟，包括一些非常幼小的婴儿，都惨遭杀害。艾哈迈德一世（Ahmet I, 1603—1617年在位）终止了这项残忍的制度，只是将其同父异母的兄弟关押在后宫中一个老鼠泛滥的角落，这个角落被称为囚笼。

但是，最终的胜利者却是苏丹的母亲，也就是众所周知的苏丹皇太后。她们勾结宫廷中的主要人物——宦官，玩弄权术，祸乱宫闱。这是拜占庭独有的现象，主要源自基督教的早期信仰，即认为性是恶魔的杰作。当然，这种理解是错误的。显然，这个观念可以追溯至埃及的科普特人，但爱德华·吉本对他们的评价很低（有些科普特僧侣会通过各种方式，甚至像绵羊那样食草，借此证明自己的修行）。被阉割的白人宦官总管，几乎负责宫殿内的所有事务，包括培训未成年的男仆。黑人宦官总管的整个生殖器都被阉割，如果在经历宫刑并立即

跳入滚烫的沙粒中后仍能生存，就可以负责后宫的事务。拥有权势的女性和宦官掌控着奥斯曼帝国的权力，成为奥斯曼帝国由盛转衰的重要体现。穆拉特三世时期，后宫掌握着巨大的权力，这可以通过当时的漫画体现出来。此前，苏丹一般都会实行王朝联姻，迎娶拜占庭公主或者拥有同样显赫地位的穆斯林家庭的女性，比如管理克里米亚半岛的格来王室的女儿。“*harem*”实际上是某种形式的女校，与培训男仆的机构类似，直到穆拉特三世时，它才开始逐渐干政。当然，就苏丹本身的品性而言，如果他整天被一位专横的母亲以及忧郁或寻求恩宠的女人包围，那么这对于苏丹来说毫无益处。此外，大部分苏丹都有名无实，权势往往会被他们的大维齐尔盖过。

即使在此时，奥斯曼帝国依然有序运转，苏莱曼一世留下了一个高效的帝国统治机器。奥斯曼帝国拥有真正的帝国行政体系：1453—1623年，奥斯曼帝国47位大维齐尔中，仅有5位拥有奥斯曼土耳其血统，而拥有阿尔巴尼亚血统的占到11位，拥有希腊血统的占到6位，还有1位拥有亚美尼亚血统。大维齐尔会得到普通维齐尔的协助，普通维齐尔一般有4位，负责处理行政事务，有效地划拨财政资金，保持军队的运转（1600年，4万名耶尼切里军团士兵的薪酬占到了帝国工资支出的1/3）。实际上，大维齐尔负责管理整个政府，因而可以借此聚敛大量财富[苏莱曼一世的第二位大维齐尔吕斯泰姆（Rüstem）帕夏逝世后，留下了1 700名奴隶、2 900匹马以及70万枚金币；作为苏丹的女婿，他在苏莱曼一世清真寺的旁边，建立了一座以自己名字命名的、镶有伊兹尼克红瓷砖的清真寺]。奥斯曼帝国大约有100名会计负责记录财政收支状况，各省区的行政机构也设置了同样的部门，只不过规模略小。奥斯曼帝国的税收维持了一支20万人的军队，远非其他欧洲国家所能比拟。

奥斯曼帝国体系的一个特性体现在骑兵的招募方式中。拥有封邑的领主被称为提马尔（*tımar*），他们从农民那里收取地租，但在战时需要率领6名骑兵参战。通过这种方式，奥斯曼帝国共招募了8万名骑

兵，服役期限是从每年的初春到深秋。提马尔的封邑虽然获得了奥斯曼帝国的承认，但随时可能被帝国收回，因此世袭领主制并没有发展起来。实际上，奥斯曼帝国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推动社会流动的引擎，比如吕斯泰姆帕夏最初只是一位克罗地亚养殖户的儿子。

在奥斯曼帝国的国家机器中，唯一能够部分地摆脱控制的领域是宗教，但即使是在这个领域，苏莱曼一世也取得了重大突破。从理论上讲，伊斯兰教国家应该施行伊斯兰教法。由高级宗教人士欧莱玛（*ulema*）组成的宗教委员会负责召集组建最高宗教法庭。宗教委员会还负责管理一系列低等级的法官，影响一直扩展至小城镇层面。城镇层面的宗教法官被称为卡迪，负责监督学校、医院以及司法事务。伊斯兰教法是中世纪阿拉伯世界的产物，很难契合现代环境，因此苏莱曼一世花费大量时间起草了一系列法律，并允许在基督教区域实行习惯法。

从各方面来说，在整个苏莱曼一世时期乃至此后一代人的时间内，奥斯曼帝国体制都运转良好，它拥有欧洲地区最精良的火炮部队和最有勇气的步兵，以及规模庞大的骑兵部队，进而横扫了整个匈牙利平原或者安纳托利亚高原。奥斯曼帝国体制的优越性并不止如此：当时的奥斯曼帝国非常注重福利问题，急切地希望确保君士坦丁堡居民的日常需求。奥斯曼帝国谨慎地控制境内物价，大维齐尔经常到市场视察，侦查并打击投机倒把的行为。官方承认的行会负责给商品定价，这便解释了土耳其境内至今仍令人非常困惑的独特现象：在土耳其境内的特定街道或城区，众多商店主要出售同样的商品（比如加拉塔区的商店就主要出售灯具和乐器）。

突然之间，奥斯曼帝国体制开始失灵。16世纪晚期，奥斯曼帝国境内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而当地货币的大幅贬值使情况变得更糟：如果将奥斯曼帝国比作一条鱼，那么这条鱼在16世纪晚期时就已开始从头部腐烂，到17世纪早期时便迅速扩展至全身。在接近20年的

时间内，杰拉里叛乱使得安纳托利亚地区处于无政府状态。但是，奥斯曼帝国再一次面临新的挑战——奥斯曼帝国境内的反叛势力仅是政府形象的一面镜子，这些反叛势力也无力找到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杰拉里叛军是一个大杂烩——作战方式陈腐的骑兵、劫匪、宗教异见分子、对失去土地非常愤怒的农民，以及对于自身薪金大幅贬值严重不满的公职人员。艾哈迈德一世设法将杰拉里叛乱镇压了下去，并建立了蓝色清真寺进行庆祝。人们对此怨声载道，他们认为除非取得能够真正从中获益的胜利，否则不应该设立清真寺进行炫耀。蓝色清真寺拥有6座尖塔，规模宏伟，完全超出常规的需要，而且就位于宏伟壮观的苏莱曼一世清真寺附近。

奥斯曼帝国的另一个核心问题是旁观者所难以理解的。在这段时期内，伊斯兰教也出现了问题，而且并非仅限于奥斯曼帝国内部。1600年左右，在令人向往的阿克巴（Akbar）时期，伊斯兰教在印度地区运转良好，印度教徒甚至可以在宫廷中饮酒作乐，但是在半个世纪后的奥朗则布（Aurangzeb）时期，帝国开始抛弃宗教宽容政策，内战一触即发。奥斯曼帝国的一个核心支柱是欧莱玛阶层，主要由大谢赫领导。由伊斯兰教法官组成的法庭负责阐释伊斯兰教法，虽然教法从先知那里传承下来，但是正如苏莱曼一世所发现的，它并不能涵盖当前的所有领域。因此，一部民事法逐渐成形，并由不同的法官进行阐释。基督教徒或者犹太人享有很大的自治权，并得到了奥斯曼帝国的认可。

逊尼派有4种不同的教法学派。奥斯曼帝国东部地区主要奉行沙斐仪教派，这个教派相对严厉，对妇女的限制更为严格（至今，在土耳其东南部的迪亚巴克尔机场附近，仍然可以看到表情严肃的老人戴着口罩，避免与女性和外国人呼吸同样的空气）。但是，奥斯曼帝国境内的哈乃斐教派却对外国人非常宽容。苏莱曼一世希望大谢赫能够成为像教皇那样的人物，能在现实需要的时候颁布相应的宗教法令。但是，这种意愿难以实现。君士坦丁堡的宗教领袖大穆夫提[注]负责任命

教职人员和宗教法官，由于其官阶与大维齐尔同级，所以缺乏中央权威。因此，当大谢赫阿布·苏乌德·埃芬迪（Ebu Suud Efendi）宣称伊斯兰教允许银行收取利息时，并没有获得广泛的认可。阿布·苏乌德·埃芬迪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1545—1574年间一直担任大谢赫职位。伊斯兰教教职人员继续公开强化伊斯兰教的地位，在学校中要求学生熟记《古兰经》，但这并不能将奥斯曼帝国导向现代世界。

在奥斯曼帝国时期，凌驾于其他事物之上的伊斯兰教实际上处于分裂状态。在完全统一的表象下，伊斯兰教在实践中差异显著，它的规范甚至涉及一些很私密的私人生活问题。在土耳其，这种状况尤其显著，因为外部影响以及古老传统在当地占有重要地位。奥斯曼帝国境内出现了反对官方伊斯兰教主导的冷酷、繁文缛节以及专制世界的教团——使用“教派”一词或许不妥，因为其中并不存在神学上的分歧。拜克塔教团在巴尔干半岛非常盛行，在耶尼切里军团中也拥有巨大影响，对待饮酒持宽容态度。最具人性的马拉维教团创造了旋转舞，它的创始人可以追溯至13世纪时伟大的梅夫拉那[Mevlana，又名鲁米（Rumi）]。梅夫拉那曾在宣教中反复阐释自己对于人性弱点的理解，并且创作了最伟大的诗歌。除此之外还有其他教团，其中卡迪扎德里教团清醒地认识到奥斯曼帝国之所以衰落，主要是因为没有遵循伊斯兰教法。后来，拥有大一统观念的统治者不得不调动奥斯曼帝国的精英部队将这些教团镇压下去。

艾哈迈德一世是奥斯曼帝国强盛时期的最后一位苏丹。当时的趋势是推行伊斯兰教法，否则，在杰拉里叛乱以及萨法维王朝在奥斯曼帝国东部取得新胜利的大背景下，奥斯曼帝国如何才能维持运转呢？17世纪早期，这些极端虔诚的精英阶层统治着奥斯曼帝国，整个帝国变得更加伊斯兰化。希腊书籍从图书馆中消失，而奥斯曼帝国境内出版的为数不多的书籍中十有八九是关于宗教的：重复性的宣传册、幼稚的作品、圣徒的事迹，就如同反对宗教改革的天主教徒所做的一样。不仅如此，帝国中的穷人也依托宗教慈善资金维持生存，因为这

些宗教资金至少能够免于国家残暴的掠夺。富人也将他们的资产置于宗教资产慈善基金之下，但是基本上处于闲置状态。18世纪，那不勒斯接近5%的人口由僧侣和修女组成，而此时的奥斯曼帝国也很可能会演变成一个规模更加庞大的梅佐乔诺(注)（*mezzogiorno*）。宗教少数群体和外国人越来越成为奥斯曼帝国富有创造力的组成部分。生活在帝国中的外国人受到外国领事馆的保护，这些领事馆主要依据被称为领事裁判权条约（Capitulation，来自拉丁词汇“*capita*”，意思是“框架协议”）的条款实施保护。伊斯兰教法是奥斯曼帝国进行统治的依据，但是在财产（比如银行利息）方面并不能在风俗完全不同的民众中施行[从理论上讲，由于反对宗教改革的天主教禁止收取利息，所以僧侣接管了当铺，并将其称为“慈善之峰”（Mount of Piety）]。

艾哈迈德一世去世后，一位强势的母亲成为帝国真正的掌舵者。继任者穆斯塔法一世（MustafaⅠ，1617—1618年在位）精神不健全，仅在位一年就被耶尼切里军团投入到囚笼之中。艾哈迈德一世的一位年轻的儿子，奥斯曼二世（Osman II，1618—1622年在位）继任了苏丹之位。这位新苏丹天真地希望推行改革，亲自率领军队进行征战，并因黑海争端与波兰人展开较量。他意识到耶尼切里军团已经成为一个隐患，并计划将首都迁到开罗。然而，这位苏丹在黑海地区进行的战争并不顺利，而且耗尽了国库，于是耶尼切里军团在欧莱玛阶层的支持下，将穆斯塔法一世重新扶上苏丹之位。奥斯曼二世受尽羞辱并惨遭杀害，成为奥斯曼帝国历史上首位遭到罢黜的苏丹。

一年之后，穆斯塔法一世又被推翻，这位强势的母亲再次采取行动，将11岁的穆拉特四世（Murat IV, 1623—1640年在位）扶上王位。9年后，年仅20岁的穆拉特四世（在27岁去世）开始励精图治。他是一位伟人，很乐意率领军队出征。如果一位苏丹坚韧不拔且冷酷无情，那么他就能够控制国内局势。奥斯曼帝国最核心的问题是财政，因此穆拉特四世不但削减了宫廷寄生阶层巨额的花销，而且收紧了耶尼切里军团的钱袋。那时的耶尼切里军团不仅不参加任何战争，反而将注

意力集中在各种平民事务上。奥斯曼帝国开始征收新税，并镇压了国内的叛乱。穆拉特四世是幸运的，因为奥地利陷入了三十年战争[注]而无法自拔，所以奥斯曼帝国能够腾出手来对付萨法维王朝。1638年，奥斯曼帝国重新夺回了巴格达，并再次强行改变当地人的信仰。当然，这也体现在其他方面。奥斯曼帝国颁布了各种禁止基督徒和犹太人出风头的法律：希腊人应脚穿蓝鞋，亚美尼亚人应脚穿红鞋，而且这些法律一度付诸实施。此外，这位新苏丹还禁止饮酒，奥斯曼帝国的官员需要维持帝国的运转，而饮酒则会误己误国（艾哈迈德一世曾经处决了一位偷偷吸烟的人，穆拉特四世则处决了数千名烟民）。从巴格达返回君士坦丁堡一年之后，穆拉特四世因病英年早逝，奥斯曼帝国再次陷入困境。

穆拉特四世的哥哥易卜拉欣继承了苏丹之位，他不仅非常懒惰，而且纵情声色。他沉迷于后宫的温柔乡中，将帝国事务交给自己的亲信及母亲。易卜拉欣的母亲野心勃勃，终日与宦官在后宫策划阴谋诡计——这简直就是对东方专制主义的讽刺。大维齐尔借此机会放手聚敛财富，毕竟他已成为苏丹在政府中的代表。一位处于弱势的苏丹要控制臣属，只能诉诸周期性和突击性的清洗，可是这项举措也可能会连累他们的追随者。在12年的时间中，奥斯曼帝国共产生了18位大维齐尔，其中4人被处决，11位被解职，2位辞职，仅有1位在任职期间正常逝世。1648年，在苏丹皇太后的默许下，易卜拉欣也遭到废黜并被处决，年仅6岁的穆罕默德四世（Mehmet IV，1648—1687年在位）继任苏丹。这位新苏丹也有一位野心勃勃的母亲，她随后将易卜拉欣的母亲勒死。

这是奥斯曼帝国历史上的一段黑暗时期，因为苏丹的每次变动都意味着新的人事变动，并将影响整个帝国。由于易卜拉欣愚蠢地发动了夺取威尼斯人据守的克里特岛的战争，情势变得更加严重。这是一场耗时长久、花销巨大且毫无意义的战争（在战争后期，橄榄油被引入土耳其）。1640年，奥斯曼帝国共有6万名行政人员；到了1648年

时，奥斯曼帝国境内的行政人员已达10万，财政赤字巨大，而且不时发生耶尼切里军团叛乱。此外，君士坦丁堡的民众也被激怒，因为他们的薪酬以铜钱支付，却需要用白银来缴税。最终，行会在1651年也发动了叛乱，此次叛乱迫使穆罕默德四世的母亲采取了具有创造性的举措。1656年，她任命穆罕默德·科普鲁卢（Mehmet Köprülü）担任大维齐尔。那时的科普鲁卢已70岁高龄，是一位品性正直且经验丰富的阿尔巴尼亚人。他接受了此次任命，但前提条件是拥有充分的自主权。1656—1676年，科普鲁卢及其儿子法兹尔·艾哈迈德（Fazıl Ahmet）一直负责掌管帝国事务，随后被另一位来自梅尔济丰的科普鲁卢家族的人——卡拉·穆斯塔法（Kara Mustafa，其中“Kara”有“黑色”之意）接任。

这一时期，奥斯曼帝国出现了短暂的复兴，但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强制手段。提马尔成为帝国亟须处理的重要问题，此前，提马尔负责提供骑兵，但现在封邑被转给非军人经营。这些新的提马尔不仅被迫提供贷款，还需要缴纳税收。奥斯曼帝国对骑兵部队进行了整肃，许多骑兵遭到清洗。依然忠诚于奥斯曼帝国的军队扑灭了各地的叛乱，包括发生在埃及的大规模叛乱。奥斯曼帝国的财政收支逐渐恢复平衡。1669年，奥斯曼帝国在克里特岛最终取得了胜利，巴尔干半岛北方前线的局势也趋于稳定。在一段时期内，奥斯曼帝国至少在名义上控制着乌克兰的大部分土地。法兹尔·艾哈迈德像其父亲一样办事高效，很少动用极刑，并使帝国的财政收支得到平衡。在科普鲁卢复兴时期，奥斯曼帝国真正的问题是并未实施法治。在17世纪的欧洲，特别是英格兰，依法治国越来越盛行。而在奥斯曼帝国，由于财产权得不到保证，而且帝国随意征税，极权与骚乱交替上演。关于奥斯曼帝国在这段时期内是否已走向没落的问题，至今仍存在争议。但是，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评论就是对此问题的一个回应：战争是一个无可争辩的展示自身实力的机器，只有强权才能够获得最大利益。至少最初的两位科普鲁卢实行了富有成效的独裁统治，而且留下了一座宏伟的建筑物，或许可称之为最后的重要印记：一座距离伊斯

坦布尔大巴扎不远的图书馆，这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尽管如此，奥斯曼帝国却将面临一系列难题。

---

1. 《后宫诱逃》是莫扎特的第一部喜剧杰作，于1782年在维也纳首次公演，并造成巨大轰动。——译者注
2. 杰拉里叛乱，是16世纪末17世纪初在安纳托利亚地区爆发的一系列反对奥斯曼帝国中央政府的叛乱。这些叛乱主要由一位名为杰拉里的地方长官率领，他们发动叛乱的部分原因是试图获得税收特权。——译者注
3. 穆夫提，伊斯兰教教职称谓，即教法说明官。——编者注
4. 梅佐乔诺，泛指意大利南部地区与意大利北部地区存在的巨大发展差距，这种发展差距造成意大利区域趋同度较低，且长期内难以解决，这种现象又被称为“梅佐乔诺陷阱”。——译者注
5. 三十年战争，是由神圣罗马帝国的内战演变而成的全欧参与的一次大规模国际战争。——编者注

第五章
天平的转换



G.J.Grelot，View of Constantinople，来自*Relation nouvelled’un voyage de Constantinople*，1689年。这幅雕刻现存于Photo Thames&Hudson Ltd公司。

在科普鲁卢时期，奥斯曼帝国扩展至中欧和东欧的广大地区，尤其在经济活动方面。奥斯曼帝国未能厘清自己的金融事务，而是采取了可能带来长期毒害效果的权宜之计：没收以及包税农场。奥斯曼帝国的财政再次严重依赖征服带来的收益，如果控制了贸易中的瓶颈因素，便能够赚取大量利润。黑海依然是奥斯曼帝国的内湖，禁止俄国以及西欧船舶驶入。黑海北海岸和克里米亚半岛由一个实力强大的鞑靼王国经营，控制鞑靼王国的格来王室自视甚高，他们的骑兵能够迅速穿越乌克兰平原，而同样的路程却会耗费奥斯曼帝国军队数日。这个地区关系复杂。一直占有这个地区的波兰开始像匈牙利一样逐步解体。充满侵略性的游牧部落在这个地区肆无忌惮，哥萨克人（这个词来自鞑靼语）不受任何政府管辖，纵马到处实施大规模的劫掠：有时候他们会击败波兰人，有时候又与其结盟，他们与奥斯曼帝国和俄国

之间的关系也经常如此。乌克兰地区处于分裂和无序状态，在其北部边界的奥斯曼帝国附属国摩尔达维亚和特兰西瓦尼亚也不安分。北欧的瑞典国力强大且富有侵略性，在疯狂的查理十二世（Charles XII）主政时期，地区形势变得更加复杂。路易十四掌权后，法国试图争夺欧洲霸权，并与英国和荷兰结盟共同对抗奥地利帝国，进一步加剧了形势的紧张。按照常理来说，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者应该小心谨慎，如果瑞典暂停活动而西欧各国又处于和平状态，奥斯曼帝国绝不应采取进一步的攻势。

但这些因素并没有列入奥斯曼帝国统治者的考虑之中，因而可以说他们在很大程度上生活在所谓的“理想世界”中。这一次，君士坦丁堡的统治者并没有做好必要的准备。在奥斯曼帝国的统治阶层中，没有人会说外语，而那些会说外语的基督徒则受到歧视和怀疑。奥斯曼帝国军队在与波兰人的较量中处于上风，并与一些哥萨克人结成同盟，甚至侵袭了波兰东南部的重要城市利沃夫。奥斯曼帝国幻想匈牙利的清教徒会得到法国的支持，却没有想到路易十四正在驱逐本国的胡格诺教徒。奥斯曼帝国认为此时显然是展示自身实力的良好时机。卡拉·穆斯塔法在接替了法兹尔·艾哈迈德的职位之后，幻想着彪炳史册，决定进攻维也纳。早在1664年，奥地利军队就已经在圣戈特哈德战役中展示了自身的强大实力，随后与奥斯曼帝国在沃什堡签订停战协议，从而能够在意大利和德意志集中精力对付法国。然而，奥斯曼帝国却在1683年以狂妄自大的行动废除了这项协议。大谢赫曾经警告苏丹，指出奥斯曼帝国真正的威胁是俄国，但苏丹对此置若罔闻，他认为奥斯曼帝国将会自上而下地主导地区霸权。

与20万大军同时行进的，还有一项规模庞大的后勤补给活动，步调基本上与火炮部队保持一致。奥斯曼帝国军队通过搭建便桥艰难过河，并努力克服在沼泽地中行军的困难，平均每天仅能行进4英里，补给则随后跟进。与此同时，大维齐尔的银质马车也在泥泞中艰难跋涉。奥斯曼帝国军队从埃迪尔内经贝尔格莱德到达布达，耗时约三个

月，并最终与来自罗马尼亚地区的鞑靼人的步兵和骑兵部队会合。1683年7月，规模庞大的军队，连绵数里的帐篷，以及各种随军物品都出现在维也纳城下。随后，奥斯曼帝国的火炮部队开始攻击。但奥斯曼帝国的炮弹都是依靠骆驼运输，这种运输方式的缺点是不能运载沉重的炮弹。此前，维也纳城已经加强了防卫，这些炮弹由于太小而不能对城墙造成实质性的伤害，射到城墙上后都被反弹了回去。奥地利王朝的皇帝利奥波德（Leopold）为谨慎起见离开了维也纳城，但他召集了盟友前来增援。在此次事件中，奥地利王朝并非仅仅获得了盟友的帮助，几乎每一个基督教国家都对这个地区拥有浓厚的兴趣，包括俄国。卡拉·穆斯塔法选择进攻维也纳城的时机也非常糟糕：当时的法国与奥地利王朝之间已经处于休战状态；穆斯塔法率军进攻维也纳的举动，成功地迫使波兰人和俄国人抛弃前嫌，联合一致对付奥斯曼帝国；威尼斯人仍然拥有强大的实力，也参与到救援维也纳的行动中来。为奥斯曼帝国一方作战的匈牙利人派系分立，几乎起不到任何作用。1683年9月，波兰骑兵和德意志王子率领的军队前来支援维也纳，从背后袭击了围城的奥斯曼帝国军队。奥斯曼帝国军队全线溃败——军队几乎丢掉了所有的装备和给养，败退到匈牙利，布达城也很快陷落。奥斯曼帝国在维也纳之战中的惨败使卡拉·穆斯塔法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他在贝尔格莱德城内被处以绞刑。

自此，基督教世界开始发动反击，并于1688年攻占了贝尔格莱德。很快，萨法维王朝也加入打击奥斯曼帝国的行列中。奥斯曼帝国的疆域过于辽阔，几近处于崩溃的边缘：威尼斯人重新进攻希腊地区（正是在威尼斯人围攻雅典的战争中，帕提侬神庙被威尼斯的炮弹击毁）；奥地利人则开始进入保加利亚；尽管俄国军队被奥斯曼帝国的后勤部队击败，但是他们仍向黑海地区进军。1687年，随着灾难的降临，奥斯曼帝国境内发生了政变，穆罕默德四世遭到罢黜，并由其哥哥苏莱曼二世（Süleyman II，1687—1691年在位）接替苏丹之位。当被带出托普卡帕宫中昏暗的地区时，苏莱曼二世步履蹒跚，惊恐万分，本以为自己会被处死，却被告知即将接任苏丹，成为先知的继承

人和执掌奥斯曼帝国权力的总长官。当反叛部队的长官被授予封邑以及鲁米利亚的治理权之后，他们开始重新效忠奥斯曼帝国。奥斯曼帝国唯一的希望寄托在位于帝国西部边境地区的奥地利身上，正是奥地利王朝的分裂，在历史的长河中一次次化解了奥斯曼帝国的燃眉之急。

1699年，奥斯曼帝国被迫签署了《卡洛维茨条约》（Treaty of Karlowitz），从此放弃了对匈牙利的控制。在此形势下，奥斯曼帝国本应丢掉更多的领地，但是哈布斯堡王朝在1701年卷入了与法国路易十四王朝的最后征战：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在1697年爆发于塞尔维亚—匈牙利边界的森塔战役中，奥斯曼帝国已经显露出颓势，这种落后可以进一步通过对于胜利的幻想体现出来：到处挥舞先知的旗帜，鼓励进行自杀式袭击。奥斯曼帝国体制已经破败，此时却没有其他替代措施。奥斯曼帝国是一个需要不断扩张的帝国，只有进行扩张才能够妥善安顿耶尼切里军团，否则这个军团会不断制造麻烦。以前，奥斯曼帝国通过占领一些地区，获得一些收入，以此收买耶尼切里军团。此时，奥斯曼帝国却一次次处于防守的地位。如果奥斯曼帝国未受到外部干扰，或者仅仅面临一个困境，那么奥斯曼帝国在旧体制之下依然能够运转良好。否则，便会危机四起。奥斯曼帝国只能寄希望于竞争对手之间的内讧。由于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一直持续到1713年前后，奥斯曼帝国的不利处境得以扭转，收复了部分失地。但是，当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结束后，奥地利军队在欧根（Eugene）亲王的率领下，于1716年重新将注意力转回巴尔干半岛。在彼得瓦顿战役中，虽然威尼斯军队表现不佳，但是奥地利军队依然击败了一支奥斯曼军队。奥斯曼帝国丢失了部分希腊领土，并在1718年与奥地利王朝签订的《帕萨罗维茨条约》（Treaty of Passarowitz）中，将贝尔格莱德划给了奥地利。奥斯曼帝国的败绩迫使大批穆斯林逃离匈牙利。20年之后，奥斯曼帝国的战争颓势有所缓解，主要是由于奥地利卷入了与实力迅速上升的普鲁士的征战之中。奥斯曼帝国甚至意外地享受了长时间的和平：这段时期（一直持续到1730年）被称为“郁金香时代”。

郁金香来自中亚地区，它的名称（tulip）来自波斯词汇“头巾”（turban）。在这个时期，奥斯曼帝国大量出口郁金香。17世纪30年代，荷兰地区曾经掀起了著名的郁金香狂潮，而且围绕各种郁金香球茎的期货价格出现了荒诞的投机行为。此时的奥斯曼帝国境内也出现了郁金香狂潮，并受到艾哈迈德三世（Ahmet III, 1703—1730年在位）的热捧，甚至使郁金香在一段时间内成为投机的代名词。艾哈迈德三世生性温和，小时候曾经生活在相对宽松的环境中，而不是托普卡帕宫的囚笼之中。艾哈迈德三世是幸运的，因为奥斯曼帝国通过在多瑙河地区出售税收权开辟了一种新形式的税收来源，但他挥霍无度。在这段时期内，西方特别是法国的时尚潮流开始在奥斯曼帝国蔓延，艾哈迈德三世进口或者仿制了许多物品，纵情享受：他在宫殿中拥有自己的凉亭，廊柱上装饰着各种花样的绘画。艾哈迈德三世派往法国的大使回国后，兴高采烈地向他描述了法国国王政务处的公园和宫殿的壮丽场景。艾哈迈德三世在卡加辛那地区划出了一块土地，决定在那里仿建王宫。该地区以“欧洲的甜水域”著称，有两条河流在金角湾的海角处汇聚。艾哈迈德三世在这里建立了萨达巴德宫，宫中拥有精心设计的花园，花园中特意种植着郁金香：这里经常举行精彩的庆祝活动，在装饰性的乌龟贝壳上，还安置着能够照亮花朵的蜡烛。在这段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奥斯曼帝国都处于和平状态。透过当时的宫廷画师李维尼的微型画，我们也可以深刻地了解这段“郁金香时期”（李维尼于1720年创作的名为“*Surname-i Vehbi*”的作品，展示了苏丹的儿子接受割礼的盛典，同时还绘有“翩翩起舞的男孩”，展示出奥斯曼帝国宫廷的部分特征）。

但是，这也是伟大的苏丹们所建帝国的最后时刻。奥斯曼土耳其人也会自我反省，而且经常涌现出精干的大维齐尔——特别是艾哈迈德三世时期位于卡帕多西亚地区内夫谢希尔的易卜拉欣帕夏——他们知道在欧洲（以及俄罗斯）已经发生了一些令人忧虑的变化。在18世纪前半叶，奥斯曼帝国首次向国外，特别是向巴黎派出了使节，一些人非常懒惰，对所谓的异教徒事务不感兴趣，另一些人则努力找寻奥

斯曼帝国与西方的差异。奥斯曼帝国的外贸活动不断增多，外国商人也不断增加，特别是在士麦那和萨洛尼卡。西方对于奥斯曼帝国的潮流和装饰图案非常痴迷，与奥斯曼普通民众间的私下往来也非常密切。

玛丽·沃特利·蒙塔古（Mary Wortley Montag）夫人（她是一位伯爵的女儿，可能与亚历山大教皇关系密切）创作了一部关于奥斯曼帝国郁金香时期的经典英文著作，而在她寄往家里的信中，详细描述了自己在1716年通过奥斯曼帝国的前线地区前往君士坦丁堡一路上的见闻。蒙塔古夫人的丈夫当时担任英国驻奥斯曼帝国的大使，居住在君士坦丁堡。她在贝尔格莱德会见了当地的行政长官，这位长官拥有充沛的精力和非凡的魅力，酷爱饮酒，向她讲述了各种令人捧腹的故事。当时，贝尔格莱德到处都有不法之徒，在一支耶尼切里骑兵队的护卫下，蒙塔古夫人在旅程中的安全才得以保证。耶尼切里军团欺凌当地民众，却没有丝毫的愧疚之意。在君士坦丁堡，这位伟大的女性仔细观察了各种细节，并学习了当地的语言。蒙塔古夫人有很多土耳其女性朋友，她们会告诉她各种事情，而且这些女人一旦出了屋子便会携带面纱，因此没有人知道她们是谁，故而可以与男性约会而不会受到质询。

无疑，18世纪的奥斯曼帝国历史很难理解，因为你需要不断借助西方的记载来了解它，有时候这些记载极具欺骗性，但它们基本上都来自旁观者的观察。一旦你深入了解了奥斯曼帝国的内核，想要做出评判就会变得非常困难，因为那是一个宗教的时代，而且奥斯曼帝国体制契合了自身在宗教领域的处境，故而很难用确切的词语来描绘。苏丹们相互继承王位，皆属平庸之辈。其中，奥斯曼三世（Osman III，1754—1757年在位）是一位虔诚但令人厌烦的人。从某种角度来看，那时的奥斯曼帝国处于辉煌时期，因为每位记录者都论述了帝国举办的规模宏伟的庆祝活动，有时候这些活动会持续两周，比如苏丹为年轻的儿子们接受割礼所举办的庆典。但是，奥斯曼帝国同时也面

临着深刻的危机，这些危机可能随时爆发。1730年，艾哈迈德三世被耶尼切里军团的叛变推翻。此次兵变由一位名叫帕特罗纳·哈利勒（Patrona Halil）的阿尔巴尼亚人领导，他们直到易卜拉欣帕夏和苏丹的其他心腹被处决之后才罢休。在此次事件中，艾哈迈德三世的继承者马哈茂德一世（Mahmut I，1730—1754年在位）玩弄了一个漫长且奸诈的伎俩，他邀请哈利勒及其朋友参加宴会，假借祝贺他们获得升迁的名义设下埋伏，将他们一网打尽。这预示着郁金香时代的终结。

欧莱玛继续负责解释伊斯兰教法，对于7世纪阿拉伯帝国时期教法没有做出规定的领域做出裁判。总体而言，当时的伊斯兰教依然是过时的。在表象之下，你可以明显感觉到民众精神状态的改变。18世纪前半叶，大部分奥斯曼土耳其人对于宗教信仰并不重视，而且无人知晓他们私下里的言行。即使是清真寺建筑也受到洛可可风格的影响，最著名的例子是位于大巴扎市场的努鲁·奥斯曼尼耶清真寺，它由马哈茂德一世在1748年开始修建。马哈茂德一世的继任者奥斯曼三世试图重新恢复宗教法规——禁止饮酒，禁止非穆斯林穿戴奇装异服等——但是这些举措在很大程度上遭到忽视，而且也没有得到延续。奥斯曼三世的继任者穆斯塔法三世（Mustafa III，1757—1774年在位）也没有什么值得称颂之处，但他可能是第一位举债的苏丹。到1768年时，尽管伊斯兰教反对借贷，但由于俄国已经崛起，奥斯曼帝国别无选择。

奥斯曼帝国体系开始崩溃，这是不争的事实。耶尼切里军团全部从事职责之外的事务：如果你幸运，便可以继续打理店铺；如果不幸，便会受到敲诈勒索。君士坦丁堡经常周期性地遭受火灾的侵袭，大火往往会席卷拥挤的木质建筑群。一个极不寻常的悖论是，在理论上非常强大的奥斯曼帝国政府，却不能实施像维也纳城那样的城镇规划。当时，维也纳城拥有宽阔的街道和广阔的公共空间，主体建筑是一座宏伟的宫殿或一座华丽的教堂。由于受到伊斯兰教法的限制，奥斯曼帝国未能开辟像西方国家首都那样开阔的公共空间。在所有的国家，财产所有者与财产使用者之间都会存在权力争议，但是在伊斯兰

教法之下，使用者却拥有优先权。在伊斯兰国家，如果使用者封闭了一条街道并进行修缮，那是他们的权力；但在遵循罗马传统的西方国家，公共权力机构可以征用公共空间，比如在英格兰，大贵族可以通过使用和操控英国财产法达到同样的效果。但在君士坦丁堡或者其他穆斯林城镇中却并非如此，而且在这些拥挤的地区，政府仅在大火灾爆发后才能进行检视，疾病也会在那里迅速蔓延。君士坦丁堡的卫生状况极其糟糕，臭名远扬。外国驻君士坦丁堡的使节每年夏天都会逃离那里，前往黑海地区度假，一般是去塔拉比亚（Tarabya），那里建有特别的夏季休闲区。塔拉比亚是希腊语中“Therapeia”或者英语词汇“therapy town”（医疗胜地）的土耳其语变形。苏丹们自己也经常逃离首都，在夏季，他们会前往埃迪尔内，并在那里开展狩猎活动。

在奥斯曼帝国占领的巴尔干半岛地区，离心倾向日益严重。此前，奥斯曼帝国的官员会妥善照管农民：他们会受到保护，免受强盗及不称职的土地领主的欺凌。腐败或者不称职的官员甚至会被处决，财产也会被没收。但是，那个体系主要建立在封建提马尔体制之上，而提马尔体制尚未涉及与农业资本主义相关的继承制度。如果提马尔未能履行自身职责，甚至会遭到免职。18世纪，随着萨洛尼卡商路沿线地区贸易活动的扩展，一些提马尔开始扩展土地，贿赂当地官员，并将提马尔领邑转建为种植园。这意味着农民地位的下降，而且按照奥斯曼帝国的惯例，大种植园主一般都是穆斯林，农民则主要是基督徒，因此农民的生存境况进一步恶化。东正教会拥有大量土地，虽然经营不善，却依然不断扩张，进一步加剧了局势的紧张。这些状况导致农民拥有的土地越来越少，而且通常是贫瘠和多石的土地。

后来，在整个巴尔干半岛地区，特别是在山区，土匪和强盗横行霸道。在希腊，这些人以“*klephts*”著称，他们像罗宾汉一样，被后人通过英雄传说以及歌曲的形式传颂。那么，这些土地领主是如何应对的呢？他们招募了其他的地痞流氓来充当警察，这些人被称为阿马图勒斯[注]（*Armatoles*）。著名的法国历史学家吉勒·魏因施泰因（Gilles

Veinstein）将此称为“从绿林好汉向窃贼警察”的转换，这个比喻非常恰当。巴尔干半岛处于无政府状态，经常会发生野蛮的劫掠行为——当你沿着一些泥泞不堪的道路艰难行进，可能会穿过一些高耸的木桩，有些人被插在这些木桩的顶端，他们不断发出极度痛苦的呻吟。到1770年，巴尔干半岛的一些进步人士可能在思忖，不知能否借助西方的帮助获得发展。

但是，这些先进人士在穆斯塔法三世的宫廷中表现并不突出。在叶卡捷琳娜女皇主政时期，俄国迅速崛起。奥斯曼帝国无人能够深刻地认识这种局面，有时候甚至连最基本的状况都不知道。奥斯曼帝国依然与波兰和瑞典保持着固有的联系，却高估了波兰的作用。威尼斯现在不堪一击，奥地利将重心转向了德意志，法国依然与奥斯曼维持着友好关系。由于沉迷妄想，穆斯塔法三世陷入与俄国的战争泥潭之中，围绕黑海与俄国展开角逐。俄国已经深入北高加索地区，而这些地区在理论上都属于奥斯曼帝国的势力范围。与此同时，俄国还觊觎克里米亚半岛，而克里米亚汗国是奥斯曼帝国的附属国。毗邻乌克兰的摩尔达维亚的统治者，明目张胆地与莫斯科联合。穆斯塔法三世想要展示自己才是黑海地区的主人，因而在1768年与叶卡捷琳娜女皇主政的俄国爆发激战。几乎一夜之间，在18世纪貌似强大的奥斯曼帝国便濒临崩溃的边缘。

---

1. 奥斯曼帝国在希腊境内组建的基督徒非正规军。——译者注

第六章
漫长的防守



Eugène Delacroix，*Scenes from the Massacres at Chios*（detail），1824年。此画在帆布上用油墨创作，大小为419厘米×354厘米。现存于巴黎罗浮宫。

在土耳其有这样一句谚语：一次灾难胜于一千条建议。自1768年开始的长达6年的俄土战争就是一次这样的灾难，最终以1774年签订的《库楚克开纳吉和约》（Treaty of Küçük Kaynarca）告终。在这场战争中，相比于割地赔款，奥斯曼帝国最大的损失莫过于失去威望和收入，它不可战胜的神话终被打破。自1453年以来，总体来说黑海一直是奥斯曼帝国的内湖。从中欧地区顺多瑙河而下，或者从俄国经德涅斯特河和第聂伯河而下的贸易路线，都需要经过奥斯曼帝国，因而奥斯曼帝国获得了大量的税收。克里米亚半岛人口混杂，是鞑靼王国的

统治核心。鞑靼王国处于格来王朝的统治之下，格来王朝的统治者自称是成吉思汗的尊贵后裔，而且接受了奥斯曼帝国的宗主国地位。当然，鞑靼人并非铁板一块，也有一部分与俄国结盟，特别是位于北高加索地区的诺盖人（这些人最终被用来压制发动革命的俄国暴徒，诺盖人遗留下来的长鞭证明了他们在革命中真实地存在过）。从理论上讲，北高加索人属于突厥人，而生活在西高加索地区的切尔克斯人虽然是山地民族，却属于穆斯林。在高加索地区，奥斯曼土耳其人及其盟友作战英勇，但是在巴尔干半岛，特别是多瑙河三角洲地区，结局却令人非常失望。

奥斯曼帝国在海战中的失利尤为显著，最终迎来了灾难性的时刻。地中海地区出现了一支俄国舰队，其中包括一些英国海事人员——这是俄国利用外国人的独特创举。俄国的变化，首先要从叶卡捷琳娜女皇自身说起。她来自安哈尔特的一个分区，这个分区是德意志的一个公国，面积相当于一块体面的高尔夫球场。1762年，叶卡捷琳娜指使情人用一个脚蹬将她丈夫的脑袋击碎，从而登上俄国皇位。叶卡捷琳娜的前夫名叫保罗三世（Paul III），他在死之前6个月刚刚继承了皇位。保罗三世的姑姑伊丽莎白女王逝世之后，保罗三世在为伊丽莎白女王举行安灵弥撒前大量饮酒，并将弥撒的曲调换成《赞美颂》，可谓丑态百出。然而，这些来自北部地区的野蛮人却在此时终结了奥斯曼帝国对黑海地区的垄断。俄英联合舰队突然袭击了奥斯曼帝国的希腊地区，在那里登陆并试图鼓动东正教徒发动叛乱，然后又袭击了士麦那的港口。1770年，得益于优良的炮舰以及高超的航海技术，俄国舰队在靠近希俄斯岛附近的切什梅时，将一支奥斯曼帝国舰队彻底摧毁。最初，对于俄国舰队为什么能够到达地中海地区，奥斯曼帝国的情报人员百思不得其解，这也反映出奥斯曼帝国的真实状况。奥斯曼帝国的情报人员还以为存在一条可以横贯欧洲的名为莱茵河的河流，其愚昧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此刻，我们需要谈一谈君士坦丁堡的主要政府机构，即巴布–伊–阿里。它是日益衰落的帝国的守卫者，是奥斯曼帝国的主要决策部门。在法语速写中，这个政府部门的名称演变成为“波尔特”，并得到广泛使用。当1774年俄土战争结束后，波尔特不得不接受奥斯曼帝国失去黑海控制权的事实。俄国成为北高加索地区的主导势力，并打算接管格鲁吉亚。在俄国的策划下，克里米亚半岛获得独立，后来又被并入俄国。格来王朝的一位名叫沙欣的青年王子，从各方面来说都可谓英俊潇洒，成为叶卡捷琳娜的情人。另一位格来王子成为苏格兰清教徒，与来自爱丁堡的一位名为帕特森的女士陷入爱河。当这位女士的父亲（一位律师）宣称即使对方是一位王子，也不允许自己的女儿嫁给东方人之后，这位格来王子便与帕特森女士私奔。50年之后，当英国军队登上克里米亚半岛时，发现这位女士依然住在克里米亚半岛的宫殿之中。帕特森的其中一个后代嫁给了一位名为格斯多夫的贵族，并在纳粹德国举办了最后的上层社会婚礼。随后，克里米亚鞑靼人和诺盖鞑靼人陷入争斗之中，俄国则在1783年直接吞并了克里米亚半岛。对此，奥斯曼帝国苏丹所能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要求俄国承认他作为穆斯林保护者的地位。叶卡捷琳娜女皇虽然予以承认，却带有附加条件，即她应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奥斯曼帝国基督徒的保护者，这便为俄国不断干预奥斯曼帝国事务埋下了隐患。

现在，随着俄国船队（其中一些是希腊船舶，只不过为了通行便利而悬挂了俄国国旗）畅行无阻地通过博斯普鲁斯海峡，载着鞑靼人和切尔克斯人逃到安纳托利亚高原避难。随着奥斯曼帝国首次丢失大片穆斯林土地，奥斯曼帝国内部爆发了一场严重的危机。尽管精英阶层多年以来一直声称奥斯曼帝国需要进行变革，但他们一直没有采取行动，因为这个体制仍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运行，而且奥斯曼帝国几乎没有受到要求变革的内部压力。即便是东正教会也对现状感到非常满足，而且不希望外来者进行干涉（当时，到阿托斯圣山朝圣的德意志人发现拜占庭帝国的著作被用来塞门缝，甚至被用来取暖，感到非常震惊）。成千上万的耶尼切里军团士兵贪污公款，而且经常将他们的

特权出售给亚美尼亚投机商。苏丹实际上只能掌控被称为“Hüdavendigar”[注]（苏丹省）的地区，尽管这个地区囊括了君士坦丁堡（至今，这个地区的产值依然占到土耳其GDP的近2/3），但实际上仅包括早期奥斯曼王朝在布尔萨附近的地区。

除布尔萨省之外，奥斯曼帝国的其他地区主要由当地族长统治，几乎不受苏丹的管辖。奥斯曼帝国在北非的领地早已丢失，但耶尼切里军团士兵的后代以及当地被称为科尔奥卢的女性群体依然非常强大，他们在近代土耳其事务中拥有话语权，只是在表面上从属于奥斯曼帝国而已。埃及人几乎不受奥斯曼帝国统治，而叙利亚和伊拉克等地的阿拉伯人拥有独立经营的包税农场，只需要向奥斯曼帝国缴纳少量赋税，就可以鱼肉当地民众。在这些地方中，最糟糕的莫过于罗马尼亚地区，尤其是瓦拉几亚和摩尔达维亚。在罗马尼亚地区，当地的一些曾经非常强大的王朝都已灭绝。君士坦丁堡芬内尔地区的富裕希腊人，主要聚居在东正教宗主教区附近的豪华住宅中，他们每年都会拍卖自己在罗马尼亚地区的世袭权或税收权。索特左斯人、吉卡斯人（阿尔巴尼亚人的一支）以及马夫罗科达托斯人络绎不绝地来到瓦拉几亚的首都，然后再前往克拉约瓦。他们通常会带着自己的亲戚及一位阿尔巴尼亚保镖，到这些地区搜刮钱财。此后，他们会发布公告，宣称自己将负责统治本地，并大肆征税。在这些人的残酷剥削之下，如果有农民因不堪忍受而逃亡，他们的财产便会遭到没收。此后，另一位希腊人——吉卡十四世（Ghika XIV）王子也来到这里，进行同样的搜刮。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包税主的良心也逐渐受到谴责，等到这些索特左斯人以及吉卡斯人繁衍到第四代的时候，他们都成为自由民族主义者，鼓吹（过分强调）罗马尼亚语源于拉丁语，并将自己称为法国人的堂兄弟。

在这一团混乱中，应该从何处开始呢？在签订《库楚克开纳吉和约》之后，最令奥斯曼帝国统治阶级震撼的莫过于俄国先进武器所发挥的重大作用。因此，奥斯曼帝国采取的第一个举动便是进行军队改

革，其中最大的阻力来自耶尼切里军团。这个军团难以被解散，而且奥斯曼帝国已没有足够的资金来收买他们。阿卜杜勒·哈米德一世（Abdülhamit I，1774—1789年在位）从名誉扫地的穆斯塔法三世手中接替了苏丹之位，相比于前任，他已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奥斯曼帝国需要一支新型军队，而且需要向西方学习。在所有的外国军队中，法国军队最负盛名，并以其精良的火炮部队闻名于世。在此之前，一些西方专家已经来到了奥斯曼帝国，但他们难以有所作为。宗教保守主义或者奥斯曼土耳其人对无所不知的外国人的憎恶，成为阻碍这些外国专家传播知识的重要障碍。即使这些外国人皈依了伊斯兰教，他们依然会被视作机会主义者而遭到免职，就连当时最有名望的胡姆巴拉西·艾哈迈德（Humbaracı Ahmet）帕夏也是如此。

这时，托特（Tott）男爵以火炮专家的身份来到了奥斯曼帝国。尽管他以法国人的名义前来，但实际上只是又一位匈牙利人而已[当然，他也可能是一位斯洛伐克人，“*Tót*”是一个卑贱的称谓，在匈牙利语中相当于“nigger”（黑鬼）]。托特男爵建立了一支炮兵部队，对他们进行了严格培训，但在炮兵射击学方面遭遇难题。炮术不仅涉及装弹，炮手还需要具有良好的数学基础。然而，欧莱玛早在半个世纪前就已关闭了数学学校，理由是它们在探索最好留给恶魔的秘密。据传说是这样，虽然我们也存在疑惑，因为土耳其人与俄国人一样都拥有悠久的数学传统，而且他们在当代也确实非常成功地步入了计算机文明时代。托特男爵曾经创作了具有高度可读性的4卷本回忆录，尽管其中不乏修饰之词，却无疑反映出当时的实际状况。最后，托特男爵训练出了炮兵部队，但未得到耶尼切里军团的认同。

1787年，为了夺回克里米亚半岛，奥斯曼帝国再一次对俄国宣战。在经过荒谬的分析之后，奥斯曼帝国认为瑞典人将会发挥重要作用。确实，瑞典人随后也对俄国发起了进攻。然而，战争结果证明，俄国人之所以不能集中精力对付奥斯曼帝国，主要是由于陷入与波兰纷争的之中并受到法国大革命的冲击，而瑞典军队的牵制仅是次要因

素。尽管奥斯曼帝国在高加索地区取得了一定的胜利，但未能扭转整个战局，因为奥地利人与俄国结盟，并重新夺取了贝尔格莱德。尽管奥地利之后在法国的干预下将贝尔格莱德归还，这依然反映出奥斯曼帝国的衰颓。俄土战争中的一个揭露了奥斯曼帝国发展问题的插曲，更加表明这场战争是毫无意义的。托特男爵为奥斯曼帝国的军事发展做出了很多贡献，但奥斯曼帝国发展炮兵的必要资源依然缺乏。那么，奥斯曼帝国应该选择一些巨型火炮，还是采购一些小型火炮呢？奥斯曼帝国选择了巨型火炮，并将其部署在第聂伯河河口地区的奥恰科夫要塞中。在战争中，奥斯曼帝国守军从奥恰科夫要塞中发射了一颗巨型炮弹，这颗炮弹在空中化成无数的碎片，炮座也被毁坏。奥恰科夫要塞最终陷落。这个战争插曲导致君士坦丁堡爆发了激烈的争论：到底是外国人不可信赖，还是需要启用更多的外国人，开展更宏伟的项目？

1789年，阿卜杜勒·哈米德一世逝世后，他备受赞誉的侄子塞利姆三世（Selim III，1789—1807年在位）接任了苏丹。正是在塞利姆三世执政时期，奥斯曼帝国自觉地开启了西化进程。当时，“东方问题”已经开始凸显，需要他妥善应对。这个问题非常简单，至今依然伴随着我们：当奥斯曼土耳其解体后，将会发生什么？“东方问题”涉及各个方面：战略、经济以及宗教。东正教俄国是否会再次在君士坦丁堡重建一个拜占庭帝国？为了实现这个目的，俄国在与英国和法国结盟的问题上采取了不同的策略，便于在两者间制造分裂。1789年，“东方问题”第一次摆到桌面上：拿破仑率军入侵了埃及。

著名的德国史学家托马斯·尼佩代（Thomas Nipperdey）曾指出，德意志的宏伟历史可以用一句话来开始：“它最初由拿破仑开启。”通过在近30年的战争中对外输出革命，拿破仑自上而下动摇了腐朽的神圣罗马帝国的统治，并开启了德意志的现代化进程。从某种程度上说，拿破仑也在西班牙制造了同样的效果：从西班牙（而不是英国）的视角来看，半岛战争是历时长久的内战的开端，仍未得到完全解

决。众所周知的是，此时的奥斯曼帝国也在某种程度上爆发了内战，改革派与保守派之间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可以说，这个问题也一直伴随着我们。1789年革命赐予了法国巨大的能量，到1797年时，法国所占领的疆域已经远远超出旧王朝的范围：法国在德意志和意大利拥有一系列附属国，包括已被法军占领的旧威尼斯王国；欧洲低地国家，比如比利时和荷兰，也被法国占领。由拿破仑担任将军职位的新革命政府，采纳了软弱无力的前任政府提出的主张。在与英国的争夺中，法国失去了印度和北美，为何不用更加贵重的礼物——比如黎凡特或者近东地区——补偿自己呢？此外，对于妄图在巴黎控制全球的执政者来说，占领那些地区之后，不管是借道潜在的盟友波斯，抑或修建一条从苏伊士到红海的运河以通行战舰，法国都能威胁英国在印度的存在。

1798年7月，时年28岁的拿破仑以法老的化身自诩，率领一支法国军队偷偷越过英国海军的封锁线，在埃及登陆。他率领法军与乘坐着骆驼、挥舞着军刀的马穆鲁克统治者展开激战，结果大获全胜。马穆鲁克统治阶层中最聪明的群体已经意识到，拿破仑带来的是完全不同的事物，可以使埃及摆脱腐朽的奥斯曼帝国的专制统治。尽管法军遭到严密封锁，自负的英国舰队总指挥威尔逊在慢半拍地发现法国舰队之后，率领英国舰队将其摧毁，但是拿破仑在埃及第一年的状况并不是特别糟糕。随后，拿破仑率军入侵奥斯曼帝国的占领区，但在一些地区遭到顽强抵抗。拿破仑下令处死了一批犯人，这有损其名誉。1799年，拿破仑意识到法军已在埃及遭遇失败，便偷偷返回法国，很快就掌握了政权。但是，拿破仑已经开启了“东方问题”，并使埃及走上了引人注目的西化进程。在埃及时，拿破仑非常清醒，善于利用当地民众和驻守在那里的法国军官。在此进程中，一位颇具魄力的人物脱颖而出，他就是穆罕默德·阿里（Mehmet Ali）。

阿里是一位阿尔巴尼亚人（一生都讲着奥斯曼土耳其语），他创建了一支专业化的陆军和海军，吸引外国专家到埃及发展工业，派兵

入侵了阿拉伯半岛，并控制了从那里兴起的狂热的瓦哈比运动。对此，塞利姆三世几乎无计可施，只得授予阿里总督职务。实际上，阿里已成为新埃及的国王。正如土耳其历史学家谢里夫·马尔丁（Şerif Mardin）所指出的，在这段时期内，奥斯曼帝国最有生命力的部分是埃及，而帝国的沉重负担则在巴格达。1807年，塞利姆三世同时面临着英国的威胁（只不过因为在法国大使的协助下加强了首都的防卫，才击退了英军的进攻），此外，奥斯曼帝国还陷入俄土战争之中。然而，我们又可以说奥斯曼帝国几乎没有处于战争之中，因为塞利姆三世自身的军队，也就是耶尼切里军团，正忙于收取保护费而无暇参战——每一个军团中的实际在岗人员只有总数的一半。由于拿破仑在1812年进攻俄国，俄国便与奥斯曼帝国达成和平协议，但是奥斯曼帝国为此放弃了黑海沿岸的一块非常有价值的土地。这块土地位于多瑙河三角洲上游地区的北岸，被称为南比萨拉比亚（Bessarabia，在土耳其语中也就是“*Bucak*”，意为“角落”)。这个地区非常重要，因为来自中欧地区的贸易主要通过这里的港口到达黑海。尽管奥地利会优先使用的里雅斯特港口，但是对于这条多瑙河商路也颇感兴趣。土耳其被卷入了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它将如何应对呢？印度和中国也面临同样的问题，而这两个帝国都崩溃了。

塞利姆三世建立了一支新军，这支新军是在博斯普鲁斯海峡亚洲一侧的兵营中秘密筹建的。塞利姆三世模仿穆罕默德·阿里的举措，在那里训练士兵。但是，他面临的问题显然多于埃及的统治者阿里。18世纪，不管是巴尔干地区还是安纳托利亚地区的地方首领，都已获得了苏丹出售的税收权，然后这些首领就开始藐视中央权威。在私人军队的支持下，地方首领实际控制着领地，其中最大的莫过于台佩德兰的阿里帕夏，台佩德兰包括山地国家阿尔巴尼亚的南部以及希腊西北部的伊庇鲁斯地区。拜伦勋爵曾经拜访过这个地区，并被当地特有的异国情调所吸引——巨型的垫席、地毯、水烟、女孩以及娈童（奥斯曼帝国豢养娈童的行为引起了英国官员的耻笑，因为他们认为奥斯曼土耳其人占有男孩是因为他们对一夫多妻制感到烦恼）。阿里帕夏所

谓的女儿是大仲马《基督山伯爵》一书中的女主角海黛（Haydée）的原型。在巴尔干半岛东南部地区，还存在另外一块巨大的封地，这块地区以鲁米利亚著称，距君士坦丁堡不远。

塞利姆三世试图利用当地的耶尼切里军团控制这些封地领主，后来又用封地领主反过来制约耶尼切里军团，结果导致自己所有的努力都付诸东流。1807年，塞利姆三世遭到罢黜，由软弱无能的穆斯塔法四世（MustafaⅣ，1807—1808年在位）接替苏丹职位，塞利姆三世建立的新军队也被解散。后来，一位聪明的大维齐尔通过借助厌恶耶尼切里军团恶行的欧莱玛和其他阶层的支持，策划并推翻了穆斯塔法四世的统治。但是，耶尼切里军团暗杀了塞利姆三世，苏丹之位又被其同父异母的年轻弟弟马哈茂德二世（Mahmut II, 1808—1839年在位）接任。马哈茂德二世准备实施一项长期计划——若依此计划，奥斯曼帝国复兴指日可待。

耶尼切里军团不仅在君士坦丁堡，还在其他城镇——甚至在叙利亚——大肆为非作歹。随着改革的推进，军团战士对于自身的处境日益担心。马哈茂德二世采纳了一个好建议，对待耶尼切里的态度非常谨慎。通过一种平和的方式，奥斯曼帝国重新组建了一支新军。奥斯曼帝国举行了一场由当地显贵参加的全体会议，并达成了关于发展的协议（尽管大部分地方显贵由于担心在宴会上被暗杀而没有参加，使得这项决议的效力大打折扣，但是这项协议使他们误以为苏丹软弱无能）。奥斯曼帝国各项事务都在慢慢步入正轨，大批外国专家也前来帮助训练新军。这无疑是一个新土耳其的开始。

军队和现代化都是很好的主题。在大西洋世界，相关国家已基本实现了发展转型，军队成为工具而不是推动力。在大西洋世界之外，其他国家的发展进程主要取决于蒙昧的行政机构以及愚钝的地方统治者，而军队则提供了实现现代化的最佳途径。在俄国或者奥地利（甚至路易十五时期的法国），如果政府希望建立现代化的学校，也必须

依赖军队的支持。维也纳最好的学校是特蕾西娅士官学校，俄国最好的学校容克学院也是一所军校，而柏林的军事学校则培养了一大批著名作家，包括列夫·托尔斯泰以及海因里希·冯·克莱斯特（Heinrich von Kleist）。在陆军元帅赫尔穆特·冯·毛奇（Helmuth von Moltke）的指挥下，普鲁士于1870年获得了普法战争的胜利。此外，毛奇还创作了一部经典的文学作品。19世纪30年代，毛奇曾在奥斯曼帝国担任外国军事顾问，他从那里寄往普鲁士的信件成为经典之作。1794年，在法国革命军队获得了弗勒吕斯战役的胜利之后，低地国家也发生了类似的现象。当时，法军占领了著名的鲁汶大学。在布满粉尘的教室中，学生们都在以拉丁语严肃地讨论着问题，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都以礼貌或友好的方式进行交谈。法军将战马拴在规定区域，将校长流放到圭亚那，然后将那里变成一所医疗和机械学校。在奥斯曼帝国，军队将会以一种与众不同的方式塑造一个现代土耳其。

当然，在取得这些进展之前，奥斯曼帝国定会经历一系列灾难，而且这些灾难也最终降临。埃及已经获得了事实上的独立地位。在1815年拿破仑战争结束之后，巴尔干半岛爆发了独立运动。早在1804年，塞尔维亚就已经爆发了起义，一位名为“黑色乔治”的塞尔维亚人曾一度自立为塞尔维亚王子。在经历了近10年的战争之后，另一位塞尔维亚王子通过在表面上承认苏丹宗主权的方式，建立了略具雏形的现代塞尔维亚。在旁观者看来，这似乎表明基督徒摆脱了奥斯曼帝国的残暴统治，获得了自身的解放。然而，当局者却知道这个进程包含了更多的内容：当俄国与奥斯曼帝国爆发战争之时，“黑色乔治”得到了俄国的支持；但当与法国爆发战争时，俄国又将“黑色乔治”抛弃。当然，“黑色乔治”也成为奥斯曼帝国政府打击当地耶尼切里军团的一枚棋子。然而，几乎所有宣称是民族解放运动的起义都并不仅限于此，这可以通过后来最具传奇色彩的希腊独立运动体现出来。

自奥斯曼帝国统治伊始，希腊人就一直经营着一个国中之国，控制着巴尔干半岛和近东的广大地区。东正教牧首是奥斯曼帝国最大的

地主，因此围绕这个职位的竞争非常激烈（1453—1918年，仅有4位牧首是在任职期间寿终正寝的）。士麦那港口主要由希腊人和黎凡特人控制，成为地中海贸易网络中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且距离港口非常近的希俄斯岛也是一个重要的商业中心。这些地区的商人已真正地步入了国际化：他们是天主教徒，有时候拥有半意大利化或者半希腊化的姓名，比如卡尔沃科雷西或者马夫罗科达托，这些商人操持着一种混合着意大利语和希腊语的被称为“frangochiotike”的语言。18世纪晚期，他们开始在伦敦立足。

1770年，叶卡捷琳娜女皇试图在摩里亚半岛（Morea，这个称谓来自一个意为桑树的词汇），或者说在曾诞生了斯巴达的伯罗奔尼撒半岛举起东正教大旗。俄国军官在此地登陆，并不断制造麻烦，却没有取得什么进展。此时，法国和俄国开始介入东地中海地区，俄国甚至一度占领了希腊西海岸外的7个爱奥尼亚岛屿（这些岛屿中最大的是科孚岛），这促使局势迅速转变。这些岛屿曾经是威尼斯的领地，但是威尼斯在1797年被法国占领。在奥斯曼帝国历经磨难的18世纪，有这样一个成功的故事：希腊的商人和船队熟练地运载着来自中欧地区的货物穿过的里雅斯特，或者是运载着来自俄国的货物穿越敖德萨，然后再运往萨洛尼卡或者士麦那。这些商人与伦敦的共济会联系密切，而且一个效仿共济会的秘密组织也逐渐建立起来。在君士坦丁堡芬纳区的富裕希腊人中，不乏希腊独立运动的同情者。在俄国的默许下，一些希腊民族主义者在一位名为伊普西兰蒂（Ypsilanti）的王子的带领下，横渡普鲁特河，于1821年进入摩尔达维亚，希望发动一场起义：当时，希腊人控制着天主教会上层，甚至在罗马尼亚地区也是如此，而且他们在商人以及贵族阶层中也占有很大比重。那次起义失败了，因为比起希腊人，当地的罗马尼亚农民更倾向于支持奥斯曼土耳其人。但是，摩里亚半岛还爆发了另一场起义。一位教职人员领导了此次起义，并针对科林斯的穆斯林民众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屠杀，甚至连妇孺都不放过。在实现停火之后，这些起义者又试图通过英国组织的安全通道逃离这个地区。

时隔不久，有关此次暴行的消息就传到了君士坦丁堡，奥斯曼帝国迅速进行了残酷的报复。但是，奥斯曼帝国在处理此次事件中犯了严重的错误：第一个错误就是将牧首绞死，而这位牧首曾经强烈地谴责叛乱者的暴行。除牧首之外，一同被处死的还包括芬纳区的其他20位地位显赫的法纳尔人。奥斯曼帝国所犯的另一个严重错误是错杀了希俄斯岛上的居民，这些人完全忠于奥斯曼帝国。靠近希俄斯岛的萨摩斯岛，特产海盗和一种清洌的红酒。萨摩斯岛上的居民憎恨希俄斯岛的居民，在一个漆黑寂静的夜晚，来自萨摩斯岛的希腊人偷偷在希俄斯岛登陆，并将一些无辜的巡警投入海中。此次事件很快就传到了士麦那，当地的一位名叫卡洛斯曼努格鲁（Karaosmanoğlu）的地方长官下令进行报复。奥斯曼帝国在希俄斯岛实施了大屠杀，这可以被视为奥斯曼帝国所遭遇的第一次公关危机。德拉克鲁瓦（Delacroix）绘制了一幅作品，作品中充斥着遭到强奸的处女以及凶残的亚细亚士兵等。欧洲浪漫主义者被彻底激怒了。

这些浪漫主义者中最著名的当属乔治·戈登（George Gordon），也就是拜伦勋爵。当时，正值35岁的诗人拜伦才思枯竭，濒临破产。拜伦对自己的情妇特雷莎感到厌倦，并将这位女士送回到她在拉韦纳的上了年纪的丈夫身边。拜伦将会向世界证明自己并没有走向终结，这只是一个漫长征程的开始。当时，许多西方诗人都会前往古怪的地区，站立在防御工事之上，喝令人们禁止通行。拜伦前往科林斯港湾的迈索隆吉翁地区，并与一位名叫劳卡斯的男孩坠入爱河。为了得到一件骑驴时穿的金色外套，这位男孩吵闹不休。与此同时，这位男孩的亲戚“礼貌地”将拜伦的钱财席卷而去。随后，我们这位浪漫的诗人便转头向墙上撞去，于是拜伦成为希腊独立运动中的第一位烈士。在名为“莱拉”的诗歌中，拜伦已经将自己的追求道出：“在自我忏悔的乳房中/它的柔软可能取自其他地方/在忧伤的警觉中，那可能会带来压迫/灵魂是令人憎恶的，因为爱得太深。”他并没有添加他的另一行诗句，即“罕见的柴把热情地燃烧”。如果拜伦和德拉克鲁瓦都反对奥斯曼土耳其人，那么奥斯曼帝国将面临一场严峻的挑战。当时，年轻的

威廉·尤尔特·格拉德斯通（William Ewart Gladstone）已仔细拜读了拜伦的作品。

这些人认为希腊是个浪漫的国度，与在17世纪激励法国前行的古典罗马迥然不同。这是德国民族主义者对于法国统治地位的部分回应，而且也展示了古德意志词句极其复杂的结构：动词位于末尾，关系从句演变成为一个冗长的形容词短语，而在这个短语中分词位于名词之前。如今，在《明镜周刊》（*Der Spiegel*）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德国人已难以遵从这样的语法结构，况且当年康德在柏林接受的就是英语教育。北欧民众为希腊独立运动感到疯狂，而且在后拿破仑时代也存在大量退伍且没有工作的军人。希腊商人非常有钱，因而可以雇佣这些失业军人：卡尔沃科雷西以及马夫罗科达托就混迹于伦敦、巴黎以及圣彼得堡的共济会圈子。奥斯曼土耳其人所做的最糟糕的事情就是疏远他们，然而这些商人并不是奥斯曼帝国的敌人。由于其中一些人，比如来自俄国的沃龙佐夫斯（Vorontsovs）与英国的上层社会缔结了婚约，形势对奥斯曼帝国更加不利。成为一名反奥斯曼帝国斗士成为当时人们的口头禅。这句口头禅并非“谎话”（humbug，一个古老的英国词汇），而是涉及实际行动。在实施暴行方面，希腊人也毫不逊色。后来，穆斯林受害者被遗忘，而希腊人却善于进行公关。相比于希腊人，令人谈虎色变的土耳其人则不擅长公关。土耳其人一次又一次地被迫进行辩解，声称受害者数量被夸大，而且无论如何都是他们的错。尽管西方列强支持希腊的独立事业，但是它们知道奥斯曼帝国的终结会带来严重的问题，而且后来的事实也确实如此。可以说，这一点不容置疑。奥地利的梅特涅（Metternich）是一位直言不讳的保守分子，从来不做白日梦：他曾说过，希腊注定会迎来新生。

大部分希腊民族主义者的传奇故事都是虚构的。拜占庭帝国实际上是被意大利人摧毁的，而不是奥斯曼土耳其人。如果要评述奥斯曼土耳其人的作用的话，那么可以说是他们拯救了拜占庭帝国。在亚历山大之后，古希腊被凯尔特人摧毁。8世纪时，希腊又被斯拉夫人再次

摧毁。在拜占庭时期，希腊重新经历了希腊化过程，以至希腊人是希腊化民众还是拜占庭民众，在希腊民族主义者中尚难达成一致意见。希腊农民使用的语言是一种低俗形式的语言，这种语言仍保留在教堂用语中。此外，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大部分地区都充斥着瓦拉几亚人。瓦拉几亚人是与罗马尼亚人或者阿尔巴尼亚人相关联的游牧民族，他们占据了除雅典之外的其他地区。很快，希腊叛乱就演变成一场内战，各个武装集团之间展开了激烈的角逐。希腊叛乱分子只有在海上才能占据一定的优势，因为相比于奥斯曼土耳其人，他们是更优秀的水手。奥斯曼土耳其人在波涛汹涌的爱琴海上难以准确操控火炮：炮弹要么太高，射入空中；要么太低，落入大海。而在陆地上，胜负就很难说了。在可以行军的季节，奥斯曼土耳其人总会从北方进入希腊，从而迫使希腊境内不断争吵的各方达成暂时的妥协；而在冬季来临之际，奥斯曼土耳其人被迫撤军，希腊各方便再次陷入无休止的争吵之中。

1826年，状况突然发生转变。埃及的穆罕默德·阿里派遣他的儿子易卜拉欣帕夏率领一支由陆海军组成的部队登陆希腊，开始镇压希腊人的起义。浪漫主义者再次被激怒了。当时，俄国人又开始制造麻烦，试图在巴尔干半岛扩张势力。在高加索地区，俄国已经与恺加王朝展开了激烈角逐。英国和法国如何在东地中海地区维持适度的平衡呢？英法两国与俄国采取联合行动，三国舰队共同行驶到伯罗奔尼撒半岛外围，试图阻止埃及舰队对希腊的干预。1827年，有人在纳瓦里诺海湾开火，完全摧毁了易卜拉欣的舰队。1828年，在消除了其他国家联合干预的隐患之后，沙皇尼古拉斯一世（Nicholas I）又开始袭击奥斯曼帝国，而奥斯曼帝国几乎毫无招架之力。奥斯曼帝国的防线最终崩溃，被迫乞求和平，俄国因此控制了黑海东海岸地区。1832年，奥斯曼帝国被迫接受一个规模较小的希腊王国的独立，这个王国由一位年轻的德国人担任国王。这个新国家主要包括荒凉的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大部分地区、成为一片废墟的雅典（在雅典卫城还建有拜占庭教堂）以及一些岛屿。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这个新国家非常贫

困，以至它的居民如果有条件的话都会移居至更加富庶的安纳托利亚西部地区。

对于奥斯曼土耳其人来说，希腊的独立无疑是对帝国体制的巨大冲击。此外，奥斯曼帝国境内又出现了另一个独立王国。此时，穆罕默德·阿里已经建立起一个相对独立的国家，并与法国建立了密切的联系。通过利用埃及，法国希望扩展自身对近东的控制。穆罕默德·阿里试图占领叙利亚，毕竟在塞利姆一世征服埃及之前，埃及的统治者就曾将势力扩展至安纳托利亚地区。安纳托利亚高原东南部毗邻叙利亚的地区，曾是罗马帝国的西里西亚省：坎佩斯特里斯平原盛产棉花；特拉奇亚主要是山区或荒野，但拥有重要的战略价值。穆罕默德·阿里与马哈茂德二世讨价还价，在确认会得到法国的支持之后，于1831年派兵入侵该地区。马哈茂德二世的军队再次遭到败绩，埃及军队直接威胁到君士坦丁堡。埃及的举动给俄国出了一道难题，并始终难以得到恰当的解决。奥斯曼帝国本是俄国的宿敌，但是由于它现在可能被法国的盟友吞并，因此俄国需要保卫自己昔日的敌人。俄国军队再次在君士坦丁堡城外集结，但这一次不是进攻奥斯曼帝国，而是保护它。1833年，俄国与奥斯曼帝国签订了《温卡尔–伊斯凯莱西条约》（Treaty of Hünkâr Iskelesi），允许俄国军队采取相应行动。穆罕默德·阿里被迫撤军，但不久又卷土重来。1839年，埃及再次进军叙利亚地区，并获得了胜利。但是这一次，英国也对埃及军队进行了干涉，以阻止阿里的进军，因为英国也不希望法国控制君士坦丁堡和黎凡特地区。这种状况的发生是有一定原因的：马哈茂德二世试图扭转奥斯曼帝国的颓势，发起了一场改革，奥斯曼帝国逐渐处于英国的影响之下。

在希腊叛乱、俄国侵略以及埃及带来统治危机的这段时期，奥斯曼帝国苏丹一直在耐心等待。他需要时间来训练新军，甚至需要重新招募愿意改变其行事风格的耶尼切里军团新成员。君士坦丁堡的民众，尤其是那些行会成员，非常厌恶耶尼切里军团强行收取保护费的

行径，因此十分拥护苏丹的举措，而且那些未与耶尼切里军团勾结在一起的欧莱玛阶层（实际上是公务人员）也支持苏丹。其中，也存在宗教方面的原因：逊尼派教职人员不喜欢拜克塔什教团，因为这个教团并没有将教规放在眼中（而且经常挪用宗教收入）。更重要的是，耶尼切里军团自身的宗教活动即以拜克塔什教团为核心。与此同时，这些所谓的士兵继续保持其寄生传统，向政府索要国库券——有时甚至高达每年12万张——进而确保能够获得政府的资金。有时，他们甚至将这些国库券以打折的方式出售给一些亚美尼亚交易商。

1826年，马哈茂德二世开始着手处理耶尼切里军团问题。经过精心谋划，他首先挑起了事端。耶尼切里军团陷入他的陷阱，并发动了叛乱。然而，叛乱者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即放弃了君士坦丁堡以竞技场和托普卡帕宫为中心的关键区域，返回到现已成为伊斯坦布尔大学一部分的军营之中。在那里，他们又举行了打翻饭锅的传统仪式。耶尼切里军团的一位前军官当时转投到马哈茂德二世阵营，决定前往军营劝降，结果有去无还。后来，苏丹的军队带来了火炮，在将耶尼切里军营的前门炸得粉碎之后，继续轰炸军营。数千名耶尼切里军团士兵要么四处逃散，要么被屠杀。此后，苏丹的军队在整个城市巡视，抓捕漏网的耶尼切里军团士兵。一些耶尼切里军团士兵逃到各个省区，或者躲在君士坦丁堡北部通向黑海海岸的贝尔格莱德森林之中。拜克塔什教团被取缔（奇怪的是，这个教团又被本应更加激进的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恢复）。此次消灭耶尼切里军团的行动被称为吉庆事件，马哈茂德二世专门在一座洛可可风格的清真寺中举行了一场盛大的庆祝活动。这座清真寺位于博斯普鲁斯海峡之滨，靠近托普哈内兵工厂。这座清真寺名为努斯瑞蒂耶，意为“胜利”。事实也确实如此，一支新军也因此建立起来。尽管这支新军在关键时刻难以阻挡穆罕默德·阿里的进军，它却代表着奥斯曼帝国在军事方面的重大变革。此后，马哈茂德二世开始大量饮酒，并于1839年埃及军队在尼济普取得第二场重大胜利前去世，因而没有听到失利的消息。马哈茂德二世

的儿子阿卜杜勒·马吉德一世（Abdülmecitⅰ，1839—1861年在位）接替了苏丹之位。

阿卜杜勒·马吉德一世接受过严格的欧洲教育，由他接任苏丹符合1839年时的形势。得益于马哈茂德二世的改革举措，奥斯曼帝国的欧化进程正在进行。马哈茂德二世改变了奥斯曼帝国官员的着装，使帝国在文化风俗上成为欧洲体系的一部分：不允许再穿戴长袍和头巾。像奥斯曼帝国的新军一样，马哈茂德二世突然开始穿西裤，并披着量身定做的长外套。这种外套被称为“伊斯坦布尔绫”，脖子处设有纽扣。在19世纪20年代晚期，马哈茂德二世要求民众必须穿戴规定的服装。奥斯曼土耳其人不能再戴头巾，而是以一种新的费兹帽代替。这种帽子是一种非常方便的圆锥形帽子，来源于航海家，显然是一种基督徒帽。这种帽子的优势是穿戴者可以俯身礼拜，即使当礼拜者头部碰到地板时帽子也不会掉下来。这种帽子的顶部饰以一串流苏，据称这样一来天神就可以拽着戴帽者进入天堂。费兹帽的另一个优势是非穆斯林也可以戴，因而它可以作为臣民总体归属感的一个象征，这也是马哈茂德二世的核心观念。马哈茂德二世希望讨好欧洲，而这种举措则意味着非穆斯林也被平等地视为公民。这种前奏非常重要：1838年，在博斯普鲁斯海峡欧洲一侧的巴尔塔李曼，奥斯曼帝国与英国签订了一项协议，承诺与大英帝国开展自由贸易，奥英贸易随之繁荣起来。

这种状况的背后隐藏着一个重要的原因。此时，大英帝国正遵循亚当·斯密的学说，放弃了所有保护自身经济免受外国商品竞争的举措，认为贸易保护措施只能带来懒惰以及寄生行为。很快，英国就放弃了针对本国农民的贸易保护法《谷物法》，认为即使食品并非本国生产，劳动阶层也应该享受廉价的食物。奥斯曼帝国的经济体系（奥斯曼帝国的领土规模庞大，很难将其统称为一个经济体系）中仅包含本地的传统部门，主要以不发达的农业为主，自由贸易尚处于初级阶段，因此奥斯曼帝国在推行自由贸易政策初期便面临一场灾难：英国

机器纺织的布匹将会冲击奥斯曼帝国的纺织业，而且也确实造成了恶劣影响。苏丹的长外套就是由技术娴熟的裁缝使用这些布匹制作而成。或许正如后来土耳其民族主义评论家所指出的那样，奥斯曼土耳其人本应该抵制自由贸易。然而，当时的马哈茂德二世却没有其他的选择。

根据奥斯曼帝国与外国签订的条约，外国人享有诸多特权，这种特权甚至可以追溯到苏莱曼大帝时期，当时的法国商人已经开始享有部分特权。若再往前追溯，那么早在拜占庭帝国时期，外国人就已享有一些特权。威尼斯人在拜占庭帝国享有很多特权，比如免税的特权。因此，外国人在奥斯曼帝国境内享有特权便毫不奇怪了。奥斯曼帝国遵循伊斯兰教法，即所谓“安拉的法律”——它不仅体现在《古兰经》中，而且由欧莱玛予以适当阐释从而适应现代社会。伊斯兰教法主要涉及家庭和财产问题，与欧洲法律存在明显差异。伊斯兰教法中有一项规定明确禁止发放高利贷，即禁止收取贷款利息，这将会使银行破产。通过与奥斯曼帝国签订协议，欧洲列强可以拥有自己的法庭（英国甚至在伊斯坦布尔的加拉塔区建有一座监狱），设立独立的邮政部门。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米勒特制度的扩展，因为非穆斯林可以遵循各自的私法。但是，这项权利显然会被滥用，因为当奥斯曼帝国的臣民获得了外国公民权之后，便会受到在金角湾另一侧的大使的保护。无疑，奥斯曼帝国无法在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下发展自身经济，因此马哈茂德二世反其道而行之，希望能够借助自由贸易政策吸引英国资本，也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在签订《巴尔塔李曼条约》（Treaty of Balta Limanı）之后，奥斯曼帝国开始在英国得到好评。随着大量操着流利英语或法语的、既年轻礼貌又颇具异国情调的奥斯曼土耳其人的出现，奥斯曼帝国一度呈现出生机勃勃的景象。

1839年，奥斯曼帝国采取了进一步的西化举措。新苏丹阿卜杜勒·马吉德一世在托普卡帕宫花园的玫瑰阁中举行了一场由外交家参加的正式会议。令人敬畏的大维齐尔穆斯塔法·雷希特（Mustafa Reşit）帕

夏曾经担任过奥斯曼帝国驻英国的大使，他在玫瑰阁中宣读了一份冗长且涉及面极广的声明。这份声明主要使用烦琐的宗教辞令进行叙述，一些外交官没有想到这竟是奥斯曼帝国革命性变革的重要时刻。正如后来所证明的，这确实是奥斯曼帝国的重要转折时刻。这份声明宣称奥斯曼帝国饱受磨难，所有虔诚的穆斯林都应该意识到奥斯曼帝国正是由于没有执行神圣的宗教敕令而遭到惩罚，如今重新恢复古老智慧的时刻已经到来。后来，这一声明得到了重申，苏丹的所有臣民在法律面前都应该平等，这意味着基督徒和犹太人不再是二等公民。无疑，这是一系列改革举措的前奏。这些改革被统称为坦泽马特（*Tanzimat*），它是一个阿拉伯语单词的复数形式，意为“内部整顿”。奥斯曼帝国将会发行现代货币（尽管开局不利，但很快便步入正轨），还将建立中央集权政府，颁布适当的法律，同时打破陈规，将宗教限制在特定领域。奥斯曼帝国将会逐步实现外国人所称的“现代化”，而且部分现代化举措将意味着允许基督徒改善他们的处境，并建立自己的学校和教堂。埃及已经开启了现代化进程，突尼斯紧随其后。尽管如此，对于像奥斯曼帝国这样庞大和多样化的帝国来说，这无疑是巨大的进步。

阿卜杜勒·马吉德一世在其他方面采取的举措也值得称赞。当地人把身着双排扣长衫的马吉德一世印在巧克力盒上以表纪念。由于慷慨大方的举动，马吉德一世获得了西方社会的广泛赞誉。1848年，几乎整个欧洲大陆都爆发了革命，在英国饱受欢迎的自由派分子普遍失利。奥地利人和波兰人举行了反抗保守的奥地利和俄国的革命，但是失败了，便逃往奥斯曼帝国避难。奥地利希望将这些自由派分子引渡回国，但是遭到奥斯曼帝国苏丹的拒绝。因此，许多自由派分子继续在各个领域为奥斯曼帝国服务，一些人甚至成为在各个专业领域治理土耳其共和国的先驱（这些自由派分子从事的活动包括运营广播电台、讲授钢琴课程、组建共产党以及经营银行等各个方面）。

在这段时期内，克里米亚战争爆发，奥斯曼帝国首次被公认为先进国家俱乐部中的一员。克里米亚战争源起于1853年爆发的俄土战争，英法两国则在1854年加入奥斯曼帝国阵营（意大利随后加入）。最初，这场战争的主战场在巴尔干半岛南部地区，当俄国从那里撤军之后，战场随之转移到黑海地区的克里米亚半岛。此次战争爆发的原因非常离奇：从表面上看主要围绕耶路撒冷展开，涉及对于基督教圣地——由十字军建立的圣墓教堂，以及位于伯利恒的圣主诞教堂的保护权。在耶路撒冷，东正教会占据主导地位，并得到了俄国的支持。但是，法国人力图在此推进天主教事业，招致了众多东正教修道士的反抗（至今，他们还在这样做：在圣墓教堂仍需严格遵循时间表，不同基督徒要在特定时间内举行特定的活动）。尽管这些纷争有时候仅停留在字面上，却正中奥斯曼帝国下怀。这时，在法国涌现出一位不知疲倦且野心勃勃的新统治者，他就是拿破仑的侄子。他需要依靠教会来确保农民支持他，同时也意图洗刷拿破仑在1812年遭遇失败以及从莫斯科撤军的耻辱。因此，拿破仑三世便挑起了事端——要求苏丹赋予他保护圣地的权力，并专门派遣波德莱尔（Baudelaire）的不受其欢迎的继父向君士坦丁堡发出照会。沙皇对此非常愤怒，便向君士坦丁堡派遣了另一支代表团，也提出了一系列要求。

正是在这段时期，沙皇尼古拉斯一世说了一句至理名言。他与一位英国大使进行了交谈，称奥斯曼帝国已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欧洲病夫”。他暗示俄国可以与英国共同瓜分奥斯曼帝国，并将法国排除在外。但是，英国并不希望俄国舰队由黑海驶入东地中海，进而威胁英国与其殖民地印度的联系。当时，印度被称为英国“皇冠上的珍珠”，英国的大部分财富都来自此地。而克里米亚战争涉及的问题远远超出这些。1850年，俄国被视为庞大的专制政府，是一个邪恶的帝国，对内实行封建主义和专制统治，对外镇压自由派的英雄人物。这是一场意识形态之战。自从奥斯曼帝国与英国签订《巴尔塔李曼条约》并颁布花厅御诏之后，奥斯曼帝国便被视为进步势力。坦泽马特改革人士意识到现在是他们翻盘的时刻。如果他们激怒俄国，那么俄国就可能

犯错，也会促使奥斯曼帝国与俄国在多瑙河下游地区展开激战。随着新军投入战场，奥斯曼帝国展示出自身的强大实力。在法军的配合下，英国舰队驶入博斯普鲁斯海峡。1853年11月，俄国又犯了另一个致命错误：袭击了奥斯曼帝国在黑海海岸中间地带的锡诺普港口。一支土耳其补给船队被意外摧毁，而且锡诺普城的大部分地区也遭到焚毁，这座城镇原本是黑海海岸最古老而且风景最优美的地区之一。俄国的这次行动引起了英国的注意，英法两国在1854年3月共同对俄国宣战。

克里米亚战争是第一场现代化战争。首先，当时的人们已经可以通过发送电报在当天传递最新的战况信息，而且电报技术在1855年时已传播到克里米亚半岛。沙皇尼古拉斯一世虽然身处圣彼得堡，却能够从伦敦的《时代周刊》上获知战争的最新消息。新闻报纸开始广泛报道战况，民众的意志也开始影响战争进程。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弗洛伦斯·南丁格尔才能够击败野蛮落后的军医。这些军医在位于斯屈达尔的塞利米耶军营的战地医院工作，却没有给予伤员应有的尊重与护理。南丁格尔得到了民众的广泛支持，她成立的基金会得到了大量的捐款[然而，英国大使不喜欢她，并巧妙地进行了报复。这位大使设法使维多利亚女王给奥斯曼帝国苏丹写了一封倡议信，建议在这座城市建立自1453年以来的首座基督教堂，以纪念克里米亚战争中的死难者。这座教堂由G. E.斯特里特（G. E. Street）设计建造，成为维多利亚时代哥特式建筑的典型代表。斯特里特是斯特兰德大街上的法院的设计师，他的学生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也是一位著名的建筑设计师。修建这座令人满意的教堂的资金来自弗洛伦斯·南丁格尔的基金(注)]。现在，照片可以通过电报迅速传播，意味着公众可以直观地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在战争中，第一代现代步枪——米涅步枪也投入使用，它的射程是俄国任何武器都难以比拟的。最后，蒸汽船也在这场战争中被首次使用，这使得军队能够在一周左右的时间里由马赛驶往达达尼尔海峡。而在此之前，这段航程大约需要在风浪中颠簸一个月。当英法两国决定参战之后，它们能够使用这些新式工具，进而赢

得了战争的胜利。1855年，在经过残酷的战争之后，英法联军最终夺取了它们的目标——塞瓦斯托波尔海军基地。1856年，俄国的财政陷入崩溃，沙皇自杀身亡。尼古拉斯一世本已得了严重的伤寒，却依然在冰天雪地中漫步，无异于自杀。新沙皇急于实施改革，便在1856年签订了停战协议。随后，奥斯曼帝国与俄国维持了近20年的和平，而这正是奥斯曼帝国急需的。

奥斯曼帝国是如何利用此次机遇的呢？作为阿卜杜勒·马吉德一世的继承者，阿卜杜勒·阿齐兹一世（AbdülazizⅠ，1861—1876年在位）开启了“第二次坦泽马特”改革。此次改革首先宣布承认1839年改革所宣扬的法律平等原则，从此非穆斯林确实开始繁荣。穆斯林的出生率处于停滞状态，而非穆斯林的人口增速要显著快于穆斯林。此外非穆斯林的经济状况也得到了显著改观，特别是教育机会大幅增加。美国传教士设立了一批学校，这些学校一般是实践性、职业性的学校。19世纪60年代，奥斯曼帝国迅速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来保障财产所有权，推动银行业的发展，鼓励外国投资，而且这些资金大多流向铁路业。很快，君士坦丁堡的欧洲部分、萨洛尼卡和士麦那都融入了欧洲的网络体系，从那里延伸出来的铁路线深入内陆，推动了色雷斯和西安纳托利亚地区，甚至是安卡拉东部的卡帕多西亚等地的发展。1861年，主要由外国人组成的投资者联合成立了奥斯曼银行，在加拉塔区建有宫殿样式的总部，其所在街道也演变成著名的“银行街”。

可以说，奥斯曼帝国进行的改革并不是独一无二的。19世纪60年代是一段令人费解的时期，可以将其称为“历史的首次终结”。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美国著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在苏联解体之后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断，宣称历史已经终结：随着民主和自由市场展现出自身的魔力，世界将演变成一个规模庞大的丹麦。在许多年之内，俄罗斯（和中国）可能相信了这种论断，世界也在向那个方向发展。19世纪60年代，英国模式的巨大成功在世界范围内展现出来：一部宪法、选举、准据法[注]、一家国民银行、稳定的财政、基于金本位的稳定货

币。为了获得英国政府的授权，一位意大利总理甚至不惜屈尊。世界各地都开始相信教育的重要作用，因此学校甚至是大学大量涌现，而且通常都拥有宏伟的建筑。在俄国，亚历山大二世进行了类似的改革，但是奥斯曼帝国的改革也毫不逊色。第二次坦泽马特改革就是在这一段时期内进行的。

第二次坦泽马特改革的典型标志是成立了两座宏伟的学校。美国人资助的罗伯特大学主要以英语教学，而且最终获得了一块俯瞰博斯普鲁斯海峡的靓丽风景区（如今这块地区被划给了海峡大学。除此地之外，海峡大学在其他地区也拥有大量建筑）。1868年，苏丹建立了自己的学校，即加拉塔萨雷中学。这座学校正好位于奥斯曼帝国欧洲领土的核心部分，（外国人拥有的）电车在格兰德·鲁·德·佩拉大街（今独立大街）来回穿梭，并从这座学校的赭色巨大铁门前穿过。这座学校的学生一半是穆斯林，另一半是非穆斯林，校长是法国人，教职员也大多是外国人。然而，10年之后，另一位校长却意图发动一场政变。尽管这位名叫阿里·叙阿韦（Ali Suavi）的校长是一位饱学之士，而且娶了一位英国妻子，却受到宗教的鼓动而采取了极端行动。这位校长的举动很典型，因为第二次坦泽马特改革孕育了一种将自己杀死的毒药——这与亚历山大二世的所作所为极其相似，他曾极不理智地鼓励了恐怖主义的发展。这种启蒙运动的问题是它可能以眼泪告终——正如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71年创作《恶魔》（*Demons*）时所准确预见的那样。知识分子可能转向恐怖活动：1881年，亚历山大二世被刺杀。早在5年前，阿卜杜勒·阿齐兹便离奇逝世，他曾遭到罢黜，很可能死于暗杀。

对于这些统治者来说，他们面临的严重问题显而易见：钱。奥斯曼帝国苏丹同埃及统治者的竞争，使得帝国的财政状况变得更加糟糕。在苏伊士运河开通之后，埃及统治者获得了大量收入，便在博斯普鲁斯周边大量投资，其中有些建筑还保存了下来。此外，奥斯曼家族及其扈从还大肆挥霍。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欧洲一侧，多尔玛巴赫

切宫拔地而起，建造这座宫殿花费了大量资金，宫中悬挂着维多利亚女王赠送的巨型枝形吊灯，还摆放着大量极其丑陋的人工制品（其中档次低下的绘画尤其令人扫兴）。随后，奥斯曼帝国又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亚洲一侧兴建了贝勒贝伊宫。幸亏由一位亚美尼亚建筑师进行精巧设计，这座宫殿布局合理，非常适宜居住[它的第一批客人中就包括法国的尤金妮亚（Engénìe）皇后]。后来，奥斯曼帝国又修建了塞拉宫，这座宫殿也还不错。除此之外，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者仍毫无节制。奥斯曼帝国的金融严重依赖加拉塔地区的亚美尼亚银行家以及外国贷款人，这些债权人借机取得了非常有利的条款。19世纪70年代早期，这段舒适悠闲的时期宣告终结。在这段时期内，阿卜杜拉·阿齐兹访问了西方，而他的侄子穆拉特则在巴黎名震一时。与此同时，一支非常优秀的奥斯曼帝国乐团在水晶宫为维多利亚女王举行了一场精彩的表演。然而，维也纳发生的金融危机很快便蔓延到德意志，奥斯曼帝国从此难以获得贷款。1875年，奥斯曼帝国宣布财政破产。此时的奥斯曼帝国已经步入穷途末路。

---

1. Hüdavendigar，源自波斯语，意为“万物之主”，在奥斯曼语中也可理解为“苏丹”。此外，也有专家称其为省会（Bursa）的别称。——译者注

2. 1991年之后，克里米亚纪念教堂（耶稣教堂）被一位颇具魄力的教职人员卡农·埃安·舍伍德（Canon Ian Sherwood）拯救，他拒绝了上司要求将教堂转为俗用的命令。通过从英国和美国募集资金，他重新修复了这座教堂，将地下室用作收容难民的场所，并针对这些难民的孩子组建了志愿学校。在通常情况下，这座教堂2/3的座位都会坐满，而每逢重大活动，教堂往往人满为患。

3. 准据法，指经冲突规范指定援用来具体确定民商事法律关系当事人权利与义务的特定的实体法。——编者注

第七章
帝国的终结



加拉塔大桥，君士坦丁堡，c.1880. Photo Corbis /奥地利档案馆。

在《库楚克开纳吉和约》签订100年之后，奥斯曼帝国面临着另一场巨大的灾难。在1875年财政破产之后，奥斯曼帝国与英法债权人的关系有所恶化。这些债权人竭力与奥斯曼帝国讨价还价，奥斯曼帝国虽然多次偿还了债务利息，却始终未能偿还（或分期支付）本金。此外，奥斯曼帝国还面临更严重的危机：为了应对债务危机，奥斯曼帝国提高了税收，结果导致了基督徒的反抗。此次骚乱波及奥斯曼帝国的克里特岛，岛上的希腊民族主义者希望与希腊合并。当时，尽管克里特岛上的穆斯林占到人口总数的近1/3，但是希腊民族主义者在1866

年发动了叛乱，并对穆斯林进行了大规模的屠杀。后来，黑塞哥维那的农民也在1875年举行了反抗奥斯曼帝国征收捐税的斗争——或者是反对奥斯曼帝国禁止偷运烟草的政策，要知道这项业务是当地民众的重要谋生手段。抗捐税斗争很快就越过边界蔓延至塞尔维亚，随后又扩散至保加利亚。在保加利亚，情况更加复杂。在中世纪，保加利亚人曾经建立了一个巴尔干帝国，领土一直延伸至希腊，甚至远达亚得里亚海海岸，但是这个帝国在奥斯曼土耳其人崛起前就解体了。奥斯曼帝国主要依靠希腊人维持当地的统治，并由希腊人掌管教会。美国传教士随后到来，采取举措，将保加利亚语进行标准化，甚至可以说重新发明了这种语言，并使民众接受了它。在此之前，保加利亚的上层社会主要使用希腊语。保加利亚语与斯拉夫教会用语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系呢？保加利亚民族主义是一个特殊的产物，但它是应运而生的。

但是，保加利亚地区需要接收来自早期俄土战争中的难民，而且鞑靼难民和切尔克斯难民遍布当地，并与当地的穆斯林民众——波马克人融合。这些人在当地已经生活了数个世纪，并且在总体上与他们的基督教邻居维持了良好关系。在第二次坦泽马特时期，一位干练的地方长官米德哈特（Midhat）帕夏，采取了有力措施建立起城镇服务体系，但是切尔克斯难民与保加利亚当地人之间的关系却非常紧张，就如同在东安纳托利亚地区的难民与亚美尼亚人的关系紧张一样。由于担心再次被迫到处流浪，切尔克斯人便对基督徒实施了大屠杀。信息传到了英国，称在保加利亚地区发生了“恐怖”事件。这简直就是希俄斯岛大屠杀事件的翻版。

正如爱尔兰问题所反映的那样，自由主义者虽然在本质上是分裂的，但在单一问题上却可以通过一位精明的领袖联合起来。爱尔兰自由主义者之间拥有一条坚强的纽带：他们都是不屈从于英国统治的清教徒异见分子。在东方人残酷对待基督徒的故事的影响下，这些自由主义者便能够团结在一起共同战斗，而且伟大的自由主义领袖威廉·尤

尔特·格拉德斯通也发表了反对奥斯曼帝国的长篇演说。格拉德斯通在英国全境做巡回演讲，他的演讲结语载入了历史：奥斯曼土耳其人，不管是警察还是地方长官，都应该从在他们统治下变得荒凉且亵渎了基督教的省区彻底滚出去。但是，格拉德斯通的演讲也有诸多令人费解之处，由于他曾在外出任职期间担任过爱奥尼亚群岛的行政长官，因此他更加了解巴尔干半岛的实际状况。早在1815年，英国就占领了这座岛屿。格拉德斯通知道，问题并没有他说的这么简单。此外，在大屠杀问题上，保加利亚人并非是无辜的。这个事实已经得到英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的确认，因为他在这些地区拥有完善的情报网络。这位名叫奥斯汀·亨利·莱亚德（Austen Henry Layard）的大使甚至向时任英国外交大臣的索尔兹伯里（Salisbury）勋爵提出抗议，指责格拉德斯通在说谎。但是，这并没有带来任何变化。

通过搜集那些可能颇有思想的教职人员以及那些对这个地区的真实状况不甚了解的英国历史教授的作品，似乎可以发现他们对奥斯曼土耳其人抱有一种极具嘲讽的态度。在他们的印象中，奥斯曼土耳其人一直沉醉在温柔乡之中，吸食大麻，奸淫处女。正如A. J. P.泰勒（A. J. P. Taylor）指出的，这些民众在他们的地盘上曾经有好机会来就某个问题举行公开抗议。不久之前，牙买加的一位总督埃雷废除了当地法律，以便处决造反的黑人奴隶，遭到了那些反对奴隶制的人群的强烈抗议。但是，保加利亚惨案中的民众以及格拉德斯通，要么对此事保持沉默，要么支持埃雷总督。当时，格拉德斯通受到除托马斯·卡莱尔外的英国名士的一致谴责：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查尔斯·达尔文以及托马斯·赫胥黎。格拉德斯通本身是一位著名的绅士，但是他在用希腊语写下的日记中却记录了自慰带来的快感，即便在担任财政大臣期间，他只能使用一根短小的金鞭来满足自身的需求。那些愤愤不平的反对阵营能否在某种程度上意识到，在一二十年之内，如果他们不能发展一些新的事业，他们的教堂将会空无一人？不管怎样：土耳其人再次被迫转入守方，仅能像以前那样虚张声势，坚称一切都很正

常，说这些受害者的数字被夸大，而且无论如何这都是受害者应得到的惩罚。

1876年，俄国意识到有机会废除克里米亚战争的裁定。这一次，英国将不会进行干涉——即使是著名的保守派分子索尔兹伯里侯爵也抛弃了奥斯曼帝国，并试图与俄国结盟。当时，奥地利在近东地区的势力非常强大，因此自然会反对俄国独占巴尔干半岛的企图。但是，奥地利也能够被收买：俄国许诺，奥地利可以占有巴尔干半岛西部的大片地区，以及一条通往萨洛尼卡的利润丰厚的铁路。在此过程中，阿卜杜勒·阿齐兹被推翻，年轻的穆拉特五世（Murat V，1876年在位）继承了苏丹之位，并宣布实行民主统治。米德哈特帕夏可谓土耳其近现代史上最聪明的一位决策者，强烈主张颁布一部适当的宪法。米德哈特帕夏专门在一次特殊的场合，即在波尔特举行的大国会议上宣布了此项决定，这确实是安抚西方反对势力的一记妙招。当奥斯曼帝国在一夜之间变成了一个拥有完善的宪法和议会的国家，各个列强又将如何干预奥斯曼帝国的内政呢？奥斯曼帝国也确实举行了选举，并成立了议会。当然，发生的事情远不止我们能用眼睛看到的这些。米德哈特帕夏需要顶住反对阵营的压力，有时候不得不使其支持者宣称“协商是必要的”这句话可以在《古兰经》中找到。这句话确实可以在《古兰经》中找到，但它所处的语境却是一位离异的丈夫可以与前妻协商孩子的哺乳问题。米德哈特可能是一位共和派分子，但举行选举首先意味着穆斯林占据多数，因而会得到宗教保守分子的支持：他们可以建立自己的伊斯兰国家，而不必遵从无神论的坦泽马特改革举措。但是，各个列强依然召回了各自的大使，以对付奥斯曼帝国通过操控改革进程来排除列强进一步干涉的举措，俄国军队甚至越过了多瑙河。

俄国企图突然发动钳形攻势，它的东路军主要进攻南高加索地区，夺取重要的卡尔斯要塞，以便维持俄国在安纳托利亚东部地区的存在。这个地区主要是古亚美尼亚王国的领地，俄国人已经在此地设

立了埃里温省区（大体上相当于今天的亚美尼亚），将其作为重要的基督教前哨阵地，并清除了大部分穆斯林原住民（主要是库尔德人和阿塞拜疆人，以及波斯化的突厥人）。在巴尔干半岛，俄国还拥有另外一个潜在的卫星国：保加利亚。1875年发生巴尔干半岛独立运动之后，西方列强试图迫使奥斯曼帝国承认保加利亚的半独立地位，在奥斯曼帝国拒绝之后，俄国便对奥斯曼帝国宣战。俄军开局良好，然后他们试图穿越巴尔干山脉，但必须经过普列文要塞。俄军进攻普列文要塞时正值1877—1878年的冬季，结果奥斯曼土耳其人展示了自身品质中的重要一面：遭到进攻时，他们会展现出超乎寻常的气魄。奥斯曼（Osman）帕夏率军顽强抵抗了俄军长达数月的进攻，成为当时的英雄，而这数月的时间已足以改变英国公众舆论的导向。至此，英国的明智人士认为最重要的问题是确保印度免受俄国的侵犯，而防御阵地的前沿便是君士坦丁堡。英国海军驶往位于特洛伊南部的柏斯卡海湾，那里的锚地相对安全，可以免受秋季风暴的侵袭。后来，英国的舰船——当时最为先进的铁甲舰——驶入了马尔马拉海。无论如何，奥斯曼帝国海军主要接受的是英国军官的培训，并由著名的霍巴特（Hobart）帕夏负责指挥。各国之间可能再次爆发大规模冲突，而且很可能以克里米亚半岛为战场。

正如人们所预料的，奥斯曼帕夏最后被迫投降，俄军也一度推进到被称为圣斯蒂法诺的地区。这块地区位于伊斯坦布尔西郊的耶西尔柯伊，是当今阿塔蒂尔克国际机场的所在地。双方宣布停战，随后签订了条约：在俄国的威逼下，一个独立的大保加利亚国宣告成立，俄国则获得了安纳托利亚东北部地区，包括拥有大量亚美尼亚人口的卡尔斯地区。这项条约遭到了由英国领头的其他列强的普遍反对。德国自愿进行调解，于1878年在柏林举行了一场国际会议（奥斯曼帝国几乎没有受到邀请）。最终，各方签订了《柏林条约》，同意成立一个领土相对较小的保加利亚公国，并由一位德国王子[巴腾堡的亚历山大（Alexander of Battenberg），是爱丁堡公爵的叔祖父]担任国王。这个王国虽然在名义上仍归属于苏丹，但实际上独立了。奥斯曼帝国的保

加利亚省，即东鲁米利亚地区，则由一位基督徒长官进行统治。1885年，在经历了一场血腥的政变之后，保加利亚省也被并入保加利亚公国。

重大的改变已经发生。至此，亚美尼亚人并没有制造麻烦。相反，亚美尼亚人一直密切配合奥斯曼帝国的举措，不单因为他们真正的敌人是希腊人和犹太人。当时，亚美尼亚大主教与俄国人进行会谈，试图参加柏林会议，但未能取得显著进展：俄国人并不关心亚美尼亚民族主义者的诉求，而是将他们视为潜在的激进主义者，并认为他们会加入西方阵营。俄国驻格鲁吉亚首府第比利斯的高加索总督关闭了当地亚美尼亚人的教堂，借口是教堂私藏武器弹药。但是西方列强公然宣称它们严重关切奥斯曼帝国的亚美尼亚问题，因而亚美尼亚问题被“国际化”了。

在此之前，奥斯曼帝国的一些问题已经被国际化了。作为奥斯曼帝国叙利亚省一部分的黎巴嫩，人口相对混杂，包括基督徒（马龙派信徒）以及不同派别的穆斯林，甚至包括异端派别德鲁兹派。当奥斯曼帝国在坦泽马特改革中宣称臣民平等之后，基督徒在法国的支持下马上行动起来，在学校以及商业领域争取平等地位，并在大马士革发动了叛乱。随后，法国军队在贝鲁特港口登陆，并逐步深入内陆。奥斯曼帝国的行政长官福阿德（Fuat）帕夏，通过血腥镇压恢复了当地秩序。1860年，黎巴嫩获得了特殊地位，由基督徒担任行政长官，实行权力分享体制，而法国有权对其实施监督。这可谓奥斯曼帝国国际化的第一步，而且这种体制在几代人的时间内似乎都运行良好。自此之后，黎巴嫩一直都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动荡，仅在1960年发生了小规模的骚乱（至少与20世纪70年代发生的大规模流血冲突相比是如此）。对于这种国际化进程，我们可能提出的问题是：如果各方不能将责任推卸给一些外部势力，它们之间能达成相互谅解吗？无论如何，保加利亚问题为亚美尼亚人开了先例，于是亚美尼亚人心中便埋下了民族主义的种子。到19世纪60年代，在宗教事务中占据主导地位

的神职人员变得不受重视，奥斯曼帝国的政策开始有利于商人以及大力推进学校发展的职业阶层。

19世纪80年代，不管是在当时最大的亚美尼亚人城镇第比利斯，还是在瑞士等西方国家，亚美尼亚革命团体都在迅速成长。这些亚美尼亚民族主义者在俄国学习了相关的革命理论和技巧，甚至取了俄国名字，其中一个名字来自最有名的革命期刊《警钟》（*Bell*，它在亚美尼亚语中是“Hintchak”）。在这些革命分子学习的技巧中，就包括恐怖手段。他们采取措施暗杀沙皇、激怒警察，这些警察不仅非常愚蠢，而且手段残忍。警察会拷打无辜者，这样一来无辜者的家庭反而会同情恐怖分子。作为布尔什维克唯一的盟友，亚美尼亚民族主义者在俄国议会谋得一席。大量年轻的亚美尼亚人在美国教会学校中学习，他们在亚美尼亚民族主义事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并幻想西方基督教世界会支持他们的解放事业。

与此同时，东安纳托利亚地区的紧张局势进一步扩展。高加索地区的切尔克斯人遭到俄国的驱逐（包括车臣人在内大概有150万人），在过分拥挤的船舶以及其他险恶的环境中，大约有1/3的人口罹难，而剩余的难民集中在安纳托利亚东部地区，与当地的亚美尼亚人争夺土地。库尔德游牧民族也遭到了同样的迫害，他们在冬季流亡到亚美尼亚村庄，希望在此谋得生计。当地官员收受贿赂之后，便会提供保护，或者减免税收。19世纪80年代晚期，奥斯曼帝国各地都发生了叛乱。

穆拉特五世谨慎地处理各种事务。1876年，在位仅数月的穆拉特五世就被以精神虚弱的名义罢黜（但他显然知道奥斯曼帝国所面临的各种困境）。穆拉特五世年轻有为的兄弟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接替了苏丹之位。米德哈特帕夏主持颁布了宪法，而可怜的穆拉特五世在位时就一直按照他的主张行事。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深谋远虑，首先与米德哈特帕夏合作以获取国内外的支持，特别是英国的支持，然后再

将米德哈特帕夏常年流放在外，并最终在沙特阿拉伯将其暗杀。事实上，哈米德二世并不相信自由主义和宪法，他认为这些举措只能导致奥斯曼帝国解体。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及其儿子亚历山大三世（Alexander III）也持有同样的想法，奥斯曼帝国与俄国的关系出人意料地出现了好转：这是因为两个帝国有许多共同之处。《柏林条约》签订之后，奥斯曼帝国日益演变成一个伊斯兰国家。实际上，保加利亚人建立了自己的基督教民族国家，而在希腊和塞尔维亚也发生了类似情况。随着种族清洗的发生以及清真寺被毁，这些地区的穆斯林四处逃亡。奥地利占领了波斯尼亚，英国占领了塞浦路斯，这导致了更多穆斯林难民的产生。1881年，在英国的支持下，希腊的领土边界扩展到奥斯曼帝国北部，奥斯曼帝国在巴尔干半岛的南部属地仅限于阿尔巴尼亚和马其顿地区。虽然在奥斯曼帝国境内仍有数百万基督徒和犹太人，但是他们现已沦为少数派，还不到奥斯曼帝国人口总数的1/5。

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希望建立一个由穆斯林，特别是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组成的国家。阿卜杜勒·哈米德的先辈曾经在欧式的多尔玛巴赫切宫向外宣传泛奥斯曼主义的理念。阿卜杜勒·哈米德退回到相对隔绝的耶尔德兹宫，从那里可以直接上山，而且更能凸显奥斯曼帝国的伊斯兰特性。此后，奥斯曼帝国进行了大量的美化宣传，宣称奥斯曼帝国一直在从事圣战事业。位于布尔萨地区的奥斯曼帝国早期苏丹的坟墓，在19世纪晚期被视为奥斯曼帝国历史上战无不胜的典型遗产。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还解散了议会，并通过发布命令来实施统治。很快，他就在国外臭名昭著。“*le saigneur*”（放血者），阿纳托尔·法朗士（Anatole France）的这句法语双关语，暗示着哈米德二世可能需要抛洒鲜血。格拉德斯通式的人物则直接用“该死的阿卜杜勒”来称呼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显然，奥斯曼帝国建立了规模更加庞大的警察网络。一位名为阿拉特·伊泽特（Arap Izzet）的帕夏在斋月期间异常忙碌，对于那些在耶尔德兹宫周围偷偷进食或者吸烟的人，他会实施严厉的惩罚。但是，哈米德二世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他不仅是技艺超

群的木匠，而且是一位歌剧翻译家。他精力充沛，自认为可以超越《古兰经》的限制，迎娶了7位妻子（1900年，时年58岁的哈米德二世娶了最后一位妻子，这个女孩只有17岁）。哈米德二世不相信坦泽马特改革机构，特别是米德哈特帕夏。

当然，苏丹将关注点集中在宗教问题上，有时甚至采取极度反启蒙主义的举措。普通民众并没有机会研习《古兰经》，一位非常勤奋的奥斯曼土耳其人试图将《古兰经》由传统的阿拉伯语翻译成土耳其语。但是，翻译活动遭到禁止，保险业也经历了类似遭遇。这些举动被视为亵渎安拉，为什么呢？安拉让你的房子烧掉，却没有规定人们可以寻求补偿。讨论宪法时，各方都用宗教语言进行争论。不管是真心实意还是故弄玄虚，内阁成员都用毫无意义的宗教语言进行探讨，而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显然认为得到强化的伊斯兰教有助于保持帝国的完整，将会把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联系起来。这不可思议地预测到了奥斯曼帝国的未来处境：一个伊斯兰—土耳其混合体一直被置于火炉之上，不过永远不会沸腾，这就如同自塞利姆三世以来，军队确实推动了社会发展一样。

另一方面，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大力发展教育，甚至建立了女子学校，并鼓励提拔在人口中居少数的基督徒：在政府高层中有大量亚美尼亚人，奥斯曼帝国的银行家则主要是希腊人。基督教学校发展态势良好，特别是罗伯特大学。法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建立了大量学校，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的学校也大量涌现。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还兴建了许多技术学校，比如机械学院、医学院，甚至是商学院（商学院位于靠近蓝色清真寺的竞技场，以便凸显其重要性）。此外，苏丹还鼓励伊斯兰教的现代化进程。当时，许多狂热的保守分子将西方及一切与西方相关的事务都视为邪恶。如果被告知西方的医疗和科学更加先进，这些保守分子便会声称这些都是阿拉伯人很久以前发明的，正是阿拉伯人带来了医疗和科技的进步。

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排除万难，积极推动这些改革措施。他主持修建了第一条由穆斯林建造的铁路，向穆斯林民众献上了一份厚礼。这条铁路一方面是用来将朝圣者运送至麦加，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加强对沙特和也门的控制，特别是那些经常劫掠朝圣者的贝都因人。哈米德二世甚至能够维持财政的稳定。尽管这位苏丹非常吝啬，但他也是代表帝国利益的企业家，比如正是他主持开发了伊拉克的沼泽地。在与外国债权人的合作上，他体现出更加鲜明的企业家特征。1881年，奥斯曼帝国与作为其外国债权人的希腊人达成了一项协议，这项协议类似于埃及与其外国债权人签订的协议。奥斯曼帝国债务管理局于1881年设立，很快便占据了一座豪华的建筑。这座建筑由莱万蒂尼·亚历山大·瓦劳里（Levantine Alexandre Vallaury）设计，拥有气派的三角形楣饰，毗邻波斯在扎罗尔奥卢设立的大使馆（这块地区现已成为伊斯坦布尔男子大学的一部分）。债务管理局拥有5 000名工作人员，专门负责征收专项税，以便支付债权人的相关费用，并使他们接受相对减少的高额利润。这座建筑物曾经占据着海角的特定区域，是提醒后人要谨记西方国家曾经控制奥斯曼帝国经济命脉的一座醒目标志。现在，这座建筑已湮没在高楼大厦之中。对于苏丹来说，奥斯曼帝国欧洲一侧也显现出类似的景象，因为如果他顺着山脉望向西北的佩拉区，首先便能看到德国大使馆，德国大使馆的屋顶曾拥有12座巨型的铜鹰（这座建筑以“鸟笼”著称，但是在1919年的一个夜晚，一些人设法将这些铜鹰从屋顶上拉了下来，从此再未有人见过）。再远处便是俄国使馆，这座使馆的奢华程度超过其他所有的使馆。

在实践中，奥斯曼帝国债务管理局采取了一些有益举措。尽管利息率仍高达7%，但已有所下降，而且吸引了大量的外国投资。债务管理局得到了奥斯曼帝国的信任，并提供了许多良好的建议。外国银行纷至沓来，为建造后维多利亚风格的宫殿提供资助，现在透过加拉塔大桥（旧加拉塔大桥是今日加拉塔大桥的前身，横跨金角湾，堪称当时的经典之作）就能够看到这些宫殿。在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时期，奥斯曼帝国的基础设施得到了明显改善，大量铁路和电车投入使用，

尽管总体而言，公路要显著好于铁路。萨洛尼卡、士麦那、君士坦丁堡以及阿达纳地区的基础设施较为完善，甚至一度非常发达。奥斯曼帝国一些省区的基础设施也获得了极大改善，比如在1892年铁路建成后，布尔萨及安卡拉政府随之修建了一批宏伟的建筑。这两个地区拥有出色的行政长官，以布尔萨为例，曾经翻译了莫里哀作品的当地行政长官艾哈迈德·韦菲克（Ahmet Vefik）贝伊，建立了一座图书馆和一座剧院，并铺建了宽阔的街道将宏伟的遗迹分隔开来，将那座城镇建设成为今日土耳其最为繁荣、秩序最为良好的城镇之一。阿比丁（Abidin）帕夏在旧安卡拉市也采取了类似的举措。

在坦泽马特时代早期，君士坦丁堡就已经进行了城镇规划，至少其欧洲部分已经实现了现代化（尽管目标纳税人群体最初反对这项计划，最终仍被迫接受适当的排污规划以及电气化改造举措）。部分改革举措违反了伊斯兰教规，但一场因木质建筑过分拥挤而引起的大火，为推行适当的现代化举措扫清了障碍。这些事件的发生，再加上奥斯曼土耳其人对于欧洲人蔑视他们现行举措的认知，促使奥斯曼帝国加快推进现代化进程。在一份保存至今的、19世纪60年代的典型奥斯曼帝国文件中，记录了当时的统治者发表的无可奈何的言论：我们拥有世界上最美丽和最宏伟的城市，外国人却认为它糟糕透顶。到现在为止，任何拥有思考能力的穆斯林都会就眼前看到的场景进行思考：用诗人齐亚（Ziya）帕夏的话说，基督徒拥有宫殿，而穆斯林却居住在贫民窟中。这可能有点夸张，却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当时的真实状况。当然，也有一些愚昧的激进主义者对此视而不见，他们要么宣称这是不真实的，要么认为这是安拉的意愿，或者是安拉对于穆斯林在信仰方面不够虔诚的惩罚。正是这群人，此前曾经两度试图关闭君士坦丁堡的第一所大学。但是，知识分子也知道伊斯兰教已经落后，因而他们急于引进西方的智慧，至少在机械和医疗行业是如此。当然，这些西化举措都处在伊斯兰教的许可范围之内。考虑到这种背景，可以说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做得相当不错。1900年，哈米德二世重建了这所大学帝国应用科学院，并极其谨慎地使它符合伊斯兰教的

要求，理由是基础科学来自伊斯兰教，但是应用科学受到穆斯林的忽视并主要由西方人发展起来。哈米德二世还通过其他方式将现代课程引入专门为宗教目的而设立的学校中——那里的狂热分子死记硬背《古兰经》等内容，但是他们却一个字都不理解。

需要指出的是，苏丹在推行改革的同时也在培养自己的敌人。如果聪明的年轻人（有时候还包括大量女性）学习了现代课程，并接受了在这些课程中传授的理念，那么他们对于一个有时候实行专制统治的伊斯兰政府（根据后世的标准，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只是偶尔实行专制统治，而且很少执行死刑）就不会继续保持忠诚。但是，在奥斯曼帝国境内出现了两个激烈地反抗哈米德二世统治的阶层。首先是医药师阶层。医学院是宣扬无神论的学校，自然科学方面的培训并不会激发医学生对于无法解释世界存在的神圣教条的激情。现在，许多奥斯曼土耳其人都学习了法语，并且阅读了哲学家埃内斯特·勒南（Ernest Renan）以及随后成为伊斯兰教著名评论家的赖因哈特·多齐（Reinhart Dozy）的作品，因而他们可以了解欧洲城市有多么富裕，它们的组织有多么完善。

第二个反对哈米德二世统治的阶层主要由接受了职业培训的军官组成。他们对于自身低下的工资非常不满，而且特别憎恶昏庸无能的军官领导——这是哈米德政府的一大缺陷：苏丹并不希望自己的下属聪明且充满野心。哈米德二世放任海军军舰在金角湾烂掉，因为海军在多尔玛巴赫切宫前的示威曾经将哈米德二世前的两位苏丹推翻。哈米德二世在帝国的各项开销上精简节约，部分原因在于他本人就非常吝啬，而主要原因在于由外国人组成的债务管理局控制着各项事务。这种状况导致的后果非常严重，奥斯曼帝国将军萨德丁（Sadettin）帕夏在1896年曾对此有过抱怨。当时，他受命率领军队平定凡湖骚乱，然后又去参加残酷的库尔德—亚美尼亚人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库尔德人占据了上风。当时，萨德丁的部队穿着破烂的制服，而军官们则

通过向蔑视他们的当地的亚美尼亚人出售多余的水稻配额，补贴他们少得可怜的薪金。

后来，不管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采取何种措施来改善安纳托利亚地区城镇的状况，他依然需要面对巴尔干问题。马其顿地区人口混杂，它是萨洛尼卡港口的重要腹地，只能通过军事统治才能维持和平。自柏林会议之后，尽管阿尔巴尼亚人依然是最忠诚于奥斯曼帝国的民族，却也开始萌生追求独立的想法。在克里特岛，和平只能艰难维持，而且需要欧洲的介入，而欧洲的介入已经部分揭示出这些国家涉足国际事务的重要事实：这些和平的维持者并不希望丢掉自身的性命，因此会竭力寻找与强者合作的理由，甚至不惜撒谎（后来，在塞浦路斯和波斯尼亚发生的事件验证了这一点，这些欧洲国家宣称波斯尼亚的萨拉热窝居民是在自相残杀）。希腊人从中受到启发，当另一场危机——1894—1896年的“亚美尼亚人大屠杀”使形势变得更加复杂之后，他们便采取了同样的举措。那次屠杀事件使得格拉德斯通可以再次抨击素质参差不齐的奥斯曼帝国警察和地方长官。

在奥斯曼帝国还存在彼此竞争的亚美尼亚革命团体，这些团体的领袖幻想亚美尼亚革命会带来西方列强的干涉，特别是英国。19世纪80年代后期，亚美尼亚地区爆发了严重的冲突。在埃尔祖鲁姆地区的一座美国医院对面，突然有人向正在做生意的穆斯林开枪射击，随后伴随着洗劫，商店也被迫关闭。据称，这些行动者的主要目的是鼓励亚美尼亚人的民族分离主义运动。此外，在一个被称为梓橔的山区要塞中也发生了暴动，据称亚美尼亚人在一座教堂中私藏了武器。而在凡湖西南部的沙逊也爆发了骚乱。1890年，这些运动扩展至君士坦丁堡，在马尔马拉海沿岸的库姆卡皮亚美尼亚人聚居区内，爆发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并逐渐失控。事实是，大部分亚美尼亚人（也包括与他们拥有密切关系的穆斯林）并不希望惹是生非。在君士坦丁堡地区生活着大量的亚美尼亚人，其中许多人从事着重要的工作，而且如果没有亚美尼亚人，奥斯曼土耳其人也无法享受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

在佩拉区原来的公墓上，建有一座博蒂尚剧院（如今，土耳其国家电视台的办公大楼就坐落于此）。当时，这座剧院是重要的娱乐设施，但很快就被独立大街上的其他剧院和电影院取代。

基督教堂，特别是亚美尼亚教堂，希望能够避免麻烦。1894年，一位名为阿什柯岩（Ashikyan）的牧首在一次弥撒中表达了这样的意愿：亚美尼亚人已经与奥斯曼土耳其人共同生活了1 000年，从一开始就是盟友关系，亚美尼亚人已经繁荣昌盛，绝大多数亚美尼亚人都生活在奥斯曼帝国境内，如果民族主义者大行其道，那么将会给我们的人民带来毁灭性的灾难。后来，一位年轻的民族主义者向他开了数枪。亚美尼亚民族独立分子接连不断地采取暗杀行动，最终在1912年暗杀了凡城的市长。这位市长是一位亚美尼亚人，曾一再告诫亚美尼亚的民族主义分子，声称他们所追求的事业将以眼泪告终。然而，流散在外的亚美尼亚人非常善于向西方国家展示自身从事的事业，而一个以清教徒为主的大西洋沿岸的西方国家则对亚美尼亚人的话深信不疑。接近100万的穆斯林难民被从克里米亚半岛、巴尔干半岛或者高加索地区驱赶出去，其中近1/3的人由于穷困和疾病而死亡，却无人理会。需要指出的是，正是这些难民与亚美尼亚人在安纳托利亚东部的冲突，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亚美尼亚问题的产生。

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将如何应对呢？1891年，他开始利用库尔德人。俄国人曾招募了著名的哥萨克骑兵（以及来自高加索北部的一个“野蛮分支”），以维持前线地区的秩序。在安纳托利亚东部以及波斯的西部群山地区，分布着大量的库尔德人部落。他们通常会处于一位拥有传奇色彩的部落酋长的领导之下，具有残暴和好客的双重性格。打着维护伊斯兰世界团结一致的旗号，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在君士坦丁堡开设了名为“部落学校”的机构，专门负责对库尔德部落酋长的儿子们进行文明教育。此外，哈米德苏丹还征召这些部落的骑手，并将其编入所谓的哈米迪耶军团。1894年，这些库尔德骑兵与亚美尼亚人在沙逊爆发了大规模冲突。当地的传教士举行了抗议活动，打出

了“亚美尼亚大屠杀”的标语。这些人士指责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实施了第一次“种族灭绝屠杀”，宣称亚美尼亚遇难者达到了30万。法国历史学家弗朗索瓦·若尔容（François Georgeon）与其英国同僚安德鲁·曼戈（Andrew Mango）认为屠杀中的亚美尼亚遇难者人数仅有3万。他们进一步指出，尽管在一些亚美尼亚人省区中确实发生了大屠杀，但是其他省区（比如穆什省）的地方长官却阻止了类似事情的发生。

正是在这个节点上，苏丹派遣萨德丁帕夏前往凡城稳定局势。萨德丁对库尔德人的部落酋长进行了告诫，并严禁迫害亚美尼亚人的事件发生：亚美尼亚人将会受到伊斯兰教的保护，而且考虑到电报的便捷性，有关他们遭受灾难的信息会在一小时之内传到欧洲。萨德丁还对亚美尼亚人进行了劝诫，声称若没有奥斯曼帝国，亚美尼亚人早已消失，就像安纳托利亚高原上的原住民吕底亚人或者弗里吉亚人一样，而且事实也确实如此。但是，萨德丁认同一位英国领事的说法，那就是每一个人都在撒谎。库尔德人否认偷窃了亚美尼亚人的绵羊，而亚美尼亚人则将他们被偷绵羊的数量夸大了5倍。然而，在奥斯曼帝国境内确实发生了一些有案可循的屠杀事件，而且奥斯曼帝国自1894年以来遭受的国际压力（不是来自德国）与日俱增。但是，列强们难以达成一致意见来采取共同行动，奥斯曼帝国还在走老路。

1895年9月，君士坦丁堡的亚美尼亚人通过举行示威抗议奥斯曼帝国对于屠杀行为的纵容，结果导致警察介入。安纳托利亚东部地区的哈尔普特爆发了骚乱，这个地区拥有一座著名的美国大学（此次行动的参与者再次受到鼓动亚美尼亚民族主义的指控）。1896年8月，君士坦丁堡发生了一起震惊奥斯曼帝国的恐怖袭击事件：亚美尼亚达什奈克党的成员成功地混入了位于加拉塔的奥斯曼银行，杀害了许多人并劫持了一部分人质，还威胁要炸掉整座大楼。经历漫长的协商后，此次事件得到解决，这些恐怖分子最终乘坐法国大使的游艇逃离了奥斯曼帝国。事后，君士坦丁堡的穆斯林非常愤怒，掀起了迫害亚美尼亚人的浪潮，数百名乃至数千名亚美尼亚人遭到杀害。后来，亚美尼亚

人的独立运动陷入低潮。流亡海外的亚美尼亚民族主义分子将英国政府的行为视为背叛，并表示永远不会原谅。但是，索尔兹伯里勋爵指出，不管英国皇家海军采取什么行动，都难以驶过阿勒山。只有俄国人才能让亚美尼亚获得新生。然而，俄国人却不希望如此，因为他们的高加索总督将亚美尼亚人视为革命主义者。1915年，当亚美尼亚灾难最终发生时，俄国高加索地区的副总督宣称奥斯曼土耳其人帮助他们得到了他们想要的：一个没有亚美尼亚人的亚美尼亚。

英国无疑反对奥斯曼帝国的举动，而且索尔兹伯里也确实向奥斯曼帝国提出了抗议。英国还有另一个潜在的盟友，或者说卫星国——希腊。1947年，印度和巴勒斯坦问题已日益突出。由于英国财政已近枯竭，最后不得不将这些问题交给美国处理。即便在这种情况下，英国还是深深卷入希腊事务之中，甚至直接干预了希腊的内战，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相比于奥斯曼帝国，希腊人显然更善于玩弄英国，也显然要强于奥斯曼土耳其人：希腊语属于印欧语系，希腊本国拥有大量的海运收入，与共济会关系密切，与其他国家进行高层联姻并保持密切关系。希腊人还积极参与英国内政，尤其善于资助自由党。

克里特岛群山起伏，这样的地形使得奥斯曼帝国难以控制此地。此时，克里特岛也陷入动乱之中，希腊民族主义领袖埃莱夫塞里奥斯·韦尼泽洛斯（Eleftherios Venizelos）是一个拥有领袖魅力的人。克里特岛上也分布着穆斯林，其人口大概占到总人口的1/3。克里特岛民族主义者宣称他们的祖先曾经在强迫或者诱惑之下改信伊斯兰教，然而基督徒无疑更加超前，他们认为让穆斯林重新皈依基督教也算是一种仁慈之举。自由主义者认为“土耳其人”意味着懒惰、麻木好色、流行病以及压迫。格拉德斯通用一种脆弱和无法使人信服的口吻劝阻希腊人保持克制，然而克里特岛的希腊人却不断制造麻烦，并希望英国人能够解救他们。1897年，克里特岛上爆发了一场小规模的战争，奥斯曼土耳其人获胜。但是，克里特岛上的希腊人的期望并没有落空，因为英国迫使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放弃了利用此次胜利谋取利益的举动。

在10年之内，克里特岛实际上处于独立状态。希腊人进行了现代所谓的“种族清洗”，穆斯林被残暴地驱逐出去，同时还伴随着大规模的杀戮。在经历了两代人的时间之后，如果土耳其人在塞浦路斯问题上持强硬立场，那么也需要将穆斯林昔日的遭遇纳入讨论范围。

到1900年时，哈米德二世政府逐渐解体。哈米德二世统治时期曾被称为“专制时代”，但是在过去10年中人们开始重新审视这段历史。奥斯曼土耳其人受到外国人的羞辱，在国内激起了普遍的怨气，同时一个日趋重要的事件再次引起了民众的关注。马其顿地区涵盖了今日巴尔干半岛上的4个国家，每一个都心怀鬼胎：希腊人视自身为文明民族，是亚历山大大帝的后代；塞尔维亚意图占领萨洛尼卡港口，妄图成为一个欧洲强国；保加利亚宣称斯拉夫马其顿人实际上是保加利亚人，并一直争论马其顿语言的发源；还有阿尔巴尼亚人，他们的民族主义意识也逐渐萌发。该地区盗匪横行，驻扎在萨洛尼卡港口的一支奥斯曼帝国军队，主要负责控制当地事态的发展。1903年，列强们出于各自的考虑，达成在马其顿地区维持和平的协议。由奥地利和俄国牵头，这些国家建议在马其顿地区推行某种程度的国际化举措：派一支外国警察部队驻扎于此，主要由持中立立场的荷兰人负责。然而，马其顿地区的社会秩序没有得到恢复，外国军队的存在只是进一步鼓励了各种民族主主义者加速排斥奥斯曼土耳其人。奥斯曼帝国还担心在阿拉伯民族主义势力不断膨胀的情况下，作为伊斯兰世界主导民族的阿拉伯人也会寻求独立。1908年6月，作为国际事务转向的一个表现，沙皇尼古拉斯二世在波罗的海雷瓦尔（今爱沙尼亚共和国首都塔林）的皇家游艇上接见了爱德华七世（Edward VII）。在对德国势力不断扩张的恐惧下，俄国和英国最终达成了共同协议，进一步落实了索尔兹伯里的设想。这预示着奥斯曼帝国的分裂吗——俄国控制土耳其海峡，法国控制叙利亚，埃及和伊拉克的石油则划归英国?

驻扎在马其顿的第三军团的军官们义愤填膺，建立了秘密组织，很快就获得了其他势力的认同。同时，其他地区也出现了愤怒的言

论。最主要的是，哈米德二世在各地设立了各种各样的学校，并按照西方标准培养年轻人（甚至包括女青年）。哈米德二世想要向世界展示伊斯兰能够掌控好这些技术问题，包括法语以及基督教，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如今，土耳其政府在政治宗教问题上也存在着类似的思考，这一次主要是关于计算机。但是，青年接受技术培训也会带来一些问题，从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开设的学校中毕业的学生对奥斯曼帝国日益不满。且不论其他问题，这些学生只要向窗口外张望，就能够发现地位显赫的外国人和黎凡特人在奢华的宾馆、佩拉宫、托卡特里安，或者宏伟的大东方之珠酒店休憩。在大东方之珠酒店，外国大使、奥斯曼帝国债务管理局的主管以及当地的希腊贵族嬉戏其中。这些生活奢侈的达官显贵，都受到哈米德政府的警察及其线人的保护。即使是在这些学校中地位最为显赫的加拉塔萨雷公立中学，也难以让那里的学生高喊“苏丹万岁”的口号。

奥斯曼帝国体制确实拥有捍卫者，一些宗教激进主义者宣称奥斯曼帝国的行为并没有失误，无论如何这都是安拉的旨意。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显然要比这些保守分子更加明智，但是他已日益衰老和疲惫。奥斯曼帝国崩溃的一个标志是犹太复国主义者对巴勒斯坦产生了兴趣。西奥多·赫茨尔（Theodor Herzl）是一位生活在君士坦丁堡的匈牙利人，曾专门前去拜见苏丹。他曾天真地以为如果犹太人帮助奥斯曼帝国解决债务问题，他们就能获得移民巴勒斯坦的许可，却遭到苏丹礼貌性的拒绝。1905年，亚美尼亚人在耶尔德兹清真寺外安放了一枚炸弹，计划在苏丹离开清真寺时将其引爆。由于苏丹与大谢赫进行了短暂会谈而耽误了一些时间，按时爆炸的炸弹造成了大约70位平民遇难。在一张照片上，苏丹看起来年老而且疲惫，这张照片被亚美尼亚人专门挑选出来，用来佐证他们从事的事业所取得的成果。但是，苏丹其他尊贵照人的照片却被刻意回避。

1908年，所有的问题都突然迸发出来。先是在奥斯曼帝国境内爆发了反对苛捐杂税的全国性骚乱。当然，苛捐杂税也是那个时代的必

然产物。在埃尔祖鲁姆，亚美尼亚人和穆斯林共同反对当地腐败的行政长官。此次骚乱不断蔓延，奥斯曼帝国花费了大量精力才将其平定下去，在有些地区则只是用另一位不受欢迎的地方长官取代之前的长官。后来，在第三军团驻扎的巴尔干半岛南部地区，又发生了一次军事政变。几乎在一夜之间，哈米德二世政府迅速垮台。1908年7月，在君士坦丁堡的核心区域爆发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哈米德二世被迫恢复宪法。虽然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依然在位，但由于实行宪政，议会便接管了他此前拥有的大部分权力。从苏丹手中接管权力的人一般被称为“青年土耳其党人”，而欧洲则从所谓的土耳其革命中获得了些许安慰：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现在成为一位饱受憎恶的人物。

“青年土耳其党人”这个称谓只是为了好记，他们自身并不使用这个称呼。毕竟，这些人来自不同的阵营。早在50年前，曾经有一群宪政自由主义者自称为“青年奥斯曼党人”。大部分青年奥斯曼党人都流亡国外，他们的主要目标是反对坦泽马特政府的世俗化举措：为什么不回到伊斯兰政治的美好时代，那时基督徒的权益会受到尊重，但他们绝对没有现在所享有的诸多特权。一个穆斯林占主体的议会将会解决这些问题。而在此之前，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已经使得议会形同虚设。1889年，法国大革命一百周年之际，一位颇具威望的流亡者艾哈迈德·勒扎（Ahmet Rıza）联合了数十名支持者，在巴黎（从奥斯曼帝国通往巴黎的火车票非常便宜，而且巴黎拥有发达的交通体系）宣布成立新党，这个党最终被称为“统一与进步委员会”。同样地，意大利社会主义者也利用巴黎的便利条件成立了政党。大量亚美尼亚人加入了“统一与进步委员会”，甚至连哈米德二世的侄子、一位持异见的奥斯曼帝国王子萨巴赫丁（Sabaheddin）也加入了这个委员会。“统一与进步委员会”秉承奥斯曼主义的理念，这些人也意识到除了加强穆斯林与其他群体的合作之外别无他法，但是他们认为占多数的穆斯林理应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其中一些人已经开始萌生土耳其主义的思想。

直到此时，“Turk”一词仍仅被外国人使用，这个词来自中世纪的意大利人从阿拉伯人那里借用的“*Turchia*”一词，从那以后便流传下来。在奥斯曼帝国境内，流传着关于“粗野的土耳其人”的笑话，奥斯曼宫廷则使用了带有嘲讽且有一语双关含义的词汇“*Etrak-i bi-idrak*”，意思是“土耳其人是混蛋”。奥斯曼土耳其农民普遍使用旧土耳其语，尽管它的语法是奥斯曼语法，但是词汇主要是阿拉伯语或者波斯语。奥斯曼帝国上层人士则或多或少地改变了旧土耳其语的书写和词汇，将其作为长期排斥竞争对手的一种方式。19世纪晚期，奥斯曼土耳其语越来越趋向于仿古，比7世纪时更难阅读。到了19世纪中期，报纸杂志开始传播，数位著名人士曾指出，如果将旧土耳其语简化，阅读量将会上升，版面利用率也会提高。当时，得到民众广泛认可的记者纳米克·凯末尔（Namık Kemal）准备用简化的土耳其语书写作品，但是阅读量依然很低，而且奥斯曼帝国近90%的出版书籍都拥有宗教特性：知识分子都去读法语小说了（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不仅非常崇拜夏洛克·福尔摩斯，而且特别喜爱柯南·道尔）。

青年土耳其党人的中央机构中包括不同的派别：萨巴赫丁是一位自由主义者，主张与奥斯曼帝国保持亲善关系，得到了亚美尼亚人和希腊人的支持；艾哈迈德·勒扎坚持穆斯林的优越性，但要实行宪政；当然，还有一些彻底的世俗主义者，人数并不是太多，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将奥斯曼帝国的过去视为一种失败。阿卜杜拉·杰夫代特（Abdullah Cevdet）是一位拥有库尔德血统的医生，他也是一名社会主义者，在政界颇有威望，曾激烈地抨击《古兰经》的禁忌，甚至宣称阿拉伯语书面语极不适合转化成土耳其口语。关于教育方面的争论随后展开：为什么穆斯林学校要比基督教（或者犹太教）学校更落后呢？从新设立的外国语学校中毕业的学生更倾向于同意这种论点。这些学生主要来自圣本笃教堂、圣约翰教堂，甚至位于潘噶尔提军事学院附近的圣母玛利亚女子学校，他们鄙视穆斯林学校中仍在推行的背诵《古兰经》的学习方法。

然后便是奥斯曼帝国的军官。他们成立了一个秘密团体，特别是在巴尔干半岛，军官中的很多人都在这里出生。尽管穆斯塔法·凯末尔（Mustafa Kemal）在后来才逐渐出名并以“阿塔图尔克”著称于世，但是最初也是这个团体中的一员。由于父亲过早离世，凯末尔尚在孩童时便被母亲送往位于萨洛尼卡的宗教学校，但是他对此极为厌恶。即使是在小时候，凯末尔的意志也非常坚定，迫使母亲将他送往军校，并在军校中表现优异：他是一名出色的军人。在奥斯曼帝国军队中有一位名叫恩维尔（Enver，后来被称为恩维尔帕夏）的上校，他出生在君士坦丁堡的一个显赫的家庭。恩维尔富有远见，并拥有卓越的组织才能。他们与一位名叫穆罕默德·塔拉特（Mehmet Talât）的马其顿军官结成了秘密团体。凯末尔当时仅是邮政部门的军官，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出身低微：邮政部门非常重要，他们的首领需要由正直的人担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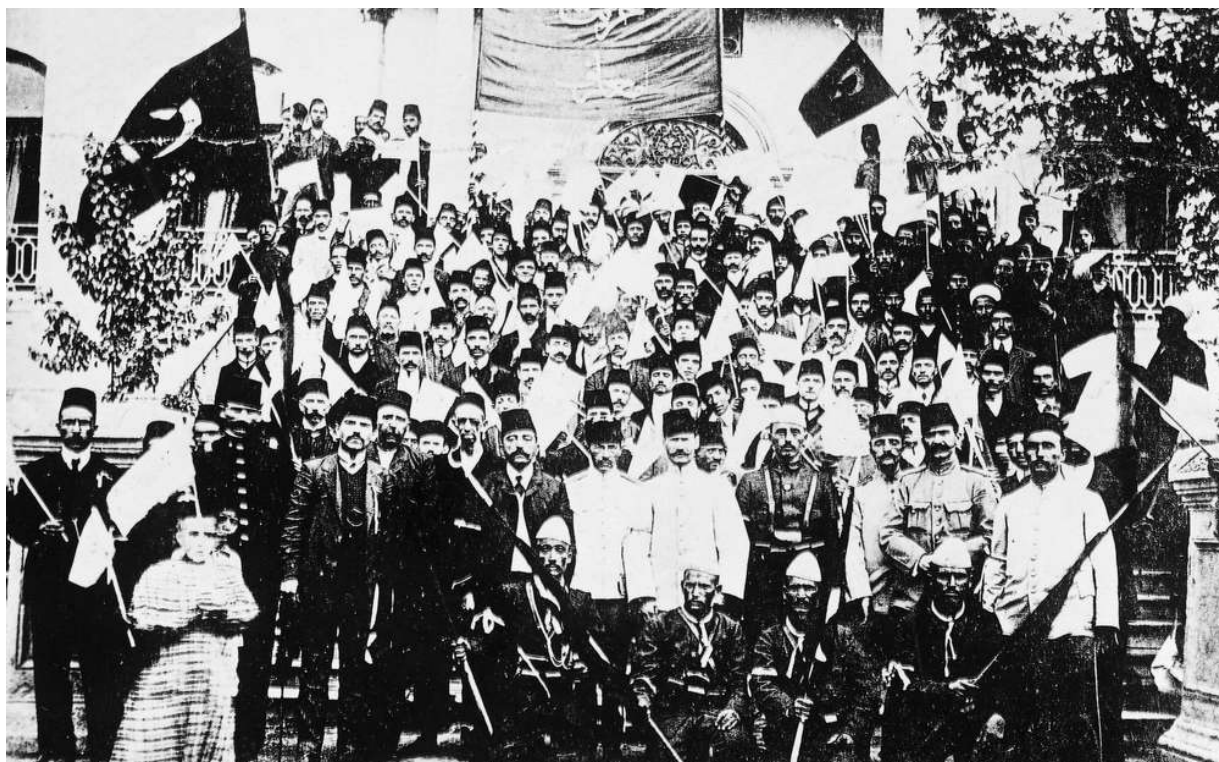
后来，当宗教势力开始憎恶另一股世俗主义势力时，便有传言称秘密社团的这些成员要么是犹太人，要么是犹太人的秘密支持者。这是因为在萨洛尼卡有很多改宗者，这些犹太改宗者追随犹太玄学家，并在三个世纪前皈依了萨巴泰·舍韦（Sabbatai Sevi）[注]。一些人士指出，这些犹太改宗者并非真正的穆斯林，而且他们显然主导了世俗主义运动：他们拥有基金会，甚至在萨洛尼卡建有名为“Işık”（意为“光亮”）的女子学校。至今，这所位于伊斯坦布尔的学校仍然得以存留，甚至还有一所同名的大学。金融专家贾维特（Cavit）贝伊无疑是一名青年土耳其党人，精力充沛的出版商艾哈迈德·亚尔曼（Ahmet Yalman）则是一位青年土耳其党人的同情者。随着时间的流逝，穆斯林聚居区内出现了抱怨，声称这些人虽然建立了共和国，但本应保留苏丹制作为整个伊斯兰世界的代表。尽管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土耳其共和国乃至奥斯曼帝国主要在巴尔干半岛上诞生，但是这些穆斯林的说法仍有很多疑点。

1908年夏天，青年土耳其党人的军事政变取得完全成功，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被迫退居耶尔德兹宫。但是，这些军官并没有政治经验，而且尽管议会很快便恢复运作，但仍然主要由宫廷负责任免官吏。一些江湖老手担任了大维齐尔，而且此时的奥斯曼帝国面临着各种危机。奥斯曼帝国首次出现了真正的罢工，并明显影响到铁路运营。但是，欧洲列强并没有给青年土耳其党人喘息的机会：奥地利直接吞并了波斯尼亚；保加利亚宣布独立，其统治者自称国王；俄国则显然纵容了这些事情的发生。奥斯曼帝国境内的不满情绪日益增长，宗教势力也做出了回应。一位被称为“瞎子阿里”的狂热分子受到了宫廷的鼓动，发动了叛乱。他率领自己的士兵，对议会发动了袭击（尽管叛乱只持续了大约两周，但由于土耳其历与俄历类似，此次事件在土耳其历史中仍被称为“3月31日事件”）。这次事件再次体现出耶尼切里军团与欧莱玛阶层的联合。但是，这一次青年土耳其党人能够调动一支真正的“新军”：这支军队从萨洛尼卡出发，迫使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退位。尽管哈米德二世的两位兄弟先后继承了苏丹之位，但此时的宫廷早已成为托普卡帕博物馆中的摆设。然而，处在1909年漩涡中的青年土耳其党人将如何使用他们的权力呢？

---

1. 萨巴泰·舍韦（1626—1676），是17世纪奥斯曼帝国一位低调的犹太玄学主义拉比，他宣称自己是弥赛亚，曾在犹太人世界掀起了狂热的崇拜。——译者注

第八章
崩溃



萨洛尼卡中央委员会，1912—1913年。Photoroger-Viollet,巴黎。

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于1909年退位之后，一些人立即举起了民族主义大旗。哈米德二世的退位，预示着现代土耳其的新生。当然，青年土耳其党人并未同意进行激烈的改革，而是试图在幕后操控大维齐尔，但他们内部却呈现出分裂状态。英国评论家曾将其称为“委员会”“统一党”以及“进步党”，但很少同时使用其中两个。在青年土耳其党中，不仅有不同层面的伊斯兰主义者，而且还存在自由主义者、土耳其民族主义者以及世俗主义者。这些世俗主义者一般都拥有医学背景，通常会像医生那样蔑视宗教和信仰宗教的人，将宗教视为愚昧无

知的象征。阿卜杜拉·杰夫代特就是一位库尔德世俗主义者，曾经直言不讳地宣称：“啊，脱掉那些丑陋的衣服，停止咆哮，终止反复发生的愚蠢行为，抛弃令人耻笑的所谓道德优越感，改变王子们所接受的愚昧教育，并革除将帝国所有问题都归结于欧洲的偏见。”另一位库尔德人齐亚·格卡尔普（Ziya Gökalp）提出了建立土耳其民族国家的想法。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需要参考欧洲哲人约翰·斯图尔特·穆勒以及埃米尔·涂尔干（Emile Durkheim）的观点：民族国家是发展进步的基石。穆勒将部落视为落后因素，认为像苏格兰高地人、巴斯克人甚至是库尔德人等都应该随历史发展而消逝。马克思也持同样的观点。

除非民族语言成为教育的重要载体，否则农民将难以摆脱文盲状态，而且安纳托利亚地区的乡村也可能与帝国渐行渐远，因为那里的农民说着含糊不清的波斯语或者阿拉伯语。实际上，奥斯曼帝国可以效仿一个模范：巴尔干民族主义，特别是希腊。在希腊地区，曾经存在过古希腊语和东正教希腊语，这两者都使当地农民与世界的发展脱节。希腊采取了大量措施将希腊语现代化，结果导致了许多奇特的发明——“*metafora esoterika*”一词指“外国公交旅行”，或者更精彩的是用“*efemeristika*”代指“新闻业”。但是，希腊赢得了独立战争，难道奥斯曼土耳其人不应该采取类似的举动来推动现代化进程，用一种更进步的语言来代替现在普通民众使用的语言吗？查阅一本古土耳其语字典如同探古取幽，它包含“*ifrahat*”这样的词汇，意为“一位父亲对于儿子所取得的成就感到骄傲”；或者“*adamsendecilik*”，意为“因被某些当权者无端地刁难，你需要帮助”，这些都是纯正的“无言”(注)词汇。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可能会利用这一点固守愚昧。如果奥斯曼土耳其想要实现现代化，就需要普及合适的语言。青年土耳其党开始强迫非土耳其人讲土耳其语，阿拉伯人对此颇有怨言。

1908年以后，新闻审查制度被取消，奥斯曼帝国境内呈现出舆论爆炸的态势，并引发了激烈辩论。在这场漩涡中，世俗主义者的致命缺陷很快便暴露出来。作为一个小团体，他们拥有不可动摇的优越

感，沉迷于自身的声音，难以理解底层民众的反抗。这令人回想起当时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所发生的事情：1906年，法国的教堂被关闭，修女们在刺刀的逼迫下离开了修道院。正如阿卜杜拉·杰夫代特所预测的，在20年内土耳其也将达到这种状态或者类似状态。但在此之前，奥斯曼帝国首先经历了近10年的梦魇。

青年土耳其党人掌权之后，他们的所作所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并不算糟糕。在继续推进哈米德二世开创的事业的同时，他们付出了更多的精力，组成人员也更加优秀。他们继续改善通信状况，完善城镇组织，进一步推动教育的发展。值得一提的是，女子学校也得到了适当的发展。青年土耳其党推动了足球的发展，现在足球已成为土耳其全民热爱的活动。1900年左右，英国曾经在摩达举行足球比赛，这座城市位于博斯普鲁斯海峡的亚洲一侧。青年土耳其党人希望效仿英国，但是欧莱玛不允许球员暴露腿部，因此当土耳其足球队成立时，成员们都穿得严严实实。这支足球队成立的地点位于卡德柯伊，距离摩达不远，并有英国游艇停靠。土耳其足球队穿着黑色袜子，英国队则穿着白色袜子。后来，这两支球队合并，球队名称是贝西克塔斯，而且球队的代表颜色至今仍为黑白色。加拉塔萨雷公立中学的男孩们紧随其后，成立了一支能够与贝西克塔斯队匹敌的球队。在青年土耳其党人的支持下，加拉塔萨雷足球队日益强大（直至今日，加拉塔萨雷队依然是伊斯坦布尔库尔德人最欢迎的球队）。这些事情共同促使奥斯曼土耳其人发掘了土耳其特质的可能含义，使土耳其人与中亚地区早已失散的“兄弟”联系起来。土耳其人民族意识的觉醒确实要感谢外国人，特别是亚美尼亚人万贝里以及其他匈牙利人，甚至包括一些在安纳托利亚地区避难的俄国鞑靼人。

无论如何，青年土耳其党发展了完善的组织，并扩展到整个安纳托利亚地区。这些地区组织代表着青年土耳其党，比如在安卡拉的地区组织建立了一座现代风格的总部，后来成为国民议会的所在地。在这种管辖区以及奥斯曼帝国的大部分地区，人们探讨了现代化的原

则，同时也探讨了任命和契约问题：委员会成员显然是重要的势力，但仍需创造一个“民族资产阶级”，以便与非穆斯林竞争，这便意味着须将建立公共契约的权力赐予他们。人们还探讨了语言改革问题，包括书面语改革。从这些层面来看，这是一段富有创造性的时期。

然而，在政治层面，青年土耳其党人却带来了破坏性的灾难，并进一步使民众感到困惑。1908年的议会主要由青年土耳其党的支持者组成，而且一度由庄重且智慧的艾哈迈德·勒扎担任发言人，在此期间议会担负起自身的使命，尽职尽责。但是，正如那些移植民主的国家和地区后来所展现的那样，不符合国情的制度会进一步造成本国国土的分裂，并使得国内状况更加糟糕，完全印证了俄国激进主义者过去所经常强调的隐患。到1907年时，于1905年革命中兴起的俄国杜马被完全解散，时任总理在门上贴了一则告示，要求议会代表们离开。1907年，奥地利通过普选的方式产生了一届议会，后来却导致现存民族矛盾的进一步恶化，最终只能通过诏令强行通过议会代表们激烈反对的预算案。年轻的阿道夫·希特勒洞悉了这个流程，并将其充分利用。

奥斯曼帝国议会在赛马场中的一栋建筑内举行了会议（这座建筑物后被焚毁，在靠近多尔玛巴赫切宫及其他皇家宫殿的芬德克勒地区，奥斯曼帝国又重建了一座新议院）。这个议会代表整个奥斯曼帝国，与会人员包括各派别的基督徒、库尔德人、阿拉伯人、阿尔巴尼亚人等。正如在奥地利议会一样，你可以使用任何语言，但奥斯曼帝国议会很快便处于那些愚蠢、自负、装腔作势以及满嘴空话之人的操控之下。青年土耳其党内部无疑是分裂的：自由主义者对于伊斯兰教怀有复杂的情感，在某种程度上对非穆斯林持宽容态度；日益崭露头角的民族主义者对这些事务越来越失去耐心；军官则开始将自己视为奥斯曼帝国的拯救者。

1912年，受到国外复杂形势的影响，青年土耳其党一度被赶下台。青年土耳其党在1912年4月“操控”了一次选举，但遭到了军官的反对。作为反对派的自由主义者在夏季组建了一个新党，并掌握了政权（在新政府中，一位希腊人担任了教育部长）。1913年1月，奥斯曼帝国又发生了一场政变，恩维尔贝伊使用武力迫使政府解散。在土耳其现代历史上，这算得上第一次军事政变。后来，土耳其共和国又发生了多次政变，其中以20世纪80年代的政变最引人关注。但是，从此次政变一直到“一战”末期，青年土耳其党一直掌握着政权，土耳其民族主义遂成为当时的核心导向。奥斯曼帝国境内的商业活动主要使用旧土耳其语，少数学校也在教授旧土耳其语。“一战”爆发后，一系列令人憎恶的条约被废除，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开始获得利润丰厚的合同。这是一个肮脏的交易，最终导致土耳其共和国在1942年开始征收征用税，并在1955年发生了反希腊人的骚乱。但是，这些背景对于了解当时的历史非常重要。

此次政治骚乱的最重要原因是土耳其人正被迫退回他们的核心区域，即安纳托利亚地区。与此同时，阿尔巴尼亚人和阿拉伯人则威胁脱离奥斯曼帝国。奥斯曼帝国最后的和平状态于1910年结束：“一战”的实际起止时间为1911—1923年，这两个时间都与奥斯曼土耳其有关。1910—1911年间，青年土耳其党人曾经维持了短暂的政治稳定状态，甚至参加了一次递补选举（可惜以一票之差落选）。但是，奥斯曼帝国随后便陷入战争之中。1911年夏季，法国在摩洛哥采取了进一步的兼并行动。德国派出了一艘炮舰作为回应，德皇则以伊斯兰世界的保护者自居。对此，英国公开支持法国，它与德国之间的竞争已成为公开的秘密。意大利见缝插针，试图占领奥斯曼帝国在北非地区的最后领地利比亚，并发动了入侵利比亚的战争。在陆地上，外国军队的行动受挫，只能占领狭长的沿海地带，而奥斯曼帝国则依靠部落势力的支持控制了内陆地区。但是，海上的情形则完全不同。意大利在海上无疑占据了绝对优势，并利用这种优势控制了大多数爱琴海南部岛屿，包括12座（实际上是13座）被称为佐泽卡尼斯群岛的岛屿，

而“佐泽卡尼斯”在希腊语中本就有“12”的意思。这些事件又刺激巴尔干半岛诸国采取了进一步的行动：如果奥斯曼帝国解体，那么每一个国家都可以从中分一杯羹。希腊、塞尔维亚以及保加利亚围绕瓜分包括阿尔巴尼亚在内的奥斯曼帝国的巴尔干半岛领土达成了赤裸裸的协议，而阿尔巴尼亚地区也看到了独立的时机，正在如火如荼地开展独立运动。

1912年10月，巴尔干半岛诸国对奥斯曼帝国发动进攻。奥斯曼帝国军队处于无助境地，被隔绝在安纳托利亚、阿尔巴尼亚以及色雷斯等地，而海峡间的联系也相对薄弱。奥斯曼帝国舰队难以与希腊舰队匹敌，萨洛尼卡在数周之内便被希腊攻占。与此同时，保加利亚人正向君士坦丁堡进军，塞尔维亚人占据了马其顿大部，门的内哥罗人则入侵了阿尔巴尼亚北部。列强们对这些巴尔干半岛国家发出警告，并坚决要求各国休战，但是停战协定遭到破坏，保加利亚人进一步占据了埃迪尔内。在巴尔干半岛各地都有奥斯曼帝国降兵，并出现了大规模的难民潮。奥斯曼帝国到处都是难民，仅在圣索菲亚大教堂附近就有大约3万名难民。这些令人惊恐的场景都被列夫·托洛茨基（Leon Trotsky）记录下来：妇女、儿童以及老人都被逐出村，所有的青年人都遭到杀戮，而穷凶极恶的牧师和教授们则在怂恿巴尔干半岛的民族主义者。这是青年土耳其党于1913年1月再次掌权时的背景。1913年5月，奥斯曼帝国被迫签订了屈辱的条约以换来短暂的和平。随后，巴尔干半岛诸国共同进攻保加利亚，第二次巴尔干半岛战争爆发并很快结束。奥斯曼帝国趁机进行干预并重新收复了埃迪尔内，进而保留了奥斯曼帝国在巴尔干半岛上的最后一块土地。现在，这块地区是土耳其的欧洲部分。但是，许多青年土耳其党人成长起来的萨洛尼卡地区，则划给了希腊。

尽管巴尔干半岛战争在1913年夏季就已结束，但是各国对于奥斯曼帝国，尤其是核心地带的威胁依然存在，其中一个显著的标志是奥斯曼帝国长久以来的忠实支持者阿尔巴尼亚于1913年12月宣布独立。

至今，在伊斯坦布尔依然存在两个被称为“Arnavutköy”（意为“阿尔巴尼亚村庄”）的地区，那里海盗横行，成为这段历史的唯一见证。但是，奥斯曼帝国此时还存在着更严重的威胁。库尔德人一直相当于奥斯曼帝国东部的阿尔巴尼亚人，虽然分为许多残暴的部落，但是一直极度忠诚于奥斯曼帝国。在民族大潮的影响下，一些在君士坦丁堡饱经世故的库尔德酋长，也开始萌生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的意识。俄国人对此颇感兴趣，当其开始重视对库尔德语（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多种库尔德语）的学习时，便已占得先机。阿拉伯人也发展出了各种民族主义，一般由他们中的基督徒领导。此前，这些基督徒一般都会寻求法国的支持，现在则开始积极寻求驻埃英军的帮助。此外，奥斯曼帝国还将在也门进行一场耗时长久的战争。

但是，奥斯曼帝国最大的威胁来自亚美尼亚人。尽管亚美尼亚人已不是主体民族，但在安纳托利亚东部地区的6个亚美尼亚人传统聚居区内，这一群体的人数依然庞大。奥斯曼帝国在巴尔干半岛和北非地区的崩溃，导致奥斯曼帝国总体呈现解体状态，因此亚美尼亚民族主义者也开始行动起来。最终，亚美尼亚人的民族主义运动得到了俄国的支持。俄国通过边境走私将武器偷运到亚美尼亚民族主义者手中，沙皇还提供了其他形式的支持。在高加索地区，沙皇政府对于亚美尼亚人极不信任，部分原因是巴库和其他地区的亚美尼亚人都善于经商，而且与穆斯林鞑靼人（后来被称为阿塞拜疆人）间的关系很复杂。自1878年以来，卡尔斯城作为一座俄国的省区城市得到重建，并以其宏伟壮观的城堡著称。卡尔斯城接近9/10的居民是亚美尼亚人，穆斯林则主要作为搬运工以及流动商人。此时，亚美尼亚民族主义者开始幻想将卡尔斯作为亚美尼亚复国后的首都。

俄国在亚美尼亚问题上的政策并不明朗。信仰东正教的亚美尼亚人确实可以成为有用的工具，但他们可能更亲近西方，特别是英国，而英国人此时正在附近的伊朗和伊拉克勘探石油。除此之外，这个地区还有大量库尔德人，一些库尔德人可能与俄国步调一致，但他们与

亚美尼亚人之间存在严重冲突。控制君士坦丁堡，在第二罗马再次悬挂双头鹰旗帜，一直以来都是俄国的梦想。可是如果希腊人在英国的支持下占领了君士坦丁堡，那该怎么办呢？出于这种担忧，精明的俄国人认为一个脆弱的奥斯曼帝国最符合他们的利益。于是俄国提出了一项计划，不是支持亚美尼亚独立，而是支持进行“改革”，将这6个省区交由基督教长官和外国警官治理，主权依然属于奥斯曼帝国。各国围绕这项提案展开了激烈讨论，虽然俄国并未在暗中指使，但由于外国警官主要从中立国挑选，因而这项计划没有受到其他大国的反对。1914年年初，奥斯曼帝国被迫接受了这项协议，但一直未予承认。作为议和的一种表现，奥斯曼帝国甚至为亚美尼亚地区的外国长官博戈·努巴尔（Boghos Nubar）在议会保留了一个席位，但是努巴尔以自己的土耳其语不达标为借口，拒绝了奥斯曼政府的邀请。

一位德国将军也卷入奥斯曼帝国的事务之中。1913年春季，青年土耳其党人邀请德国派遣一支军事代表团来协助奥斯曼帝国改革军队。双方主要围绕薪水等问题展开了激烈谈判，最后大约有70名德国军官于1913年12月到达了位于欧洲最东端的西尔凯吉车站。这些军官的首领是利曼·冯·桑德斯（Liman von Sanders）。桑德斯是一位改宗基督教的犹太人的后代，因而被呆板的普鲁士人认为最适合处理东方问题（他娶了一位英国女人）。一位德国将军在土耳其海峡指挥一支奥斯曼帝国军队？对于俄国人来说，这件事直接关乎自身的核心利益：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谷物出口国，俄国90%的谷物出口需要经过土耳其海峡。如果将俄国的战略利益考虑在内，这个问题则更加严重。这是德国和俄国之间首次出现争论，双方在次年3月才勉强达成和解。根据协议，利曼率领的代表团可以继续留在奥斯曼帝国。但是，利曼手下的一些军官表现得极度傲慢，导致德国大使和塔拉特（Talât）贝伊都郑重其事地致信柏林，要求将德国军事代表团召回。当时，塔拉特贝伊是青年土耳其党中举足轻重的民众领袖（后来，他担任了内务部长，并很快成为大维齐尔，与帕夏平级）。但是，德国在巨大的利益推动下继续行动：德意志银行正在为柏林—巴格达铁路的修建提供

资助。在柏林，到处弥漫着一种思想，即奥斯曼帝国可以成为“我们的埃及”。法国可能也对奥斯曼帝国进行了投资，但是德国以及奥匈帝国占据了奥斯曼帝国贸易额中的绝大部分，并挤压了英国的空间。

到这时，所有人都开始忽视奥斯曼土耳其人：问题是应该如何分割奥斯曼帝国，如何分配石油和其他资源？在这个问题上，巴尔干半岛诸国非常重要，因为它们在理论上属于奥斯曼帝国，并正在瓜分奥斯曼帝国在巴尔干半岛的遗产。此前，帝国主义国家曾经围绕瓜分中国展开激烈角逐，但那些行动主要由海军实施，并没有动用陆军，最主要的是没有涉及历史利益，而奥斯曼土耳其、中东以及巴尔干半岛地区则完全不同。只要俄国国力虚弱且发展滞后，正如克里米亚战争以及1877—1878年战争所展示的，列强们便能在奥斯曼帝国问题上至少维持平衡。然而，自1908年以来，俄国日益繁荣，如果其军备和战略铁路到1917年时按照计划发展起来并与法国结盟，它便会成为德国的重要竞争对手。

从利曼·冯·桑德斯危机开始，柏林的恐慌明显在蔓延，将军们直接拍打桌子：与其坐而待毙，孰若起而反击！德国总理特奥巴尔德·冯·贝特曼·霍尔韦格（Theobald von Bethmann Hollweg）将这些话转告给他的私人秘书，这位秘书便在日记中做了记录。但是，如何才能找到开战的借口呢？当奥匈帝国王储在波斯尼亚首都萨拉热窝被一位塞尔维亚激进分子[注]枪杀之后，德国找到了开战的机会。德国要求其盟友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宣战，但当俄国进行了战争动员以保护自身在巴尔干半岛的利益时，德国便对俄宣战。随后，法国也进行了战争动员并对德国宣战。在德国出于军事考虑入侵比利时之后，英国也对德国宣战。1914年8月4日，欧洲战争全面爆发。事到如今，奥斯曼帝国能做什么呢？

一些人主张实行隐忍政策，置身事外，或者是与英国结盟。现在的问题是奥斯曼帝国可能会被瓦解，进而成为大国维持和平的牺牲品

（当拿破仑和亚历山大一世在1807年于提尔西特达成协定之后，奥斯曼帝国也面临同样的处境）。由于一个意外事件，奥斯曼帝国卷入欧洲战争。两艘德国军舰在地中海地区逃脱了英国舰队的追捕，并驶往当时的中立地带土耳其海峡。1914年8月2日，奥斯曼帝国政府的实际掌舵者在没有通知其他部长的情况下，擅自决定与德国结盟：大维齐尔塔拉特宣称哈利姆（Halim）帕夏以及陆军总长恩维尔帕夏已经在德国大使位于从博斯普鲁斯通向黑海的塔拉比亚地区的夏季住所签订了同盟条约。根据协定，双方应该保守秘密。

现在，奥斯曼帝国发现可以用一个聪明的方式击败英国：这两艘德意志军舰“戈本”号和“布雷斯劳”号，都被移交给奥斯曼帝国海军，全体船员统一穿戴费兹帽，舰队司令员威廉·苏雄（Wilhelm Souchon）则为奥斯曼帝国海军效力。这是缔造一个拥有独立地位的奥斯曼帝国的重要捷径，同时可以消除西方列强施加在奥斯曼帝国身上的枷锁。恩维尔想到了一个发动战争的办法，他派遣德国军舰驶入黑海。这两艘军舰在黑海地区的实力最为强大，炮轰了俄国在黑海的港口敖德萨，并对其造成巨大的破坏。俄国一时不知所措，仅对此次事件进行了外交抗议，但一直未得到满意的答复。到11月初，奥斯曼帝国已经与英国、法国以及俄国处于战争状态。很快，意大利也加入协约国阵营。到1916年时，此次战争的前景已日益明朗，而这4个协约国已经围绕瓜分奥斯曼帝国进行了密切的磋商与安排。

从本性上来说，恩维尔是一位冒险家，他一直在为最后的“魔术般的胜利”努力。他依然非常年轻，而且一直在用奥斯曼帝国的命运进行赌博。首先，他发动了一场持续时间较短的战争，但这场战争几乎完全是在“虚幻”的状态下开展的，而且可以说是奥斯曼帝国所犯的最严重的错误；其次，恩维尔在签订和平协定问题上也犯了严重错误，奥斯曼帝国本可以收回萨洛尼卡。1922年，尽管恩维尔年仅40岁，但他的职业生涯已接近尾声。青年土耳其党人拥有一个显著的优势，这是此时所有奥斯曼土耳其人所共同渴求的：终结领事裁判权条约，取消

西方列强在经济方面的诸多特权。在德国的勉强同意下，这些条约确实都被废除，奥斯曼土耳其人最终在表面上赢得了独立管理国内经济的权利。这显然有利于逐渐崛起的民族资产阶级。作为此次事件的一个标志，奥斯曼帝国通过了一项法律，规定商业活动必须使用土耳其语进行。

恩维尔还试图用泛伊斯兰主义来赌博。青年土耳其党的宗教首领郑重其事地号召全世界的穆斯林发动圣战。这位宗教首领是共济会成员，而且圣战意味着支持一部分基督徒反对另一部分基督徒，因而这种呼吁并没有产生预期效果。无论如何，这种呼吁都堪称空洞，而且没有得到印度穆斯林的响应（阿富汗埃米尔在一些有魄力的德国人的呼吁下，庄严地予以回应，发布了一份象征性的诏令）。在俄国鞑靼人中，奥斯曼帝国的圣战呼吁也没有产生实际效果。更令人失望的是，不仅圣战呼吁在埃及未得到任何回应，奥斯曼帝国向苏伊士运河的进军也惨遭失败。恩维尔错误地认为俄国在高加索地区的统治会崩溃，并派遣第三军团前往卡尔斯以西覆盖着积雪的高原地区。前往东部地区的交通非常糟糕，由于巴格达铁路只能通到安卡拉，因此奥斯曼帝国军队想要到达巴格达地区只能步行近500英里。奥斯曼帝国的重要武器装备只能从德国进口，但德国本身的武器供应并不充足，而且奥斯曼帝国经由巴尔干半岛前往德国的通道也遭到封锁。仅在1914年12月爆发的萨勒卡默什战役中，奥斯曼帝国就有9万军人阵亡。

后来，奥斯曼帝国迎来了复兴的重要时刻——与奥斯曼帝国在1913年年初所获得的成就极为相似。由丘吉尔领导的英国政府机构错误地认为，如果英国海军夺取了达达尼尔海峡，那么奥斯曼帝国将会迅速崩溃。1915年5月，英国舰队在法国舰队的配合下，派遣了12艘装备着巨炮的战舰前往土耳其海峡。但是，奥斯曼帝国善于伪装的机动海岸炮兵部队重创了英法舰队，水雷也对英法舰队构成巨大威胁。英法舰队的三艘战舰被毁，另有三艘战舰遭到严重损坏，英法舰队被迫撤军。后来，英法联军又试图在加里波利海岸地区登陆，此次战役一

直持续到1916年2月。结果，英法军队再次被迫撤军。英法军队的进攻行动都是建立在奥斯曼帝国会立即崩溃的假设之上，而且这些战役也确实在君士坦丁堡造成了巨大恐慌。但这是另一种形式的战争虚幻。在普遍装备着现代武器的时代发动登陆作战是极其困难的，因为从登陆艇上下来的士兵，很容易遭到稳坐钓鱼台的海岸炮甚至装有瞄准设备的步枪的袭击。因此，登陆部队很容易陷入混乱。即使拥有最基本的补给品，比如纯净水，登陆部队的给养也难以持续供应。在这种情况下，纵使是害怕遭到猛烈袭击的奥斯曼帝国军队的普通士兵也不会感到恐惧。

英国方面，仅有两个人能真正理解这种状况：其中一个人是奥布里·赫伯特（Aubrey Herbert），他一直在奥斯曼帝国境内旅行，并精通土耳其语（赫伯特曾受到前往阿尔巴尼亚担任国王的邀请，但是断然拒绝）。另一位英国人是道蒂–怀利（Doughty-Wylie）上校，他曾经在阿达纳担任军事顾问，倾向于平息局势。在1909年的亚美尼亚危机中，怀利对奥斯曼帝国充满同情，曾经在相当于红十字会的红新月会工作，并得到过苏丹的嘉赏。1915年4月，怀利随同英国军队在土耳其海峡登陆，只带了一根手杖，因为他并不想杀害奥斯曼土耳其人（他自己却不幸中弹，并被授予了维多利亚纪念勋章）。除这二人之外，过分自信、浪漫主义以及严重的低效在英国国内蔓延。登陆作战失败了，英军在同年8月进一步登陆的企图也遭到遏制。此次战役共造成大约25万名协约国士兵死亡，奥斯曼帝国则有近40万士兵死亡。协约国军队败退到萨洛尼卡，打破了希腊的中立地位，建立了另一条战线。但是，这条战线直到1918年才开始发挥作用。1916年春季，奥斯曼帝国又在巴格达南部的库特·阿马拉取得了另一场重大胜利，一支英国军队被他们包围，并被迫投降。

1915年3—4月，英军的进攻对奥斯曼帝国造成了致命威胁，同时俄国也对东安纳托利亚地区发动了进攻。对此，君士坦丁堡政府采取了极端举措。现在，亚美尼亚的形势变得岌岌可危。俄国军队中共有4

个亚美尼亚旅，而亚美尼亚东正教牧首生活在俄属亚美尼亚境内，得到了沙皇的承认，他号召所有亚美尼亚人起来反抗奥斯曼帝国。亚美尼亚起义最终在凡湖地区爆发，当地的穆斯林遭到杀戮，位于俯视凡湖地区伟大岩石要塞脚下的穆斯林城镇遭到摧毁（至今，这个穆斯林城镇的遗迹依然可见）。

1915年4月末，在凡湖地区还发生了亚美尼亚人袭击奥斯曼帝国后方通信部队及破坏稀少的信号发射设备的事件。与此同时，协约国军队也在加里波利登陆。对此，塔拉特做出回应，集中逮捕了君士坦丁堡的亚美尼亚方面重要人物，并将他们交由内政部审讯，其中一些人被杀害。后来，奥斯曼帝国又发布了清空军事区亚美尼亚人的法令（也有一些地区未包括在内）。成群结队的亚美尼亚人被迫迁往其他安置地区，主要是叙利亚北部地区。库尔德部落或者阿拉伯部落对这些亚美尼亚人发动袭击，有时候也会与奥斯曼帝国地方政府串通一气。在亚美尼亚人被迫迁徙期间，根据外国领事以及传教士的观察，爆发了有据可考的大屠杀。这些目击者指出，这些大屠杀都是在奥斯曼帝国政府的命令下展开的。但是，这些指责从未得到直接的证实。现在，那些所谓的证据的真实性已遭到公开的否认。为了保护亚美尼亚人，奥斯曼帝国政府甚至审判了近1 500名帝国公民，并处决了50名嫌犯，包括一位省长。

外界通常将此次事件称为“大屠杀”，确实如此吗？正如历史学家伯纳德·刘易斯所说，这取决于人们对于大屠杀的定义。如果亚美尼亚大屠杀指的是1915年的一系列屠杀事件，那么大屠杀的受害者也应该包括穆斯林。当奥斯曼帝国军队被迫撤军后，巴尔干半岛以及高加索地区的数百万穆斯林也遭到驱赶和杀戮。君士坦丁堡、士麦那以及阿勒颇的亚美尼亚人没有被波及，其他地区却发生了大量的迫害事件。在安卡拉或者开塞利也存在大量的亚美尼亚人，但他们并未对其他人造成伤害。这些亚美尼亚人拥有大量财产，其中一些人拥有万贯家

财，他们也遭到放逐，与青年土耳其党密切相关的势力则趁机打劫，许多家庭因此一夜暴富。

1917年，奥斯曼帝国军队陷入极端困境之中。军队中出现了大批逃兵，随后各地便盗匪横行。奥斯曼帝国通货急剧膨胀，甚至地位显赫的贵族也被迫穿着带有大量补丁的衣服。在奥斯曼帝国境内，爆发了普遍的饥荒与疾病。在整个安纳托利亚东部地区，人口几乎绝迹。在俄军占领了包括埃尔祖鲁姆和特拉比松在内的大片地区之后，亚美尼亚人进一步对当地穆斯林民众展开了屠杀。奥斯曼帝国行将就木，幸被两次事件解救：第一件是协约国在萨洛尼卡地区的军事行动暂时停止，第二件是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1917年3月，沙皇被推翻，布尔什维克在11月掌权。俄国新政府为了推进面包、和平以及土地（主要针对农民）计划，不惜付出一切代价来达成和平协议。1917年12月，俄土两国实现停火。1918年3月，在布列斯特城的德国总部内，俄国与德国签订了苛刻的停战协定。

突然之间，恩维尔帕夏的政策似乎开始起效。俄军从南高加索地区撤军，恩维尔立即向这些地区派遣了军队，直达里海沿岸的巴库，甚至更北边。这些地区分布着大量阿塞拜疆人，他们倾向于支持奥斯曼土耳其人。同时，一个独立的亚美尼亚国实际上已经建立，只不过迫于当时的形势而与奥斯曼帝国达成临时协定。但这一切都是虚幻。在法国前线，德军发动了一系列大规模的战役，但到1918年7月时已完全失败。随后，协约国军队又发动了一系列成功的战役，迫使德国于1918年11月求和。在此之前，德土两国的盟友已经垮台，保加利亚早在1918年9月底就被迫投降。现在，奥斯曼帝国不仅失去了德国的支持，政府自身也分崩离析（青年土耳其党的主要成员乘坐一艘德国快艇登上了一艘军舰，逃往当时仍处于奥斯曼帝国控制下的敖德萨避难）。奥斯曼帝国的代表团与英国驻雅典的海军总司令谈判，并于10月30日在利姆诺斯岛上的穆德洛斯签订停战协定[协定的签订部分归功于在库特·阿马拉战役中被俘的英国将军的从中调停，查尔斯·维尔·汤

森（Charles Vere Townshend）爵士曾经被软禁在布于克阿达岛上的一座舒适的集中营中，这座岛是伊斯坦布尔外海处最大的岛屿，在希腊语中，这座岛被称为普林基波，意为“王子”，托洛茨基也曾被软禁于此]。随后，协约国军队占领了君士坦丁堡。

胜利者现在希望瓜分奥斯曼帝国：意大利占领西南部，英国占领伊拉克、巴勒斯坦和君士坦丁堡地区，法国占领叙利亚和东南部地区。协约国还找到了代理人，亚美尼亚人现在梦想着建立一个大亚美尼亚国，从黑海一直延伸到地中海地区，并宣称得到了美国的帮助。库尔德人也可能建立独立的国家。由于帝国主义者之间存在激烈的争吵，英国便决定利用希腊人。希腊总理韦尼泽洛斯（Venizelos）是一位民族主义者，受到英国人的尊重，而且得到了劳合·乔治（Lloyd George）的极大信任。1919年5月中旬，希腊人在协约国的支持下，占领了士麦那的部分地区。他们的军队散布在那个地区，驱逐奥斯曼土耳其人，有时行为异常残暴[希腊军队的指挥官安德鲁（Andrew）王子，即爱丁堡侯爵的父亲，称除了希腊人之外，从未见过任何人会如此灭绝人性]。

与此同时，穆罕默德六世（Mehmet VI，1918—1922年在位）继任苏丹，他的支持者主要是失败主义者。奥斯曼帝国为了重振雄风，已经尝试了所有的途径：推行坦泽马特世俗化改革、颁布宪法、在债务方面展开国际合作、复兴伊斯兰教、举行革命、与英国结盟、与德国结盟，但是这些举措都没有实际效果。对于未来，苏丹仅希望担任哈里发以及整个伊斯兰世界的领袖。这个伊斯兰世界当然包括英属印度，因为苏丹认为自己在印度仍具有巨大影响。换句话说，苏丹将会成为某种形式的阿迦汗（阿迦汗是一种文明化的伊斯兰教派的首领，而且非常富裕）。1920年，苏丹的代表签署了《色佛尔条约》（Treaty of Sèvres），这项条约肢解了奥斯曼帝国，将使奥斯曼帝国成为仅占有安纳托利亚中部地区的小国，而且这个小国甚至只能以安卡拉为首都。这是一项屈辱的条约，意在使奥斯曼土耳其人步入文明

之列。奥斯曼土耳其人需要进一步消除西化进程的障碍，而不是只会出售肮脏的明信片。阿里斯提迪斯·斯特吉尔蒂斯（Aristidis Stergiadis）担任了士麦那地区的行政长官，他是一位克里特人，比较理解穆斯林，是希腊占领的萨洛尼卡地区的首位希腊长官。实际上，他的治理方式非常温和，从而激怒了当地的希腊民族主义者。希腊甚至设立了一座东地中海大学，意在重新将当地的穆斯林希腊化。与此同时，亚美尼亚人占领了卡尔斯，并向特拉比松和埃尔祖鲁姆进军。亚美尼亚人过于狂妄自大，他们在停火之后的首要行动便是进攻格鲁吉亚，借口是黑海地区重要的港口巴统（Batum）本应属于他们。

这一系列事件激起了穆斯林的反应，我们可以将其称为“土耳其化”。但是，普通的当地民众，特别是安纳托利亚东部地区的民众，此时仍主要依据宗教寻找认同感。在此生死存亡之际，一位重要的领袖横空出世，他就是穆斯塔法·凯末尔。凯末尔后来才被世人所知，以阿塔图尔克，或是“土耳其之父”出名。凯末尔一直都是一位非常出色的将军，他指挥的加里波利和其他地区的战役都获得了胜利，从一开始就得到了苏丹的认可（当然，苏丹也可能对他怀有疑虑）。后来，凯末尔寻找借口离开了首都，并在1919年5月19日乘坐一艘克莱德制造的蒸汽船前往黑海沿岸的萨姆松地区。他乘坐着一辆德国人丢弃的指挥车（经常抛锚）行驶在布满尘土的道路上，并极力寻求各方的支持。亚美尼亚人致力于实现自身的事业，不惜发动大屠杀，迫使包括库尔德人在内的穆斯林联合起来，穆斯林之间的关系上升到前所未有的紧密程度。凯末尔具有非凡的气质，很快便成为他们的领袖。后来，凯末尔开始直接挑战苏丹政府。一些偶然的因素促使凯末尔将安卡拉设为大本营，一方面因为安卡拉位于铁路线上，另一方面因为安卡拉拥有一座电报局，这对于凯末尔居中操控局势至关重要。很快，穆斯塔法·凯末尔就在被占领的君士坦丁堡地区获得了广泛支持。1920年4月，大国民议会在青年土耳其党俱乐部中举行了会议。大国民议会并非橡皮图章，但要使其正常运转困难重重，而且需要做出大量的妥协。凯末尔暂时同意了一些保守派人士的建议（比如禁止饮酒，并由

宗教界对女性的服饰做出限定）。此时，奥斯曼帝国境内还有一支强大的军队，他们从高加索撤回到安纳托利亚地区。尽管位于奥斯曼帝国东南部的法军得到了一支亚美尼亚军团的策应，而且希腊军队也开始从西部地区进攻，但他们都遭到了土耳其军民越来越顽强的抵抗。

1920年，一个新因素的出现，改善了凯末尔的处境。在俄国，布尔什维克获得了内战的胜利，但是他们非常担心列强的联合干预，因而急需获得外部的支持。他们逐渐意识到，在反帝国主义的旗帜下，他们可以招募穆斯林。在与恩维尔多次接触之后，布尔什维克基本上能够断定穆斯塔法·凯末尔可以成为他们的盟友。安卡拉和莫斯科之间通信不断，后来双方互派代表团，并达成了联合协议。1920年，苏联的黄金和武器跨越黑海到达土耳其，首先在东部战线显现出威力：亚美尼亚人全线溃败。后来，土耳其民族主义者又加大了对于东南部前线的支持力度，法国很快便被迫妥协，并与土耳其就叙利亚边境问题签订了条约。到1921年时，土耳其已经拥有足够的实力来抵御希腊的进攻。当时，在英国的支持下，希腊人正在疯狂地进攻安卡拉地区。1921年8—9月，土耳其军队与希腊军队在萨卡里亚河谷展开激战并大获全胜，阻遏了希腊军队的进攻。土耳其的胜利迅速传遍了整个世界，特别是伊斯兰世界，而土耳其也收到了来自各个国家的祝贺电报。

后来，穆斯塔法·凯末尔又通过其他方式展现了自身的品质：他懂得适可而止。他不希望招致英国的干涉，在长达一年的时间内没有参与战争；相反，他在安卡拉确立了自己在国内的地位，而这一切都需要高超的手段。此时，安卡拉已经具备了成为首都的雏形，而法国大使馆则充当了“铁路餐车”。1922年8月，凯末尔率领军队进行反攻，这一次陷入崩溃的则是希腊。希腊军队全线溃败，甚至最高指挥官也被俘虏。1922年9月9日，土耳其军队进入了士麦那。撤退时，希腊军队在大部分地区纵火。在士麦那最重要的港湾中，大约停泊着30艘协约国军舰。士麦那地区共有大约30万名希腊人和其他基督徒，而当时的

土耳其将军是努雷丁（Nurettin）。努雷丁将军在这场战争中失去了自己的儿子，他不仅非常忧伤，甚至可以说对希腊人恨之入骨。然而，很可能是他颁布了禁止军队迫害当地希腊人的命令。士麦那发生了持续5天的大火，除穆斯林及犹太社区外全部被烧毁（犹太社区之所以免于灾祸，主要是因为大部分犹太人都支持土耳其民族主义者）。与此同时，成千上万的希腊难民聚集在海岸线的公路和港口处等待救援。由于受到当时外交章程的限制，这些难民难以被全部接纳。这次事件震惊了世界。无论如何，土耳其民族主义者都获得了胜利。穆斯塔法·凯末尔进入了这座城市，并发现在政府大楼前的台阶上铺着一面希腊国旗——民众希望凯末尔践踏这面旗帜。凯末尔并没有这样做，因为按照骑士精神的要求，凯末尔需要尊重一面士兵为之流血牺牲的旗帜。

此次战役胜利之后，凯末尔的军队便开始向君士坦丁堡进军，但受到英军的阻拦。劳合·乔治坚持认为不能让土耳其军队取胜，并给当地指挥官发了一份电报，要求他进行战斗。当时的英军指挥官是蒂姆·哈林顿（Tim Harington），他是一位悲天悯人的人，他认为，无论如何，英国军队都应该尊重土耳其人。正如后来所证明的，一些库特·阿马拉战争中的英国幸存者甚至在多年之后与当年看守他们的狱卒共度暑假。哈林顿将这份电报放在口袋中，假装没有收到。后来，他与土耳其代表举行了明智的谈判，同意土耳其军队进入今日土耳其共和国在欧洲的领土，在11月份又允许他们进入君士坦丁堡。由于担心自身的安全，苏丹偷偷溜到一艘英国军舰上，携带着5位妻子前往马耳他（在那里，他收到了一张支票）。1923年，土耳其与协约国签订了《洛桑条约》，基本确定了今日土耳其的边界。1939年，法国将安塔基亚还给了土耳其，土耳其领土又有所扩大。安塔基亚古称安提俄克，之前被划归法国在叙利亚的殖民地。1923—1924年，一切开始归于终结。那时，土耳其人和希腊人之间的仇恨与日俱增，两者已难共存。随后，土耳其和希腊进行了人口交换，大约有50万穆斯林——其中一些人还操着希腊语——离开了希腊前往土耳其；而土耳其则约有

100万希腊人前往希腊，这些希腊人主要来自安纳托利亚地区，其中一些人还操着土耳其语。尽管大约有25万希腊人可以继续与他们的牧首住在君士坦丁堡的旧芬纳区内，但是这个决定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两个国家有整整一代人饱受磨难。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一个独立的土耳其民族主义政府已经建立起来。1923年10月29日，穆斯塔法·凯末尔正式宣布成立土耳其共和国。

---

1. 无言，Sans paroles，暗指古土耳其语的晦涩。——译者注
2. 这个人就是加夫李若·普林西普（Cavrilo Princip，1894—1918），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于1914年6月28日在萨拉热窝刺杀了奥地利皇储斐迪南夫妇，遂成为“一战”爆发的导火索。在对他的评价问题上，各方存在严重分歧。前南斯拉夫共和国将其视为民族英雄，并为之修建了纪念设施，但是波黑在独立后又将这些印记清除。1995年，在签署《代顿协议》前，时任美国总统巴尔干问题特使的霍尔·布鲁克首次称普林西普为恐怖分子。——译者注

结语
土耳其共和国



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在检阅军队，1929年。Photo akg/Imagno/anonym。

奥斯曼帝国残存的最后一丝气息预示着此后一系列事件的到来。在土耳其民族主义之中，一直存在着浓厚的伊斯兰教因素，凯末尔刚开始时非常谨慎，尽力避免将其疏远。即使是在废除苏丹制这件事情上，他都付出了一番努力，并做出了妥协：苏丹的堂兄阿卜杜勒·马吉德二世（Abdülmecit Ⅱ），最初被允许作为所有穆斯林的哈里发居住在多尔玛巴赫切宫——无论如何，新生的共和国依然非常脆弱，这样做至少能保证手中有牌可打。但是，我们今天称之为阿塔图尔克的凯末尔，已经下定决心将伊斯兰教从公共生活中剥离出去，第一步便是废

除哈里发制。1924年，哈里发连同一百多名奥斯曼帝国王室成员，被驱逐出境。对于此事，土耳其国内外不乏反对之声。1926年，土耳其政府对一些残存的青年土耳其党人进行了政治审判，因为这些人坚决反对废除哈里发制以及降低伊斯兰教的地位；其他反对分子，即使是昔日的亲密盟友，亦遭到驱逐。与此同时，土耳其共和国境内还发生了库尔德人叛乱，政府花费了很大力气才将其镇压下去。至此，阿塔图尔克的威望如日中天，当时无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攻击他，而他则继续致力于建立一党制政府。

凯末尔本人已成为民众膜拜的对象，他在每一个村庄中的地位如同列宁，而他似乎无意加以制止。经常令外国人感到困惑的是，这种状况一直延续至今。但是，阿塔图尔克代表着一个现代化的土耳其，卓然不同于未开化的邻居，妇女享有与男性平等的权利，并以西化为矢志不移的目标。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土耳其共和国继续推行改革，其中最重要的方面与语言相关。1928年年末，旧奥斯曼阿拉伯–波斯字母的书写方式被废除，尽管它无疑具有诗意，却永远难以作为大众教育的工具，难以取得使用拉丁字母所能获得的成就。这次语言改革还废除了一些阿拉伯语或者波斯语词汇，尽管这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尚情有可原——没有“土耳其人”愿意理解这些词汇——但它此后却远超合理范围，导致了土耳其语的残缺，今天的学生需要用极度现代化的土耳其语翻译昔日的经典作品。即使是宪法都需要翻译成新版本，但新政府在1950年上台后又恢复了旧版的1924年宪法。

正是在这种情形下，旧大学被解散，土耳其政府聘请了1 000名外国学者，安排他们在新大学就职——对于这件事外界依然存在分歧。土耳其在医疗、教育和建筑领域遵循了西方模式，作为首都的安卡拉拔地而起，城中建有一些宏伟的包豪斯风格的建筑、宽敞的街道、一座剧院、一家电影院、一座国家图书馆，以及一所英语学校。尽管安卡拉后来几乎被乡村移民淹没，并被伊斯坦布尔市民视作行政化的无聊之地，但这座新首都依然运行良好，而且是年轻夫妇的理想居住

地。阿塔图尔克坚持男性应该穿戴礼帽，而不是费兹帽或者头巾；而且他也不喜欢男性蓄留胡须。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政府提倡的这些举措获得深度实施，在出版业还出现了小规模的迎合政府的浪潮。不管是阿富汗还是波斯，乃至后来纳赛尔（Nasser）主政的埃及，都在很大程度上效仿了凯末尔的改革举措。

当时的伊斯兰教被看成一种负担——文盲、愚昧、保守，而且为向圣人陵墓等地进献贡品而无休止地浪费金钱。这种奢侈行为以及鼓励它们的各种团体都遭到禁止，除了在历史上相对宽容和开放的麦乌拉维教团[Mevlevi，甚至20世纪40年代伟大的教育部长哈桑·阿里·于杰尔（Hasan Ali Yücel）也是麦乌拉维教团成员，他曾经在安卡拉大学附近坦道甘的一个咖啡厅中讲授西方文学的趣闻]。《古兰经》被翻译成土耳其语，而且唤礼词也改用土耳其语而不是阿拉伯语。在公共场合，阿塔图尔克非常谨慎，但是在私下里，他却过度饮酒，并声称让一位7世纪的贝都因人来规范人们私生活中最细微的方面是非常可笑的。宗教保守势力厌恶这些措施，却不能公开表达他们的不满。这些人的时代随后就会到来，而且他们是以受迫害者的口吻讲述着迫害者的语言，正如一些人所津津乐道的教皇庇护九世（Pius IX）——在19世纪中期的意大利，这位教皇曾被剥夺了对教育的垄断权。

在一件事情上，阿塔图尔克再次谨慎起来。犹太人、亚美尼亚人以及希腊人在土耳其经济关键领域中的重要性要远超他们的人数：仅希腊人就占据了土耳其股票市场中一半的份额。20世纪20年代，当世界各国竭力恢复至1914年时的贸易自由和汇率稳定的状态时，少数族群在土耳其依然占据重要地位。但在1929年世界大萧条之时，土耳其的对外贸易和投资均遭受重创，政府却无计可施。后来，共和国不得不设立市场委员会，并积极开办新的民族工业，在这方面，他们得到了苏联的帮助。1929年，托洛茨基被斯大林驱逐出境。当时，斯大林尚没有足够的权力像以后那样将他杀害。土耳其同意收留托洛茨基，于是他在比于卡达岛上生活了4年（居住在为阿卜杜勒·哈米德的弄臣

伊泽特帕夏修建的隐蔽住房中）。对此，土耳其得到的回报似乎是800万金卢布的优惠贷款以及数家纺织工厂，特别是在开塞利的一家。开塞利当地的精英是坚定的共和—民族主义者，这个地区——它几乎是土耳其的死亡中心地带——当时已经拥有航空和家具工业，却难以找到饮酒之处。在开塞利，古老的亚美尼亚教堂依然矗立，而且赫然残留着一所希腊学校，但是其陈旧部分已被环绕在宏伟的古代塞尔柱建筑周围的大规模混凝土结构毁坏。㊟1933年，苏联有关人员对土耳其进行了正式访问，最著名的事件莫过于在重建的伊兹密尔，土耳其命名了一座伏罗希洛夫广场来纪念曾经给予帮助的苏联将军。

在那个年代，如果你打开收音机，只能听到西方经典音乐；虽然童子军由教育部管辖，可是童子军和足球已非常普遍；土耳其歌剧演唱家塞米赫·贝尔克索伊（Semiha Berksoy）在欧洲享誉盛名，而且土耳其人在国际舞台上亦得到认可。阿塔图尔克于1938年去世，备享哀荣。随着时间的流逝，他的权威自然会受到挑战，正如发生在一位类似人物——戴高乐身上的遭遇一样。这两个人皆因下属的工作成果而功成名就，也曾迫害过有功劳的下属；在可能拥有更多选择的时候，这两人都杀伐决断，因而饱受后人诟病。但是，他们无疑都是伟人。

阿塔图尔克的继任者并非与他来自同样的阶级。首先，他们固守共和国准则，但警察由于蛮横卑鄙而遭到民众普遍的憎恶。在“二战”中，尽管土耳其在大部分时期都保持了中立，但是由于大多数青年人业已从军，所以国内经济因物资短缺和通货膨胀而遭受重创。在国内，民众对少数族群充满敌意，并在1942年试图让他们付出代价，以弥补国内出现的极端贫困状况。这种税——财产税或者*varlık vergisi*——在当时欧洲的许多国家都极为普遍，而在土耳其，它演变成一个歧视少数族群的简化版本。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结果，许多商业部门破产（当时甚至存在一个代表*Dönme*的D类型的税收，它由改宗伊斯兰教的犹太人应纳税收演变而来），而且出现了许多卑鄙的投机商。虽然这种税收早在1944年就被废除，却极大地损害了土耳其的声

誉。1943年，丘吉尔强烈要求土耳其加入反法西斯同盟，但是时任总统伊斯梅特·伊诺努（Ismet Inönü）却拒绝加入，导致土耳其遭受了更大的损失。伊诺努对此极其谨慎，担心如果土耳其加入反法西斯同盟，到时可能需要由苏联拯救，那么土耳其就面临着被苏联接管的风险。可以说，他的担忧不无道理。

那时，土耳其没有加入西方阵营，主要是因为斯大林在“二战”末期威胁土耳其，要求土耳其归还俄国在1918年割让的东部省份，恢复俄国在伊斯坦布尔附近海峡的驻军权。对此，美国派遣了舰队支援土耳其，并将土耳其纳入马歇尔计划之中。土耳其在1950年朝鲜战争中派遣了一支军队协助美国，并在1952年加入了北约，而美国的援助也在20世纪50年代纷至沓来：拖拉机和电力在乡村地区不断普及。土耳其与西方之间存在政治联盟。美国希望其盟友是民主国家，伊诺努被迫做出让步。1950年，伊诺努政府实行了民主选举，结果共和人民党遭遇惨败。一个新党——民主党崭露头角，在宗教方面进行了变革，虽然最初并不引人注目，却是即将到来的变革的前奏。民主党的变革举措得到了土耳其人和穆斯林商人的支持，并在1955年促发了土耳其现代史上最严重的错误事件，当时这种类型的阴暗利益最终导致了反对伊斯坦布尔希腊人的骚乱。像许多亚美尼亚人和犹太人一样，大多数希腊人都离开了土耳其，这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土耳其的贫困，并几乎摧毁了古老的欧洲中心地区贝伊奥卢和加拉塔，这些地区直到约10年前才得以恢复（现在，重建地区颇为壮观）。后来，民主党变得腐败而且专制。在他们的治理下，土耳其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并导致军官贫困。民主党人日益遭到受过教育的世俗群体的厌恶。1960年，民主党政府被一场军事政变推翻，尽管有教皇、艾森豪威尔总统以及英国女王求情，甚至希腊大牧首也为民主党政府总理阿德南·曼德列斯（Adnan Menderes）出庭做证，他依然被处以绞刑。结果，土耳其的国际声誉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难以恢复。

除此之外，这场军事政变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土耳其是一个贫穷的国家，还面临着严重的人口问题。20世纪30年代，土耳其共和国在医疗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婴儿不再因医疗服务缺乏而夭折。如今，土耳其每年的新增人口达到1 700万，相当于丹麦的人口总数，而且城市化水平稳步提升。伊斯坦布尔的人口从100万飙升至现在的1 500万，安卡拉的人口也从40万升至400万，而且这两座城市的郊区布满了绵延数英里的仓促建造的棚户区。在以库尔德人为主的东部地区，问题更加严峻：一夫多妻制在那里依然盛行，一个男人可能会有40个孩子，因此即使是一个普通家庭也具备组建一支足球队的规模。这些问题冲击了包括教育、电力以及污水处理在内的所有领域。军事政变的发起者曾幻想，如果他们拥有适当的民主体制，便可以解决这些问题，为此还出台了一部宪法。在比例代表制下，土耳其举行了新的选举，并开启了“五年计划”（现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但依然存在）。

这种仅仅依靠愿望推动西化的梦想很快便受到考验。土耳其共和国的选举体制本身即体现出国家的分裂，而且这种情况一直在持续。在土耳其存在一个由共和派世俗主义者居主导地位的左派，他们在军队中拥有广泛的基础，并得到阿拉维派的支持。阿拉维派属于伊斯兰教中的异端派别，以致很难将其信徒称为穆斯林。在土耳其政党中还存在一个右派，主要由地方商人组成，他们倾向于支持伊斯兰教。此外，在土耳其政党中还存在两个更小的团体：一个是伊斯兰团体，主要根据地在宗教虔诚的科尼亚地区；另一个是民族主义政党，这个政党有时候直接宣扬法西斯主义主张。20世纪60年代，土耳其的政治发展历程充满坎坷，而且情况随着知识渊博的年轻世俗主义者支持恐怖主义行动而进一步恶化。罗伯特大学现在是一所享有盛誉的高等学府，但是在20世纪60年代曾陷入政治风暴之中。当时罗伯特大学的学生将美国缔造者的画像全部扯掉，但最终被警察平息。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这所大学被搬到了其他地区，其原有建筑也被划给了海峡大学。

1971年，土耳其再次爆发了军事政变，相似的历史再次上演。20世纪70年代，土耳其的政治局势再次受到通胀、债务以及能源短缺的困扰，形势更加恶化。到了1979年，左派、右派以及伊斯兰主义者之间的争斗日益激化，每天都有大约20人在冲突中丧生，而且土耳其主要的高等学府都成为斗争的场所。1960年，土耳其的发展程度要明显好于韩国，而且主要出口产品是假发。20年后，韩国创造了世界奇迹，出口产品遍布世界，而土耳其还在出口西红柿。1980年，土耳其再次爆发了军事政变，相比于先前的两次政变，此次政变得到了更高的评价。土耳其将军们可能通过美国中央情报局学习了其他成功国家的做法，特别是智利的皮诺切特将军在1973年发动的军事政变。皮诺切特突然发起政变上台，推动市场自由化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智利经济的复苏。后来，皮诺切特又举行了选举，却在选举中落败。

土耳其将军们并没有走得那么远。尽管出现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但是此次军事政变的伤亡人数很少，而且仅有约1 500人被投入监狱。当大多数民众听到军事政变的消息之后，他们反而松了一口气。此次政变的将军们不要求显赫的政治地位，并未进行幕后操纵。他们对于自由市场也并不是特别热衷，仅仅希望经济能够好转。此外，土耳其的美国和欧洲盟友坚持认为土耳其应该恢复民主。将军们逮捕了年老的政治家（军队的逮捕行动非常人性化，凌晨三点，将军们让这些政治家最亲密的朋友去按门铃，担心这些年老的传统土耳其政治家看到军人站在门口之后，会突发心脏病），并解散了旧政党。

1982年，新的政党纷纷出现，其中较为引人注目的一个政党是祖国党。祖国党通过巧妙的操控，一举成为真正的反对党。祖国党的领袖是图尔古特·厄扎尔（Turgut Özal），他是土耳其共和国的第二位缔造者。他与美国的关系密切，曾在世界银行工作。当他所领导的祖国党在1983年和1987年的选举中胜出的时候，他的内阁中就包括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的成员。厄扎尔是一位经济自由主义者，而土耳其在中东地区的重要战略地位日益凸显，意味着土耳其可以寻求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以及世界贸易组织的帮助。此外，土耳其政府还实施了包括贸易和金融交易自由化在内的一系列改革，激发了经济发展的动力，进而创造了土耳其的经济奇迹。土耳其的经济是出口导向型的，并且包含了在其他地区也创造了奇迹的核心要素。这些核心要素包括货币贬值、取消货币管制、赋予银行更大自主权、劳动力自由流动、实施普遍的低税政策等。到2017年时，土耳其已经成为世界排名第20位的经济大国，这个进程可谓耗时长久。此前，如果一位土耳其人想要制造一张桌子，就必须雇用亚美尼亚木匠，因为只有他才懂得如何防止桌子腿摇晃。由伊斯坦布尔通向开塞利和安特普的宽阔公路上，重型卡车满载着货物驶往中欧地区。在英国，近1/4的电视是由土耳其生产的，土耳其医药公司的推销员也遍布世界各地。

厄扎尔由于不能控制饮食和吸烟，在1993年就去世了。但他重新缔造了土耳其共和国。新共和国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拆散了陈旧的国家机器。土耳其继续发展，但由私企主导。现在，土耳其的国内规范拥有一个特殊的来源。于1980年掌权的军人，特意与神职人员达成了契约，或者至少是某些公认的准则。伊斯兰教是马克思主义以及库尔德工人党中毛派库尔德分离主义者的解毒剂，它的影响力非常广泛。伊斯兰教重新进入学校，宗教课程也成为学生的必修课。专门培养神职人员的特殊学校的数量也不断增多，远远超出了最初的目标。在世俗主义者看来，这些机构对男孩，尤其针对女孩进行了洗脑，使他们接受陈旧过时的角色定位，而这都意味着倒退、肮脏以及愚昧。但是，新政府也存在一个问题，即具有世俗主义思想的政府官员腐败严重，而且效率低下。

相反，伊斯兰教政党作风清廉，而且具有较高的执行力。在1994—1998年担任伊斯坦布尔市长期间，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ğan）就已凸显出伊斯兰政党的优势，后来他担任了土耳其总理，最后又成为土耳其总统。此前，历届政府都难以解决纸币无限膨胀的问题（在2005年政府进行货币改革前夕，土耳其国内甚至出现

了一张5 000万里拉的纸币，其购买力却仅相当于20里拉）。这并非真正的通货膨胀，因为在某种程度上人们可以通过操纵一两个按钮，将里拉自由兑换成美元，而转换为美元之后的价格只会小幅上涨。这个兑换体系可以使政府受益，因为政府可以印刷纸币，然后再将其兑换成美元，这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弥补无法收齐的税收。一个人所拥有的百万土耳其纸币只能兑换成数十美元，两者之间的兑换比高得出奇，其中有1%—2%的利润流向了政府，成为某种形式上的政府专制利润。与此同时，任何有钱人都可以通过银行管理基金适时进行货币兑换，同时轻松赢得近25%的免税利润。那些遭受损失的人群主要是政府工作人员，他们需要支付大量个人所得税。当然，受害者还包括穷人。尽管犯罪率开始飙升，但是穷人依然展示出超乎寻常的忍耐力。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期，上层社会，特别是在伊斯坦布尔的富人阶层，拥有巨额财富。2008年，据报道，当一位土耳其女性从伦敦的购物中心返回土耳其时，一共携带了27个行李箱。

这就是2002年土耳其大选的背景，选举的结果是产生了一个由伊斯兰政党主导的政府。这个宗教政党与以前的宗教政党差异显著，宣称实行宗教宽容政策。至少在外国使馆区是如此，允许那里的人们饮酒，默许女性穿着暴露，而这种政策可以说与此前刻板的执政党所实行的政策相去甚远。美国以及欧洲非常赞同新政府在穆斯林民主方面采取的这项举措，这种评价对于土耳其政府也非常有利。作为对土耳其政府在民主方面迈出重要步伐的回应，欧洲可能允许土耳其加入欧盟。这可能开启了一个古老的话题，并可以追溯到后帖木儿时期。当时，奥斯曼王朝的法庭使用的是希腊语，一些土耳其贵族以学习雅典为潮流，并试图与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结盟。在那个时期，安纳托利亚东部地区发展超前，但现在则面临库尔德问题。如果将库尔德人排除在外，土耳其将是一个希腊化国家，或者是某种形式的晚期拜占庭国家，受到以欧盟形式呈现出来的后拉丁遗产的束缚。土耳其可能被接纳为欧盟国家，可实际上被接纳的可能是更伟大的伊斯坦布尔。如果保留库尔德人，土耳其所能采取的最好举措将是新哈米德主义：

宗教政治化。土耳其人不支持这项举措，至少库尔德人是如此。库尔德人不喜欢奥斯曼主义，数百万库尔德人更喜欢一个运转良好的西化土耳其。无论如何，这个地区正在开展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能源项目之一，即“南部和东部安纳托利亚项目”（South-eastern Anatolian Project，简称GAP）。这个项目已经建造了许多大型水坝，并将建造更多，从而为这块地区提供水电和灌溉之利。须知，自帖木儿时期以来，这块地区一直未能从其所遭受的巨大破坏中恢复过来。这个计划确实塑造了一大片绿地，但其是否能够成功我们还要拭目以待。

在经济领域，土耳其可以很容易就达到所谓的欧洲标准，政治方面也是如此。基督教民主党自1947年以来一直主导意大利政坛，新宗教政党——正义与发展党难道不是它的一种变形吗？正义与发展党也创造了经济奇迹，至少其所采取的举措是不同寻常的。在意大利，民众偷窃政府财产，但是国家依然富裕；在英国，政府偷窃民众的资产，而民众的富裕程度和自由程度已被意大利人赶超。无论如何，直到“欧洲”在各国所实施的细微政治迫害方面拥有了发言权，这种状况才能得到改观。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土耳其都更能引起欧洲的兴趣，并显著强于欧盟其他所有的新成员国。但是，在伊斯兰教不受欢迎以及各国经济增速放缓的时期，允许土耳其加入欧盟后可能出现的大规模土耳其和库尔德移民潮，都会促使欧盟拒绝接纳土耳其成为会员国。欧洲各国在土耳其塞浦路斯问题解决之前，就已允许希腊人掌控的塞浦路斯南部地区加入欧盟，因此希腊人会竭力阻止土耳其的入欧历程。可以说，土耳其若加入欧盟，将导致欧盟内部成员国间出现对立状况。这种矛盾在土耳其入欧问题上非常重要吗？在任何问题上，各国都会优先考虑贸易和投资，比起已经饱和的欧洲市场，土耳其显然拥有更多的投资机会。

2010年，土耳其的世俗老年派官员与半宗教性的少壮派官员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很多法官和将军由于各种借口而遭到逮捕。在土耳其东南部地区，库尔德分离主义者不断制造麻烦（但这并没有影响这

些省区之外的数百万库尔德人进行投票）。然而，这些问题或者是确实存在的其他同等问题，自坦泽马特时期以来，甚至更早之前，就一直出现在土耳其历史中。土耳其的发展一直伴随着这种挑战，但这不会导致无节制的屠杀。无论是在拿破仑占领时期，还是20世纪30年代的内战时期，西班牙国内都曾出现疯狂的屠杀行为，但是这种现象不会在土耳其上演。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土耳其出现了新的因素，即繁荣。土耳其已再次成为一个重要的国家，正如其所宣称的，它是在雅典与新加坡之间唯一一个能够通过难民来判断的国家。显然，这些难民都希望生活在土耳其。

尽管土耳其接收难民的举动获得了广泛赞誉，却带来了更多的问题。土耳其开始涉足中东事务，打破了自土尔其共和国建立以来一直奉行的不介入传统。2003年，土耳其曾拒绝美军借道其东部地区入侵伊拉克，而前总统德米雷尔（Demirel）堪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中立的协调者，得到了双方的信任。然而，美国前总统巴拉克·奥巴马曾于2009年前往开罗，要求阿拉伯世界推行民主改革。土耳其通常被标榜为民主改革的模板：在那里，政府推行依法治国，而且国家日益走向繁荣。2011年，“阿拉伯之春”开始，在突尼斯、埃及和叙利亚分别爆发了反对专制统治者的大规模游行示威。同年，正义与发展党在选举中取得佳绩，以接近50%的得票率胜出，并于2015年再次在选举中获胜。由于厄扎尔和德米雷尔的政党四分五裂，正义与发展党成功地获得了传统票仓——宗教选区的支持，还获得了民族主义者的支持。

对于这种现象，可以从物质和精神层面进行解释。物质层面的解释可以说非常简单。土耳其推行的延续数代的教育举措获得了回报，土耳其人现在可以胜任过去需要由亚美尼亚人和希腊人或者黎凡特人从事的事务。土耳其有五六所大学经常位居世界500强大学之列，比如能够与布拉格查理大学或者莫斯科罗蒙诺索夫大学媲美的比尔肯大学。这些学校培养了大批优秀的工程师，能够在伊斯坦布尔建造极其现代化的地铁系统、横贯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海底隧道，以及令英国汗

颜的道路体系。自厄扎尔政府向世界开放之后，土耳其就已经学会了如何与西方打交道，而且也能够在妥善消除了后苏联困惑之后，正确处理与俄罗斯的关系。像恩卡集团这样的土耳其建筑公司备受赞誉，其杰作包括修葺一新的俄罗斯联邦议会大厦和位于莫斯科的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的总部。俄罗斯关于现代土耳其的最畅销书籍[由N.G.基列耶夫（N.G.Kireyev）创作]歇斯底里地将恩卡集团成功的原因归结于宗教，理由是土耳其人在工作期间绝不饮酒。

从某种程度上说土耳其也是幸运的，它曾在2001年经历了一次严重的银行危机。当时，土耳其银行业普遍存在限产超雇现象，它们在通货膨胀的年代里通过政府债券获得了大量收益。后来，它们洁身自好，因此躲过了2008年的世界银行业危机：土耳其的信用几乎未受影响，经济在小幅下降之后也很快恢复增长。在西方金融机构为了重振银行业而实施量化宽松政策进而导致银行利率低下之时，土耳其首次吸引了规模可观的外国投资。此前的土耳其从未对外国投资者有过如此的吸引力，这些投资者曾因过去贬值严重的货币、盛行内部交易的股票市场以及仇外的法院却步。对于这些现象，土耳其国内已经制定了富有经验且全面的遏制举措，而且自1995年加入关税同盟以及1999年被欧盟接纳为候选成员国之后，土耳其已经推行了相当程度的法律改革。比如，此前前往梅尔辛的外国货船在抵达目的地之前，中途不能再承接货物并将其运往伊兹密尔——这就是所谓的沿海货物权。现在外国船舶可以这样做，而且土耳其船运业也积极地应对垄断保护权被取消之后的挑战。土耳其最终也确实做到了，在经历了数代人的时间之后，土耳其首次建立了造船业，特别是游艇，而卡驰集团甚至可以建造军舰。如今的土耳其航空公司也饱受赞誉（在上文那位俄罗斯作者看来，其当之无愧）。2003年，土耳其吸引了不足20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少于仅有伊斯坦布尔一半人口的匈牙利。此后，土耳其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总额达到120亿美元。到2015年时，土耳其吸引的外国投资总额达到1 500亿美元，其中绝大多数来自欧盟。

然而，土耳其也从阿拉伯国家吸引了大量的投资，其中很多未对外公布，或许正是这些灰色资金“气垫”使得人们难以对土耳其的经济活动进行预测或分析。当然，到2012年时，阿拉伯（以及伊朗）在土耳其的投资相比于之前已经显著增加。位于黑海沿岸的特拉布宗吸引了其中的大量投资，这个城镇的面貌得以改变。当地的一个非常著名的拜占庭帝国时期的遗迹——曾经非常壮观的小圣索菲亚教堂，在一队由爱丁堡大学和土耳其专家组成的小组的修复下，被改造成一座清真寺。在教职工俱乐部能否供应啤酒这个问题上，特拉布宗市政当局与黑海技术大学校长陷入僵局，宗教势力反对这种举措。校长失败了，并在由伊斯兰葛兰运动开展的捕猎巫师的运动中，被以莫须有的罪名送入监狱，我们之后将对此展开更多的探讨。但是，2002—2015年，土耳其政府的财政支出几乎翻了两番，达到了5 000亿美元。土耳其也存在债务问题，但是与饱受债务之苦的地中海沿岸的欧洲国家相比，可以说土耳其尚处于可控状态。

正义与发展党的成功中也存在着精神方面的因素，与其经济繁荣密切相关。虔诚却落后的安纳托利亚地区的“黑土耳其人”，自1924年哈里发制被废除以来就一直感觉受到欺骗，并受到“白土耳其人”的嘲讽。对此，这些“白土耳其人”依据自身见闻反击，宣称若不是凯末尔，安纳托利亚地区将会变成阿富汗。更加普遍的是，生活在安纳托利亚地区的有些穆斯林在一定程度上感到自卑。在某种程度上，这可以归罪于13世纪入侵该地的蒙古人，他们严重阻碍了伊斯兰教的扩张，但是随着拿破仑而来的西方入侵，当地的落后状况被揭露出来。最富智慧的回答（当然也存在非常愚蠢的答案）是：伊斯兰教将科学传到西方，只不过后来忘记了自身的成就——学习但不张扬，一切都将归于美好。落后的安纳托利亚地区在厄扎尔政府时期开始繁荣，而且依然秉持着对于生活的保守观点。当总统埃尔多安指出妇女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养育子女时，安纳托利亚地区的民众持赞同态度。埃尔多安的女儿曾经接受过美国教育，她也支持民众恪守《古兰经》的规定，比如一位父亲留给儿子们的财产应该多于给女儿的，因为《古兰

经》指出儿子们将面临更加艰巨的任务。对于这一点，安纳托利亚地区的民众也予以支持。战后联邦德国基督教民主党领袖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可能也持同样的观点（联邦德国于1949年颁布的基本法中的一项条款规定，一个男人所肩负的税收不能太高，以免他的妻子需要工作养家），但是欧洲已经做出了改变：研究表明工作的女性具有高离婚率和极低生育率的特点。2015年，土耳其仅有25%的女性工作，而且在东部的很多地区，女性教育普遍受到忽视。尽管未到法定年龄的人结婚需要非法进行，但是出于宗教原因，这种现象依然普遍（一夫多妻制也非常普遍）。2015年，正义与发展党政府之所以广受欢迎，是因为它修复了虔诚民众的价值观：他们可以直面"白土耳其人"了。

在住房和医疗层面，埃尔多安政府比前任做得更好。贫民窟从城市边缘的陡坡区消失，被高层的社会住房替代，而且在夜晚时分灯火通明。在这些建筑中还分布着大约9 000座混凝土清真寺，它们无疑被用以约束社会（谁喝了啤酒？谁的妻子没有戴头巾？企业招聘时可能会依据这些来决定录取与否）。这些住房的所有者受益于低廉的贷款，从而能够购买这些房产。医疗服务在垂直层面获得显著改观，而且毕竟这些医疗机构是大部分民众与政府进行直接接触的地方。一个可靠的计算机记录体系使得病人可不限固定医生看诊，这实际上降低了医生的重要性，医生薪水大幅下降；那些希望继续开设私人诊所的医生则需要调整自己的时间。结果，穷人首次能够获得药品。到访土耳其时生病的美国游客在出示自己的身份证件之后，便能够马上呼叫救护车并得到合适的治疗，如果参照美国医疗体系的开销，他们会感到非常惊讶。来自英格兰的"健康旅游"项目日益勃兴，这是因为英国民众在土尔其进行心脏手术时，不用像在英国时那样需要在国民健康服务项目中苦苦等待。到2011年时，正义与发展党政府依然声誉日隆，而且埃尔多安在2014年担任了总统，并任命时任外交部部长的艾哈迈德·达武特奥卢（Ahmet Davutoğlu）接替他出任总理。达武特奥卢

创作了一部著作，鼓吹推行土耳其–伊斯兰外交政策，希望重回昔日的苏丹–哈里发时期。

土耳其的宗教优越主义体现为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宗教部的预算一再攀升，到2015年时达到20亿美元，共有15万名员工。在位于安卡拉的宗教部总部旁的主干道上，一座规模宏伟的清真寺拔地而起，其附近还将修建一座全新的医疗区和一所大学。在伊斯坦布尔，对于礼拜的宣礼不再同步，因此经过扩音或者提前录制好的宣礼声便会接连响彻博斯普鲁斯海峡或者蓝色清真寺旅游区。在公交车站，一天之内会响起5次宣礼声。更令人惊愕的是，在博斯普鲁斯海峡亚洲一侧的昌姆勒加山上，有一座带有6座宣礼塔的清真寺。这座清真寺可以容纳3万名朝圣者，而且在地下还建有大型购物中心。尽管锡南（Sinan）的巨作仅有4座宣礼塔，而且也没有购物中心，但是没有人怀疑它有一天会被冠以“Tayyibiye”（由埃尔多安的教名Tayyip演化而来）的称谓，好像苏莱曼尼耶清真寺以苏莱曼大帝的名称命名一样。2015年，土耳其境内共有8.5万座清真寺，平均每800人拥有一座，在伊斯兰世界独占鳌头。

宗教在教育领域也得到了大力的推动。在宗教课程中获得高分能够得到双倍的学分，或许这是应该的，因为学龄儿童需要使用标准阿拉伯语背诵礼拜用语，这种要求与利物浦的学龄儿童需要用希伯来语朗诵旧约中的诗篇具有异曲同工之效。

在旧时代，如果政府在宗教领域采取了如此大胆的举措，军队可能会予以制止。这种现象在1997年就发生过，在经历了一场政治风暴之后，当时宗教色彩浓厚的总理内吉梅丁·埃尔巴坎（Necmettin Erbakan）被迫辞职。在一次圣诞节期间，他曾经接受了《纽约时报》常驻土耳其记者斯蒂芬·金策（Stephen Kinzer）的采访，邀请了各种身穿长袍的伊斯兰宗教人士前往他的总理府邸，并在伊斯兰世界建立了一个类似于G7（七国集团首脑会议）的被称为D8（穆斯林世界的8个

发展中国家）的组织，同时鼓吹穆斯林外交政策。后来，在利比亚举行了关于这个组织的正式发布会，来自尼日利亚等国家的众多不受欢迎的统治者参加了那次会议。由于时任利比亚总统穆阿迈尔·卡扎菲（Muammar Gaddafi）在会议期间指责土耳其的库尔德人政策，此次会议无果而终，而土耳其外交部部长则称卡扎菲是一位“厚颜无耻的贝都因人”。军队坚决要求埃尔巴坎立即辞职，此后埃尔巴坎政党内部发生政变，改由更加坚定的埃尔多安接任总理职务，而埃尔多安的团队则善于规避失误。他们显然获得了美国的支持。

美国一直在寻求一种支持基督教民主主义、承诺容忍的伊斯兰教。在距离弗吉尼亚州兰利市美国中央情报局总部不远的地方，居住着一位具有所有这些特征的土耳其伊斯兰教人士：法图拉·葛兰（Fethullah Gülen）。他发起了一项运动，以“Hizmet”（意为“服务”）著称，主要依据长期遭幽禁的萨义德·努尔西（Said Nursi，1877—1960）的学说建立，成为凯末尔宗教主义（发源于库尔德的样式）的一种替代。这种信条被冠之以“Nur”（意为“圣光”）的称谓，而葛兰在大学的众多追随者则被称为“Nurcu”。追随者们被告知要避免留蓄丑陋的宗教胡须和穿戴过时的宗教服饰，学习语言和科学，与外国人相处，而且在人们向其提供酒水时不要小题大做。这些人士见多识广，温文尔雅，在包括美国的全世界范围内，建立了一系列葛兰学校。这些学校每天首先播放土耳其国歌，但是对宗教避而不谈，而且使用英语授课。这些学校享有盛誉，获得了商人的大量捐助。这些学校的土耳其教师可以很容易就获得美国绿卡，这使得他们能够永远留在美国生活和工作。葛兰曾亲自拜访教皇，而且与犹太组织保持着良好的关系。“Hizmet”，也以“Cemaat”（意为“虔信者”）著称，共拥有250亿美元的资金，而且推动了出版业的发展。它的官方报纸《时代报》（*Zaman*）设有非常专业的英文版面，富有声誉的外国记者以及著名的土耳其世俗作家共同为此做出了重要贡献。几乎所有的外国人（包括上文提及的俄罗斯作家）都为此折服，土耳其人受影响的程度则相对较低。

从2002年开始，由于土耳其遵循了欧洲规范，正义与发展党政府加强了对于国家事务的控制。在正义与发展党政府的早期执政岁月中，首要任务便是避免发生军事政变。须知，在1997年时，正是军事政变迫使时任总理埃尔巴坎下台。欧盟（特别是德国）鼓励正义与发展党政府采取能够消除任何军事政变可能性的举措，因为依据新的欧盟制度，欧洲不允许军事政变的发生：没有佛朗哥，没有希腊上校，只有无穷无尽的民主高地。想要推行宗教政策，首先要驯服军队，这在Cemaat运动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这项进程是秘密开展的，运动者们在警察以及司法系统（法官和检察官）中建立支持者网络，并建立了自己的大学，首先是在伊斯坦布尔设立的私立法提赫大学，随后在其他各地建立了大学。在2007年选举之后，当选的正义与发展党政府的统治进一步巩固，随之开展了一项以“埃尔盖内孔案”著称的大规模的调查犯罪运动，逮捕了数百名高级军官、学者和记者。“埃尔盖内孔案”是一个土耳其民族主义事件，起诉书长达数百页。正义与发展党政府想好了起诉理由——比如集体迫害基督徒——证据都是伪造的，而且设计精巧。此次案件甚至被世俗报纸报道，在这些报纸任职的记者大力抨击军队。随着法官以及检察官的介入，甚至前总参谋长都被判处5年甚至更长时间的监禁。这些起诉书没有普遍公开，但是那些有学问的人揭露了起诉书中前后矛盾和捏造的内容，包括哈佛大学教授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他的妻子是一位被囚禁的土耳其将军的女儿，以及英国记者加雷思·詹金斯（Gareth Jenkins）。案件审判一共持续了5年，直到埃尔多安与Cemaat决裂，这些判决在2016年都被宣判无效。

许多土耳其世俗主义者对于这一切感到愤怒：被法国当局称为“ruraux brutaux”（意为“残酷的乡村”）的政府因循守旧、虚伪不实，而且丑态百出。伊斯坦布尔城内绵延数公里的水泥建筑使其颜面扫地，这些建筑不仅违反常识，而且毫无美感可言。2013年夏季，这种憎恶在加齐公园骚乱事件中暴露无遗。塔克西姆广场是伊斯坦布尔的中心，从1928年起就建有一座国家纪念碑，这座纪念碑上的苏联大

使雕像就是4座可辨识的雕像之一。广场包含一个20世纪70年代（很有那个年代的风范）的文化中心，而在20世纪20年代体面的建筑之间，还存在一块突兀的绿地——加齐公园。政府计划在这里修建一座清真寺，并准备复制一座已遭拆毁的奥斯曼帝国军营（1909年，此处还发生过一次受宗教鼓动的兵变，后来被青年土耳其党人镇压下去），而且还准备在地下建造一座购物中心。大约有50名群众，主要是老太太，在那里搭起了帐篷，与拆迁队伍对抗。警察介入此事，手段残暴。后来，成百上千名年轻人加入老太太的队伍，这些年轻人主要是学生，并与政府形成对峙局面。警察使用了催泪瓦斯，一张有关于此的照片迅速传遍了整个世界。在这张照片中，有一位身着红裙且没有防护措施的女孩，而在她身旁的一位残暴的警察却直接将催泪瓦斯对准了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对此次事件进行了全程报道，土耳其也被世界上的其他国家视为滥用警力的国家。在短暂的时间内，埃尔多安听取了顾问的建议，顾问主张他应该与加齐公园示威者代表进行会谈。但会谈没有效果。如果镇压了这些示威者，埃尔多安便能够吸引更多的支持者。对于这一点，他无疑非常清楚。警察最终进入公园，并将公园拆除。尽管政府已经制订了建设方案，但始终没有动工。

埃尔多安的反应或许是受到了开罗事件的影响。不久前，愤怒的埃及中产阶级举行的示威活动最终导致军队的介入，罢黜了埃尔多安的盟友，即出身穆斯林兄弟会的总统穆尔西（Morsi）。穆尔西是依据法定程序当选的总统，并准备推行伊斯兰化措施，他还邀请了备受尊崇的埃尔多安访问埃及。一位土耳其人在埃及广受欢迎并不常见，在埃及，奥斯曼精英不屑于学习阿拉伯语，而现代土耳其人则被视为西方的同党。然而，在达沃斯举行的2009年世界经济论坛上，埃尔多安成为一部分阿拉伯人心目中的英雄。埃尔多安曾经与以色列较年长的总统西蒙·佩雷斯（Shimon Peres）同处一个讲台，并指责对方是一位杀手，还使用了“你”这个称谓，这种随便的称谓在当时的环境下不啻为一种侮辱。那时，以色列刚对哈马斯在加沙地带发动的火箭弹袭击进行了报复，而且像此前一样比哈马斯更有杀伤力，哈马斯一般会做

到将火箭弹射手精心地布置在医院附近这种程度。埃尔多安从讲台上扬长而去之后，获得了数千名伊斯坦布尔支持者的热烈掌声。2010年，一艘名为“蓝色马尔马拉”的土耳其船舶强行驶往加沙，企图打破以色列的封锁。这艘船舶满载着罐装的儿童食物等物品，导致了以色列与土耳其之间的对峙。土耳其在阿拉伯街头上获得了广泛的支持。

在巴格达和埃及，埃尔多安获得了更多的支持，他在这些地区的天然盟友似乎是穆斯林兄弟会。兄弟会的创立者库特布设定了一套完整的体系，他的部分灵感来自对于20世纪50年代美国谷仓舞的极度厌恶。穆尔西获得了后穆巴拉克时代选举的胜利，而且他的议会需要解决一位伊斯兰教学者提出的问题，即一位男子在其妻子去世6小时之后，能否与她发生关系。在加齐公园骚乱发生之前，在开罗曾经爆发了大规模的中产阶级示威游行，军队进行了干预并推翻了穆尔西政府。穆尔西的许多支持者在开罗一个被称为“第四区”的广场“壮烈牺牲”。后来，在伊斯兰世界出现了由四根手指表示的V型标志，埃尔多安的办公桌上也放置着一座这种类型的模型（凯末尔的桌子上放置着一尊瓦格纳的半身雕塑，这张桌子现在保存在其陵园之中），而且有时候还在公共场合做出这个手势。人们普遍认为反对穆尔西的示威游行是由美国人暗中组织的，因此当埃尔多安面对加齐公园示威者的时候，他可能也这样认为。埃尔多安并非一位胆小怕事之人，而且也不怕与反对者正面相对。土耳其不会发生由世俗主义将军发动的军事政变，因为大部分将军都被囚禁了。

但是，“阿拉伯之春”无疑给埃尔多安带来了深重影响，而且他抛弃了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制定的基本原则：国内和平，世界和平。作为外交部部长的艾哈迈德·达武特奥卢周游伊斯兰世界各国，到处提供援助和抚慰：目前，援助物资已送到反穆斯林的缅甸的罗辛亚（Rohingya）少数族群手中——大多数移民从孟加拉国的废墟中逃离；他还亲自看护过加沙地区一位惨遭折磨致死的孩子；他还试图将破碎的索马里连接在一起。2013年7月，令人憎恶的恐怖分子在土耳其

驻索马里大使馆门外引爆了一枚汽车炸弹。达武特奥卢和埃尔多安在2012年会面，试图劝服巴沙尔·阿萨德（Basher Assad）进行民主改革，但是这项改革必定会使叙利亚出现类似于穆斯林兄弟会的状况。叙利亚和土耳其这两个邻居之间一直关系紧张，它们曾经在冷战中身处对立的阵营。1998年，土耳其曾经威胁叙利亚，要求其放弃对于库尔德恐怖主义组织库尔德工人党的支持。在埃尔多安执政期间，土耳其与叙利亚的关系获得了极大改善，两国不仅互免签证，而且两国领导人曾在度假期间只着衬衣会面。阿萨德确实说过，如果叙利亚问题爆发，必将惊天动地。事实也确实如此。叙利亚的示威游行发展成内战，逊尼派反对者中的穆斯林兄弟会组织得到了土耳其的支持，而且有近200万难民流落到土耳其。他们被安置在土耳其最先进的难民营中，还有很多难民逃到了伊斯坦布尔。土耳其在叙利亚问题上已经负荷过重，由于俄罗斯支持阿萨德，土耳其在2015年调整了态度。2015年11月，土耳其做出了回应：击落了一架侵犯其领空近70秒的俄罗斯战机。俄罗斯进行了报复：停止从土耳其进口，禁止公民前往土耳其旅游。俄罗斯认可了准库尔德斯坦准大使的身份，而且库尔德现在似乎成为从布达佩斯到德里之间唯一完整的实体。如果整个世界都支持库尔德人，纵使土耳其还占有拜占庭帝国的残余，那么土耳其的领土也将缩减至1350年奥斯曼帝国时期的范围。

现在，凯末尔的智慧再明显不过：不要介入阿拉伯世界，那里已经产生了一个新的梦魇，它意图吞并伊拉克和叙利亚。现在，土耳其有接近300万难民，并指责世界没有授权他们在叙利亚设立禁飞区，就像之前在靠近伊拉克北部所设的那样。但是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形势没有可比性。叙利亚受到俄罗斯和伊朗的保护，因此入侵其领空的战机很容易被击落。这种形势由于欧洲的介入——更准确的说是德国的介入——而变得更加复杂。早在2007年，欧洲就存在难民问题，大批难民，或称移民逃往希腊和保加利亚。欧盟做出了奇怪的安排：如果这些偷渡者在一个欧盟国家被抓获，那么他们将会被遣返至他们首先抵达的那个国家，这就是《都柏林协议》。欧盟希望土耳其接受《都柏

林协议》，但土耳其不感兴趣。作为施压之举，欧盟对所有土耳其人实施严格的签证制度。相反，美国会在24小时内给他们信任的人发放10年期签证。2015年夏季，土耳其开始反击：他们允许难民过境。100万难民乘坐橡皮筏前往希腊岛屿登陆。希腊的隔离体系崩溃，而且大多数难民长途跋涉前往德国——阿富汗人、苏丹人、巴基斯坦人、孟加拉人、甚至还包括一位海地人。这是土耳其对于欧盟不合理对待的严厉且戏剧性的反制举措。土耳其已经意识到在没有解决北塞浦路斯问题的情况下，塞浦路斯就已经加入欧盟，这意味着土耳其在加入欧盟的过程中可能遇到各种障碍。土耳其对待难民问题的态度可谓土耳其的报复性举措。此外，土耳其很快就意识到采取疏远以色列和俄罗斯的外交举措是错误的。2016年，土耳其进行了道歉，而且在叙利亚和伊拉克问题上很快与两国恢复合作。土耳其也很快与欧盟达成协议，尽管这些协议的细节尚待公布，但是依据协议，前往欧洲旅行的土耳其人可以办理更加便捷的签证，但是土耳其需要接回那些非法偷渡到欧洲的难民（伴随着资金支持）。

2016年，土耳其发生了一系列恐怖袭击事件。从疯狂的伊斯兰极端分子到库尔德工人党，抑或是左派分子，发动了一系列恐怖袭击，导致数千人死亡。当然，最令人震惊的事件当属2016年7月中旬发生的一场军事政变。但是，此次军事政变与以前的政变不同：它失败了。自1913年以来，在土耳其发生的军事政变从未失败过，相反却颇受欢迎，因为相比于政客，军队更值得信赖。在此次军事政变中，战斗机到处飞行，毫无章法地袭击议会和总统府，而且政变分子未能逮捕埃尔多安本人。埃尔多安动员了数千名支持者，并宣称葛兰运动应该为此次军事政变负责（尽管葛兰予以否认）。但是，在加齐公园骚乱发生后不久，葛兰运动便与埃尔多安分道扬镳。当埃尔多安与以色列关系恶化后，葛兰曾予谴责。葛兰运动布局深远，而且与美国进行合作。它利用“埃尔盖内孔案”在武装部队中秘密部署了大量支持者。2013年年末，葛兰运动组织揭露了埃尔多安家族内部的大量腐败案件，许多政府部长遭到逮捕，后来又被释放。如果这些巨型贪腐案件

的证据是真实的，那么将给埃尔多安造成巨大冲击，但是埃尔多安反而将检察官和法官逮捕，还释放了“埃尔盖内孔案”的受害者。随后，埃尔多安开始打击葛兰运动分子。这场拙劣的军事政变似乎是由将被解除职务的空军将领发动的，其领导人尚不可知。土耳其要求从美国引渡葛兰，但是葛兰否认介入此事，而且证据不足。土耳其军队的其余部分没有参与此次政变，埃尔多安挺过了这一关。

2016年8月，第三座横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大桥建成通车，这项宏大的建筑工程意在缓解伊斯坦布尔糟糕的交通状况，然而徒劳无益。这座大桥被命名为苏丹塞利姆一世大桥，并成为土耳其进步的象征。塞利姆一世即位初期，奥斯曼帝国的大多数臣民是基督徒，而他扭转了这种局面，因为他击败了伊朗的统治者，占据了今日属于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大部分地区，并征服了埃及，因此使得奥斯曼帝国呈现出更多的穆斯林特征。塞利姆一世还屠杀和驱逐了成千上万名阿拉维派或者什叶派穆斯林。这座大桥的命名是土耳其政府自2009年后的外交政策以及埃尔多安谴责以色列的恰当写照。但是，埃多尔安的穆斯林兄弟会盟友在埃及失利，而且在叙利亚也没有强大起来，阿萨德政府在俄罗斯和伊朗的支持下依然掌权。与此同时，土耳其接收了300万难民，并在2016年卷入国外的战争之中。在国内，土耳其还经常需要应对安纳托利亚东南部地区的游击战争，在这些地区的很多城镇，包括迪亚巴克尔中心地区的大部分历史遗迹都遭到了破坏。在土耳其的重要城市中，几乎每月都会发生恐怖袭击，而且与俄罗斯和以色列交恶也显著影响了旅游业。艾哈迈德·达武特奥卢推行的新奥斯曼主义政策开启了土耳其自身的“东方问题”，而且现在其东部很可能出现一个库尔德斯坦国。尽管安纳托利亚地区要求归化的诉求非常强烈，而且正义与发展党政府在2016年能够继续执政实际上与库尔德人（反对库尔德工人党）的大力支持密不可分，但是如果大国支持这项举措，如果库尔德人能够克服自身的严重分裂，那么库尔德斯坦国的建立至少是有可能的。2016年5月，达武特奥卢被迫辞职，而且埃尔多安修复了与以色列和俄罗斯的关系。然而，埃尔多安抛弃阿塔图尔克著名的“国内

和平，世界和平”的基本原则是一段不愉快的经历，土耳其人需要运用他们所有的智慧克服这些不良后果。

---

1. 土耳其共和国第11位总统阿卜杜拉·居尔（Abdullah Gül，2007—2014年在位）就来自那里，而且他本人也成为今日开塞利的象征。开塞利在工业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但是在宗教方面却非常严格，而且自厄扎尔时期开始就是安纳托利亚资本主义出现的象征，共和主义者以及世俗主义者因此而关系紧张。

大事记

苏丹（在位年份）	年	大事
	1071	曼齐喀特战役：塞尔柱突厥人击败拜占庭帝国军队
	1204	十字军洗劫君士坦丁堡
奥斯曼一世	1324	第一位苏丹死亡
奥尔汗一世（1324—1362）	1326	奥斯曼帝国占领布尔萨
穆拉特一世（1362—1389）	1389	科索沃战争：塞尔维亚的拉扎尔战败；穆拉特一世被暗杀
巴耶济德一世（1389—1402）	1396	尼科堡战役：奥斯曼帝国击败十字军
	1402	安卡拉战役：帖木儿击败奥斯曼帝国
空位期	1402—1413	巴耶济德一世的儿子们争夺王位
穆罕默德一世（1413—1421）	1413—1421	穆罕默德一世重塑巴耶济德一世的帝国
穆拉特二世（1421—1451）	1444	奥斯曼帝国在瓦尔纳击败十字军

穆罕默德二世（1451—1481）	*1453*	征服君士坦丁堡
	1454—1482	征服塞尔维亚、雅典、摩里亚、特拉比松以及波斯尼亚、瓦拉几亚、阿尔巴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巴耶济德二世（1481—1512）	*1481*	杰姆王子叛乱
	1492	西班牙犹太人在奥斯曼帝国避难
	1499—1502	奥斯曼—威尼斯战争
	1501	伊斯玛仪沙建立了萨法维王朝
	1511	沙赫库鲁领导了红帽军叛乱
塞利姆一世（1512—1520）	*1514*	查尔德兰战役：奥斯曼帝国军队横扫萨法维骑兵
	1516—1517	塞利姆一世占领叙利亚和埃及
苏莱曼一世（1520—1566）	*1521*	奥斯曼帝国占领贝尔格莱德
	1522	占领罗德岛
	1526	匈牙利抵抗势力在莫哈奇战役中被摧毁
	1529	围攻维也纳失败
	1565	马耳他击退奥斯曼帝国军队

苏丹	年份	事件
塞利姆二世（1566—1574）	*1571*	奥斯曼帝国击败威尼斯，占领塞浦路斯
	1571	勒班陀战役：神圣联盟击败了奥斯曼帝国
穆拉特三世（1574—1595）	*1589*	耶尼切里军团叛乱
	16 世纪 *90* 年代	杰拉里叛乱在安纳托利亚地区开始
	1593—1606	与哈布斯堡王朝交战
穆罕默德三世（1595—1603）	*1595*	依据“杀兄”法令，穆罕默德三世的19 位兄弟被处以绞刑
艾哈迈德一世（1603—1617）	*1609*	蓝色清真寺工程开始
穆斯塔法一世（1617—1618）	*1618*	欧洲三十年战争开始
奥斯曼二世（1618—1622）	*1622*	奥斯曼二世遭到罢黜并被处死
穆斯塔法一世（1622—1623）	*1623*	穆斯塔法一世遭到罢黜
穆拉特四世（1623—1640）	*1624*	巴格达被萨法维王朝占领
	1638	奥斯曼帝国收复巴格达

苏丹	年份	事件
易卜拉欣一世（1640—1648）	*1644—1669*	奥斯曼帝国与威尼斯争夺克里特岛
	1648	易卜拉欣一世遭到罢黜并被处死
穆罕默德四世（1648—1687）	*1651*	行会叛乱
	1656—1661	大维齐尔穆罕默德·科普鲁卢巩固奥斯曼帝国的统治
	1664	奥斯曼帝国在圣戈特哈德战败
	1683	围攻维也纳失败；大维齐尔卡拉·穆斯塔法被杀
苏莱曼二世（1687—1691）	*1688*	贝尔格莱德落入奥地利手中
艾哈迈德二世（1691—1695）		
穆斯塔法二世（1695—1703）	*1697*	奥斯曼帝国在森塔战役中失败
	1699	《卡洛维茨条约》：奥地利占领匈牙利以及特兰西瓦尼亚
艾哈迈德三世（1703—1730）	*1718*	《帕萨罗维茨条约》将贝尔格莱德划给奥地利；郁金香时代开启
马哈茂德一世（1730—1754）	*1730*	在帕特罗纳·哈利勒领导了耶尼切里军团叛乱之后，马哈茂德一世继承了王位，郁金香时代终结

苏丹	年份	事件
奥斯曼三世（1754—1757）		
穆斯塔法三世（1757—1774）	*1768—1774*	奥斯曼帝国与叶卡捷琳娜女皇主权时期的俄国交战
	1770	俄国海军在切什梅海战中获胜
阿卜杜勒·哈米德一世（1774—1789）	*1774*	俄土战争以《库楚克开纳吉和约》告终
	1783	俄国吞并了克里米亚半岛
	1787—1792	奥斯曼帝国与俄国交战；奥恰科夫要塞陷落
塞利姆三世（1789—1807）	*1798*	拿破仑在埃及登陆
穆斯塔法四世（1807—1808）	*1808*	塞利姆三世被暗杀
马哈茂德二世（1808—1839）	*1821—1829*	希腊独立战争
	1826	消灭耶尼切里军团（吉庆事件）
	1827	纳瓦里诺战役：英俄联合舰队击败埃及海军
	1831	易卜拉欣帕夏领导埃及军队入侵叙利亚

	1833	《温卡尔－伊斯凯莱西条约》确立俄国在奥斯曼帝国事务中的角色
	1838	《巴尔塔李曼条约》开启奥斯曼帝国与英国的自由贸易
	1839	埃及军队在尼济普战役中获胜，迫使奥斯曼帝国承认穆罕默德·阿里为埃及的世袭长官
阿卜杜勒·马吉德一世（1839—1861）	*1839*	花厅御诏的颁布标志着坦泽马特时代的来临
	1848	革命横扫欧洲；波兰和匈牙利自由主义者来到奥斯曼帝国
	1853—1856	克里米亚战争
阿卜杜勒·阿齐兹一世（1861—1876）	*1861*	奥斯曼帝国银行成立
	1866	克里特岛起义
	1875	奥斯曼帝国政府破产；巴尔干半岛叛乱
穆拉特五世（1876）	*1876*	奥斯曼帝国宪法颁布，第一届议会产生
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1876—1909）	*1877—1878*	奥斯曼帝国与俄国交战
	1878	《柏林条约》催生了保加利亚公国，俄国获得了安纳托利亚东北部地区

	1881	奥斯曼帝国债务管理局成立
	1889	艾哈迈德·勒扎成立的组织后来成为“统一与进步委员会”（也就是青年土耳其党）
	1896	安纳托利亚东部地区爆发冲突；亚美尼亚民族主义者袭击了伊斯坦布尔的奥斯曼帝国银行
	1908	青年土耳其党革命；奥斯曼帝国丢掉了保加利亚、波黑以及克里特岛
穆罕默德五世（1909—1918）	*1909*	反革命政变：“3 月 31 日事件”，被萨洛尼卡的军队平叛；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被废黜
	1912—1913	巴尔干半岛战争
	1913	青年土耳其党掌握了权力
	1914—1918	“一战”：奥斯曼帝国与德国结盟
	1915	重新安置从安纳托利亚东部地区逃难的亚美尼亚人
	1915—1916	协约国妄图占领土耳其海峡，奥斯曼帝国获得了加里波利战役的胜利
穆罕默德六世（1918—1922）	*1918*	在穆德洛斯签订停战协定

	1920	《色佛尔条约》：奥斯曼帝国的耻辱
阿卜杜勒·马吉德二世（1922—1924，担任哈里发）	*1922*	土耳其击败了希腊军队；苏丹被废除，由象征“所有伊斯兰”的哈里发取代
	1923	《洛桑条约》的签订奠定了今日土耳其的边界；土耳其共和国于10月29日成立，并由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担任首位总统
	1923—1924	土耳其—希腊人口交换
	1924	奥斯曼帝国被废除；世俗一党制政府成立；开始了激进的改革
	1928	语言改革
	1938	阿塔图尔克逝世
	1952	土耳其加入北约
	1955	伊斯坦布尔发生反对希腊人的骚乱
	1960	军事政变：阿德南·门德列斯总理被绞死
	1980	军事政变
	1983	图尔古特·厄扎尔领导的祖国党赢得选举，经济复苏

2005	土耳其开启入欧谈判
2011	“阿拉伯之春”爆发，土耳其－叙利亚爆发冲突
2014	雷杰普·塔伊普·埃多尔安成为第12任总统
2016	军事政变未遂

延伸阅读

这是一个庞大的主题，涉及遍布这个地区的复杂冲突。或许，探究这个主题的第一步便是建立世界范围内的语境，而且现在已经有人开始向前推进这项事业：约翰·达尔文为此撰写了《后帖木儿时代：全球帝国的兴与衰（1400—2000）》。通过参考已出版的著名书籍，我们会发现奥斯曼帝国也首次得到通彻的研究，最著名的一本书当属Philip Mansel，*Constantinople: City of the World's Desire*，*1453—1924*（London，1997）。出版时间更早的一本书是1964年出版的Lord（or Patrick）Kinross，*Atatürk*：*The Rebirth of a Nation*（London，1993），至今依然非常有利于我们了解奥斯曼帝国。他写作的*The Ottoman Empire*（second edition，London，2003）虽然风格陈旧，却很好地展现了奥斯曼帝国的军事史，并按年代顺序论述整个帝国的历史，气势磅礴。Robert Irwin, *For Lust of Knowing: The Orientalists and their Enemies*（London，2006）是西方学习"东方"的必备书目，而且这本书本身就是一个最引人入胜的故事，自始至终充满怪诞的记录。

富有进取心的出版社经常会出版一些视角广阔的优秀图书。Irfan Orga, *Portrait of a Turkish Family*（new edition，London，2002）是20世纪50年代的畅销书。Shirin Devrim，*A Turkish Tapestry*：*The Shakirs of Istanbul*（London，1996）描述了一位土耳其贵妇成为纽约的一名演员的故事。在数个世纪中，出现了很多这种反映奥斯曼帝国真实状况的图书，至少有两本书可以称之为文学中的经典。2007年，企鹅出版社出版了玛丽·沃特利·蒙塔古的书信选集*Life on the Golden Horn*，并且参照了赫尔穆特·冯·毛奇的*Unter dem Halbmond: Erlebnisse in der alten Türkei 1835—1839*（Stuttgart，1984）。Brian Sewell, *South from Ephesus: An Escape from the Tyranny of Western Art*（London, 2002）是

一本现代版本的此类书籍。Ömer Koç对此类书籍进行了广泛搜集，目前正在准备编纂两卷本的目录。一家颇受人尊敬的伊斯坦布尔出版商——ISIS的Sinan Kuneralp——数年来已经以西方语言重印了数百卷著名的古籍（比如1878年英国驻奥斯曼帝国大使奥斯汀·亨利·莱亚德的回忆录）。在此，需要再次查阅ISIS的目录。目前，市面上存在很多关于伊斯坦布尔的著名作品，我在此只引用一本。Hilary Sumner-Boyd and John Freely, *Strolling Through Istanbul: The Classic Guide to the City*（revised edition, London，2010）将带你畅游伊斯坦布尔，但是你需要结实的鞋子。Robert Irwin，*Islamic Art*（London，1997）则解释了其他更多的内容。

很多作者希望向学者呈现奥斯曼帝国更短且更具可读性的历史，其中值得一提的是杰森·古德温的《奥斯曼帝国闲史》以及Dimitri Kitsikis，*L’Empire ottoman*（Paris, 1985），后者精彩论述了希腊与土耳其的关系。Justin McCarthy，*The Ottoman Turks*：*An Introductory History to 1923*（London，1997）是一次大胆的学术尝试，而且没有回避经济方面的问题。

现在，随着获取档案资料更加容易（不仅仅通过互联网），关于奥斯曼帝国历史各个方面的学术著作呈现小规模的井喷态势，其中很多著作是由土耳其人用英语写作的。其中的一些作品，即使对于专家来说，也是难以完成的。根据著名土耳其历史学家Halil Inalcık的说法，即使是最优秀的美国研究生也要花费两年时间才能顺畅地阅读一页档案，但是只要突破了这些障碍，这些学者的贡献有时候就可能令人吃惊。我无法将这些学者的所有作品都罗列出来，仅引用一本书作为代表，它就是Gábor Ágoston，*Guns for the Sultan*：*Military Power and the Weapons Industry in the Ottoman Empire*（Cambridge，2005）。

阅读这种层次的专题性论文的唯一方法，就是依赖百科全书或者多卷本的学术专著的帮助。在这种类型的作品中，有很多值得参阅的

书目（它们的内容时有重叠）。在语言优美以及博学方面，我首先推荐的是Robert Mantran (ed.), *Histoire de l’empire ottoman*（Paris, 1989），其中Gilles Veinstein也负责撰写了数章。这本书对于研究阿拉伯省区（包括埃及）很有价值，对于研究《库楚克开纳吉和约》签订之后的时期非常有用。在青年土耳其党研究方面，此书最为重要。剑桥版的*A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1300–1914*，edited by Halil Inalcık with Donald Quataert（1994）是一本百科全书，既有优点也有缺陷。Inalcık自己也创作了一本相对简短的书——*The Ottoman Empire: The Classical Age 1300–1600*（second edition，London，2000），该书既论述深刻而又组织严密，在某种程度上深刻探讨了地产、国际贸易以及金融，极具可读性。Colin Imber, *The Ottoman Empire 1300–1600: The Structure of Power*（Basingstoke, 2002）以及Norman Itzkowitz, *Ottoman Empire and Islamic Tradition*（second edition，Chicago，1980）也是同类著作。

Ekmeleddin Ihsanoğlu, *History of the Ottoman State，Society and Civilization*（2 vols，Istanbul, 2001–2）用英语展示了土耳其的学问成就。*Istanbul Ansiklopedesi*（8 vols，Istanbul，1993–95）是一部经典著作，对我有很大帮助。Stefanos Yerasimos在巴黎大学的硕士毕业论文*Turquie: le processus d’un sousdéveloppement*在土耳其出版时名为*Azgelişmişlik sürecinde Türkiye*（Istanbul，1974）。这本书属于它所处的时代，可以说在那段时期是帝国主义阻碍了土耳其的发展。书中含有很多资料，包括坦泽马特改革开始时的声明。L. S. Stavrianos, *The Balkans since 1453*（new edition，London，2000）以及Albert Hourani, *A History of the Arab Peoples*（London，1991）很好地解读了奥斯曼帝国安纳托利亚之外的地区。Bernard Lewis, *The Emergence of Modern Turkey*是关于现代安纳托利亚土耳其的一部恢宏巨著，经久流传，于1961年首次出版，2002年时由牛津出版社发行了第三版。

在本书中，我写作的章节部分参照的是以上提到过的著作，但是每一个独立的章节都参照了不同的著作。总体而言，我主要参照了过去10年出版的著作。

序言

Fritz Neumark, *Zuflucht am Bosporus: deutsche Gelehrte, Politiker und Künstler in der Emigration*，1933—1953（Frankfurt，1980）是一本重要的回忆录，Horst Widmann, *Exil und Bildungshilfe: Die deutschsprachige Emigration in die Türkei nach 1933*（Frankfurt，1973）也是一本重要著作。2000年，在柏林艺术研究院举办了一次展览，此次展览的名录*Haymatloz: Exil in der Türkei 1933–1945*由Sabine Hillebrecht主编，是一本重要的著作。Arnold Reisman，*Turkey's Modernization*：*Refugees from Nazism and Atatürk's Vision*（Washington，DC，2006）是一本主要的英文著作。此外，我还参考了Hikmet的*The Poems of Nazim Hikmet*，translated by Randy Blasing and Mutlu Konuk（second edition，New York，2002）。

第1-8章

关于中亚蒙古–鞑靼–突厥弓骑兵帝国的著作有很多。在此方面的杰出代表是勒内·格鲁塞的《草原帝国》。我对于Jean-Paul Roux，*Histoire des Turcs*：*deux mille ans du Pacifique à la Méditerranée*（second edition，Paris，2000）一书所涉及的领域不是特别了解，但是这本书对于一些人物（比如吉尔吉斯人）的评价值得商榷。要研究俄国学者Lev Gumilev所称的"古代突厥人"是极其困难的，学者们对此问题的看法也不尽相同，而我在这些方面难以给出正确的评定。在鞑

鞑–突厥–俄国之间的关系方面，特别值得一提的是Ljubica Erickson and Mark Erickson（eds），*Russia*：*War*，*Peace and Diplomacy.Essays in honour of John Erickson*（London，2004）中的一篇由我本人所写的论文："Turkey in the Russian Mirror"。

在语言方面，非常重要的一本书是Geoffrey Lewis，*Turkish Grammar*（second edition, Oxford, 2000）。最有用的一本初级土耳其语书是A. and D. Pollard, *Teach Yourself Turkish*（new edition，London，2003），虽然初级但不幼稚。

Heath W. Lowry, *The Nature of the Early Ottoman State*（A lbany，Ny，2003）堪称经典，读起来也颇具挑战性。Cemal Kafadar, *Between Two Worlds*：*The Construction of the Ottoman State*（Berkeley，1995）一书有利于了解奥斯曼帝国崛起的背景。在拜占庭帝国解体方面，尽管Speros Vryonis, *The Decline of Medieval Hellenism in Asia Minor: And the Process Of Islamization from the Eleventh through the Fifteenth Century*（new edition，Berkeley，1986）是一本堪称希腊挽歌的著作，但是最新的研究成果是Nevra Necipoğlu, *Byzantium between the Ottomans and the Latins*：*Politics and Society in the Late Empire*（Cambridge，2009）。但是，迫不及待地想要了解1453年历史性时刻的爱德华·吉本，可能会一直翻看自己创作的《罗马帝国衰亡史》。

关于1453年的最重要书籍是罗杰·克劳利的《1453君士坦丁堡之战》，它在专业性方面始终引人入胜。

至于1453—1774年间的历史，我参考的是以下著作。Steven Runciman, *The Great Church in Captivity*（new edition, Cambridge, 1985）是一部重要作品，堪称解释拉丁和东正教神学差异的经典著作。Noel Malcolm, *Bosnia: A Short History*（London，1994）以及*Kosovo: A Short History*（London，1998）以极其广博的学识探讨了奥斯曼帝国在巴尔干半岛的存在。John Freely, *Jem Sultan: Adventures of a*

Captive Turkish Prince in Renaissance Europe（London，2004）详细介绍了地中海地区的背景。罗杰·克劳利的《海洋帝国：地中海大决战》与他的《1453君士坦丁堡之战》同样精彩。另一位伊斯坦布尔居民Geoffrey Goodwin，用娱乐性的口吻创作了两本著作*The Janissaries*（London，1994）以及*Topkapı Palace*（London，1999），他还创作了一本重要的目录册，*Topkapı à Versailles: trésors de la cour ottomane*（Paris, 1999）。Caroline Finkel, *Osman's Dream: The 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1300–1923*（London，2005）一书充分展现了什叶派萨法维王朝的问题，此书作者是目前研究18世纪奥斯曼帝国的重要人物。在维也纳战役方面的著名作品当属Andrew Wheatcroft，*The Enemy at the Gate: Habsburgs, Ottomans and the Battle for Europe*（London, 2008），这本书的一大特色是作者熟知奥地利军队以及军事前线的状况。

Tim Blanning的综合性著作*The Pursuit of Glory: Europe 1648–1815*（London，2007）介绍了从《库楚克开纳吉和约》到柏林会议之间数个世纪中国际社会的基本状况。自从Albert Sorel在近一个世纪前出版*L'Europe et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以来，尚没有出现更好的解释东方问题演变的其他著作。Orlando Figes写作的*Crimea: The Last Crusade*（London，2010）是有关于此的最新书籍。在奥斯曼问题的国际化方面，现有一本关于黎巴嫩的令人压抑的著作：Leila Tarazi Fawaz, *An Occasion for War*：*Civil Conflict in Lebanon and Damascus in 1860*（London，1994）。关于奥斯曼帝国财政崩溃的著名土耳其语书籍有很多，比如Haydar Kazgan，*Osmanlıda Avrupa Finans Kapitali*（Istanbul，1995）。David S. Landes，*Bankers and Pashas: International Finance and Economic Imperialism in Egypt*（Cambridge，Mass，1980）是一部值得思考的作品，它以同情饱受欺骗的埃及人和土耳其人而著称。在19世纪60年代福山提出"历史终结论"之前，可以参照本人的作品：*Europe Transformed 1878–1919*（second edition，

Oxford, 1999）。Mark Bostridge，*Florence Nightingale*：*The Woman and Her Legend*（London，2008）刻画了一位尊贵的贵妇。

Emre Aracı，*Donizetti Paşa*（Istanbul，2006）首开土耳其–欧洲音乐研究的先河。Stéphane（*sic*）Yerasimos在*Hommes et idées dans l'espace ottoman*（Istanbul，1997）一书中提出了一些洞见，在阅读他的短文"A propos des reformes urbaines des Tanzimat"之前，我并不十分明白为什么伊斯兰城镇与基督教城镇如此不同。Edhem Eldem，Daniel Goffman and Bruce Masters，*The Ottoman City between East and West: Aleppo, Izmir and Istanbul*（Cambridge，2008）深入探讨了这一点。

至于奥斯曼帝国的最后40年，随着档案的开放以及对于这个时代的重新解读，我们的观点也在变化。在最近12年的时间里，学术界开始重新评价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Selim Deringil, *The Well-Protected Domains: Ideology and the Legitimation of Power in the Ottoman Empire*，*1876–1909*（London，1998）以及François Georgeon，*Abdülhamid II*（Paris，2003）都是此方面的著作。关于19世纪中期以来的难民问题的主要著作是Justin McCarthy, *Death and Exile*：*The Ethnic Cleansing of Ottoman Muslims, 1821–1922*（Princeton，1996），但是它与Oliver Bullough，*Let Our Fame be Great*：*Journeys among the Defiant People of the Caucasus*（London，2010）存在较大差异。与此相反，最经典的著作是Niyazi Berkes，*The Development of Secularism in Turkey*（London，1998），此外，Şerif Mardin，*Religion, Society and Modernity in Turkey*（Syracuse，NY，2006）以及M.Şükrü Hanıoğlu，*A Brief History of the Late Ottoman Empire*（Princeton，2008）也非常重要。Sina Akşin, *Jön Türkler ve İttihat ve Terakki*（third edition，Istanbul，2001）介绍了青年土耳其党和统一与进步委员会之间的联系。另一本重要的著作是Fuat Dündar，*Modern Türkiye'nin şifresi*（Istanbul，2008），尽管它过分强调了因巴尔干半岛战争而涌入大量难民的塔拉特的状况，但它也将会使人想起迪尔凯姆教授。马克·马佐

尔的*Salonica, City of Ghosts: Christians, Muslims and Jews*（New York，2005）重点介绍了帝国解体时期，而*Trotsky*，*The Balkan Wars, 1912–1913*：*The War Correspondence of Leon Trotsky*（New York，1980），edited by George Weissman and Duncan Williams值得继续研究。由于我们研究的是一个战争历史丰富的国家，A. J. P. Taylor创作的*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Europe 1848–1918*一书就显得格外重要，这本书首次出版于1954年，目前对于研究巴尔干半岛战争依然非常重要。

至于1914年战争的背景，我本人写作的《一战简史：帝国幻觉》重新解读了奥斯曼帝国所处的背景，Mustafa Aksakal, *The Ottoman Road to War in 1914*（Cambridge，2008）也对此进行了清晰的解读。Stanford J. Shaw，*The Ottoman Empire in World War I*（2 vols，Ankara，2006）对战争本身进行了意义深远的解读，作者深入探讨了亚美尼亚灾难，认为其更应被称为灾难而不是大屠杀，这对于当事国来说意义重大。最近论述亚美尼亚大屠杀的著作是Guenter Lewy，*The Armenian Massacres in Ottoman Turkey: A Disputed Genocide*（Salt Lake City，2005）。Franz Werfel著名的小说*The Forty Days of Musa Dagh*（London，1934）非常具有可读性，但是作者也在文中写到，“不要以此来反对土耳其人”，因为他知道问题复杂，并且理解土耳其共和国的难处。Roderic H. Davison，*Essays in Ottoman and Turkish History*，*1774–1923*：*The Impact of the West*（Austin，TX，1990）在此方面有一篇重要的文章，而且可以与Elie Kedourie（由David Pryce-Jones作序），*The Chatham House Version and Other Middle Eastern Studies*（Chicago，2004）媲美。这篇文章非常重要，因为其探讨了亚美尼亚人清白的定义。

在加里波利战役方面，已出版的专著包括Nigel Steel and Peter Hart，*Defeat at Gallipoli*（London，1994），但是Kevin Fewster, Vecihi Basarin and Hatice Hurmuz Basarin，*Gallipoli*：*The Turkish Story*（Sydney，2003）也值得一读。

关于1918年后中东地区出现的新秩序，David Fromkin, *A Peace to End All Peace: Creating the Modern Middle East*, *1914–1922*（London，1989）已成为每个人的必读书目。在土耳其方面，Stanford J. Shaw, *From Empire to Republic: The Turkish War of National Liberation, 1918–1923*（5 vols，Ankara，2000）现在是一本标准的著作，而Michael Llewellyn Smith，*Ionian Vision: Greece in Asia Minor, 1919–1922*（second edition，London，1998）从各方面来说都堪称经典书目，构思清晰而且颇具学术性。最近的一部有关于此的简短著作是Andrew Mango，*From the Sultan to Atatürk*：*Turkey*（London，2009），这本书虽然简短，但并未遗漏任何关键方面。

结语

这部分应该首先从Andrew Mango, *Atatürk*（London，2004）说起，由于其将1923年前期与后期衔接起来而更显重要。Kemal H. Karpat对此进行了广泛论述，正因如此，我专门上网搜寻了土耳其每天的变化细节。Kemal H. Karpat的著作*Social Change and Politics in Turkey: A Structural-Historical Analysis*（Leiden，1973）耗费了他一生的心血，在各个方面都获得了极其有趣的结果，综合论述了民主、民族主义以及伊斯兰问题。但是，反映土耳其共和国的本地著作却少得可怜，现代土耳其人在很大程度上将其现代历史交由外国人著述。在此方面仅有一个例外，即Mete Tunçay创作了一部关于20世纪30年代一党制政府的著作。但是，当代土耳其本可以由更多当地人进行权威的评述。Andrew Mango的著作*The Turks Today*（London，2004）堪称一份高效而且资料充足的调查报告，William Hale则创作了关于权威著作*Turkish Politics and the Military*（London，1994）。尽管存在其他著作，但依我之见，在库尔德问题方面最重要的著作是Hamit Bozaslan，

La Question kurde: états et minoritiés au Moyen-Orient（Paris，1997）。这本书的优点在于并没有以自我怜悯为出发点。

Geoffrey Lewis是土耳其语方面的世界主导者，*The Turkish Language Reform: A Catastrophic Success*（Oxford，1999）描绘了这位伟大人物的光辉一面，虽然也有不同的声音。

如果记者在土耳其停留的时间足够长，那么他们就有机会创作出非常优秀的著作。David Hotham, *The Turks*（London，1972）以及后来的Nicole and Hugh Pope，*Turkey Unveiled: Atatürk and After*（London，1997）预见到了一种基督教民主样式的伊斯兰民主的诞生，并认为20世纪80年代的伊斯兰民主模式拥有很多优点。Francis Russell, *Places in Turkey: A Pocket Grand Tour*（London，2010）是一本旅游地图，描述了迷人而且经常不为人所知的景点。此外，它也为读者展现了一个永恒的土耳其，以及那里的人们是如何生活的。Geert Mak, *The Bridge: A Journey Between Orient and Occident*（London，2008）描绘了在加拉塔桥上从事14小时工作的小商贩的糟糕收入状况，刻画出人们在这些环境中是如何生活的。这本著作堪称天才之作。

自“阿拉伯之春”爆发后，土耳其便经常引起整个世界的关注。德国媒体（我常看*Der Spiegel*以及*Die Welt*）在报道土耳其方面引领着西方的新闻和评论媒体，而且我现在主要的土耳其信息来源是*Al-Monitor*网站。在这个网站上，一批主要的土耳其记者此前可以对外发布的一些新闻，现在经常被封锁[或者以卡德里·居尔塞尔（Kadri Gürsel）为例，他已遭到囚禁]，但是他们依然可以提供部分信息。我们现在应该关注政治宗教，有关于此的一部优秀作品是Thierry Zarcone，*La Turquiemoderne et l’islam* (Paris, 2004)，特别是其中关于伊斯兰知识分子角色的论述。Jenny White，*Muslim Nationalism and the New Turks* (Princeton, 2013)是一部经典作品。Daniel Pipes（他被批评者错误地戴上敌视伊斯兰的帽子，但是他们显然没有阅读他的作品）的网站

（www.danielpipes.org）经常值得浏览，当然也包括Claire Berlinski (www.berlinski.com)的网站，而且Claire有望成为Oriana Fallaci的继承者。她在*City Journal* (Autumn 2012)发表的“Who is FethullahGülen?”一文堪称权威，M.Hakan Yavuz等人围绕2016年军事政变的文章“The Turkish coup attempt: The Gülen movement vs. the state”, in *Middle East Policy*, 23：4 (Winter 2016)也是如此。也可以参考F. Michael Wuthrich，*National Elections in Turkey: People, Politics, and the Party System* (Syracuse, NY, 2015) 以及Suavi Aydın，Yüksel Taşkın, *1960'tan Günümüze Türkiye Tarihi* (Istanbul, 2014)，它们都是20世纪60年代后期土耳其政治的重要著作。Alev Scott，*Turkish Awakening: Behind the Scenes of Modern Turkey* (London, 2015)生动地记录了现代伊斯坦布尔的发展轨迹。如果想要了解土耳其目前的困局最后可能产生什么样的后果，那么Michael M. Gunte，*The Kurds: A Modern History* (Princeton, 2015)非常值得一看。